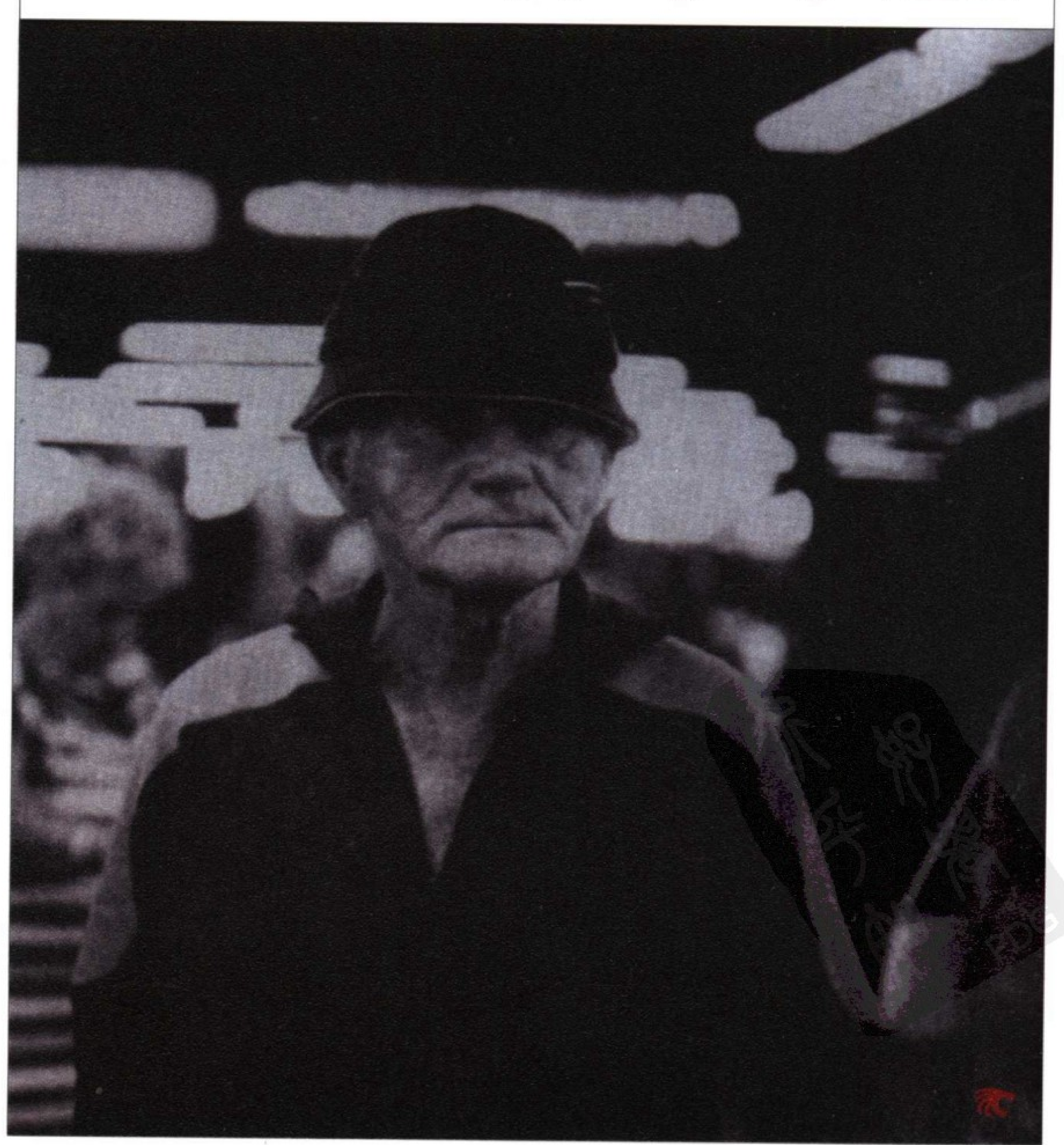
刘星灿主编

BOHUMIL HRABAL

〔捷〕博·赫拉巴尔 著 星灿 劳白 译

传记体三部曲

林中小屋



在中国，谁都知道米兰·昆德拉。但谁会知道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14～1997），这位法学博士为自己重新建构的一生是这样的：服过兵役、当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后来又做废品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49岁时第一部作品才得以出版，而此后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多达30多个，很多作品被改编电影和戏剧，并获柏林电影节金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赫拉巴尔在他的晚年表示：“我还要写一本一方面让自己开心，一方面使读者生一点点气的书。在这样一本书里，我要用我妻子的眼睛来看我、看我的朋友和我的生活。”赫氏所言的“这本书”，即是后来出版的《传记体三部曲》，它包括《婚宴》、《新生活》和《林中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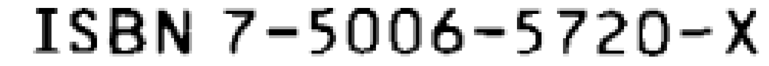
赫拉巴尔的生命是这样结束的：1997年2月3日，人们发现原来即将病愈出院的这位作家从医院五楼窗口坠落身亡……

陆续推出的这套“赫拉巴尔精品集”，系中国青年出版社完整购进版权，著名翻译家由捷文直接译出。

出版策划
黄宾堂
龙冬

责任编辑
熊耀冬
万同林

装帧设计
李鸿飞





ISBN 7-5006-5720-X/I · 1145
定价：40.00元（共三册）

传记体三部曲
第三部

林中小屋

我丈夫的处女作老等老等总也不来，总也不来。他已经连啤酒都不喝了，只是在黑夜里叫喊着，要从窗子里跳下去，要卧轨让火车轧死算了。到第二天我有了空，便穿上我的节日盛装、红高跟鞋，拿上雨伞，到出版社去了。当我站到社长面前，便立即告诉他我是谁，并用雨伞指着利本尼，指着堤坝巷24号那个方向对他说："您瞧！我的宝儿爷[①] 就躺在那儿某个地方，他已经连酒也不喝了，他已经连钻到火车下面去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因为有关他大作的消息左等右等也等不来，总也等不来。您只管到那里去看看，你们把我的丈夫折腾成什么样子啦！"我站在那里，眼睛周围画着浓浓的眼影，摆出一副舞蹈演员的姿势，我那双红高跟鞋锃亮闪光。社长本人被我吓了一大跳。他抓起电话，只听得他对着话筒接连说了好几声"是……是……是"然后放下电话说："回信已经寄出去了。"我说："寄出去了，可是等它寄到之前我的宝儿爷就会死去的！我还是自己去跑一趟吧！……喂，《底层的珍珠》在哪儿？"社长又对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在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前，我也等不及，我也曾经想去卧轨，也考虑到后事。"他又拿起电话。过了一会儿，一位职工送来那本出版社存底，本不该拿出

① "宝儿爷"是女主人公对她丈夫的昵称。

来的样书，于是我便拿着它走出了出版社。我大步走过民族大街，让糖果店售货员给我用一张细软如丝的白纸，将这本《底层的珍珠》包好，扎上一根绸带，犹如一件礼物……我骄傲地走过瓦茨拉夫大街，一手拿着雨伞，另一只手拿着用红丝带捆着的《底层的珍珠》。我跨着大步，憧憬着这本书正式出版后的美好情景：我的宝儿爷将同我并肩漫步走过这里，书店橱窗里将陈列着《底层的珍珠》。我们将把朋友们请到家里来欢庆一番，将喷洒香槟酒，像我丈夫中了头彩那样。我突然心血来潮，走到焦街废纸回收站，我丈夫曾在那里微弱灯光下打过四年的废纸包。我迈进回收站的办公室，当头儿的正好在那里，是他撵走了我的丈夫。那个安全代表也在那里，是他指责我丈夫无故缺勤，其实我丈夫是因为获得作协文学基金会的补助，工作量得以减半。我解开红丝带，然后将这蓝色封皮的书，主要是那印在上面我丈夫的名字指给大家看。我说："你们都亲眼看见了，我丈夫是位作家，绝不像你们在这里肆意糟蹋他的那样。"说完我又重新将《底层的珍珠》包好，扎上红丝带，拿着雨伞走出来。到了院子里，我还回过头来，对着他们的窗户举起那本包装好的书，我看到他们坐在那里发愣，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们在堤坝巷 24 号住宅的窗子大敞着。贝比切克像动物园鸟棚里一只大秃鸟似的坐在门前台阶上抽烟，他戴着一副大如酸奶杯的眼镜。我丈夫从垂危中起了床，如今正在洗餐具。我走进屋里，将扎着红丝带的小包随随便便放在两只玻璃杯和一只开了盖的酒瓶之间。"你猜，这是什么？"我说。可是

我丈夫还继续洗他的碗碟，然后说："我知道。不过，能抑制激动者真君子也，而且我和贝比切克已经商量好了，等你一去维也纳看望你哥哥，我们俩不仅要重新把我们的房子刷白，而且要把我们的门、窗、椅子统统刷白，让我们这里变亮堂点儿，让我的黑色幽默变成白色幽默。"这时小个儿贝比切克走了进来，他那两个嵌在眼镜框里的"酸奶杯"[①]闪闪发亮，折射着我们这间暗黑的房子。贝比切克说："博士，再来一瓶！"说着把一只像他眼镜一样闪亮的瓶子放在桌上。

一刻钟后，我乘的那趟去维也纳的快车就要开车了，我站在月台上。我丈夫提着买东西的网兜朝我跑来时，我觉得他又喝醉了，可他是因为那本书而喝醉的。他帮我上了车，大声嚷嚷道："咱们成功啦！印数两万册！如今他们得拆开所有的包，七个编辑在那里翻书页，因为里面有个错字。你知道吗？书上把马可斯这个名字错印成了'马尔可斯'。别的毛病没有，只是多了一个'尔'字。如今七个女孩得翻到这一页，两万册就是两万页！先用钢笔画掉这个'尔'字，然后再每包二十册地把它们重新包好！……"我这位宝儿爷一直在站台上这么喊着，弄得我都脸红了。"别喊啦！我求求你！"乘务员已经吹了哨子，我丈夫也开始离去。我看着他，旅客们也惊讶地瞪大眼睛……满满一网兜一百克朗一张的钞票……乘务员又吹了一声哨子，我丈夫笨手笨脚地走在月台上，还晃动了一下那网兜，仿佛他提回家去的是一袋菠菜……火车开动了，我丈夫追着我的窗

① 特指那副既大又厚的眼镜片。

口跑着对我说："瞧，他们给我预付了一部分稿酬，一万克朗——我和贝比切克准备刷墙——"然后站在那儿，转动着那网兜，那些绿色的百克朗钞票真的有些像菠菜哩！等我坐下来，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太太说："您先生可真是一个快活的人啊！您跟他在一起一定很幸福，是吧？"

快车慢慢驶进弗朗斯·约瑟夫站，我已站到车厢过道上。我哥哥卡雷尔已经在月台上等候了。"卡雷尔！"我提着箱子下车时，卡雷尔朝我飞跑过来。我们紧紧拥抱了。我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对，他是卡雷尔，我也的确是我。过了多少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又擦擦泪水。是，这是卡雷尔！他还是那么衣冠楚楚，穿着最好的衣服和最棒的鞋子，干净的衬衫和随随便便打个领带。可是他头发变稀了，不过还仍旧是栗色的，稍微有点儿卷，洒了点儿花露水。他往下巴上的伤痕那儿扑点儿粉，这是在东方战场上被手榴弹片划伤的……然后我们将箱子放到小轿车里，卡雷尔的轿车也擦得跟他的皮鞋一样锃亮，就跟整个卡雷尔这个人一样。我跟这位自大战后没有见过面的哥哥以前压根儿就不可能见面，因为我爸爸在这些年月里不希望卡雷尔交捷克朋友、跟捷克姑娘谈恋爱和参加布拉格的捷克划船俱乐部活动，因为我爸爸想让卡雷尔照看我们的胶合板与单板工厂。可是卡雷尔在布拉格时就是爱跟姑娘们和朋友们去跳舞。如今他开车带着我有意只沿着维也纳的卡恩特诺大街和马利亚希尔弗大街行驶。这些宽阔的街道、漂亮的店铺和各式各样的人群看得我眼花缭乱。一会儿我们便排进了汽车长龙阵。我觉得维也纳好像比我以前看到的更大更

漂亮了。那一次我在布舍兹拉夫和姑娘们一块儿逃学坐快车到过维也纳……可这还是在大战之前……我们在维也纳近郊的拉道恩下了车，我嫂子来迎接了我。我立即看出，这位掌握着我哥哥、里里外外甚至一切都做主的嫂子是个很可亲的女人，典型的维也纳型的，长得像根小柱子。她总是面带微笑，但这不是因为见到我而感到高兴的那种微笑。直到后来，我说我在这里只打算呆十三天，然后便回家去，如今我的家在布拉格时，她才终于平静下来。我看到她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幸福地微笑了，因为我并不打算在奥地利长住。卡雷尔这时脱下皮鞋，将鞋楦头塞在里面，用块法兰绒布把它擦得锃亮。他穿上拖鞋，我也换了鞋。我坐在一间男士房间里，房门冲厨房敞开着。厨房很白净，像牙医诊所。我嫂子穿上白围裙，开始做晚饭。她坐在一把用镀铬的板条作装饰的白色转椅上，打开那小白柜上的白色珐琅小门，里面摆着各色各样的调味品。她切的胡萝卜红得耀眼，香芹菜绿得可爱。然后她拿来几块生煎肉排，配上几块胡萝卜片……卡雷尔则在悄声问我，布拉格是否还像他年轻时在那里念大学，代表高校俱乐部比赛网球和篮球那会儿那样漂亮？那家“心肝”舞厅和“黑色”舞厅是不是经常举行舞会？约利什在干什么？“伏尔塔瓦”舞厅是不是还存在？最主要的是还举不举行全市八桨划船比赛？当我告诉他说我在“宫殿”旅馆的高级餐厅里当服务员时，他高兴极了。又问“宫殿”旅馆二楼的饭菜是不是还那么好吃？……于是我就住在拉道恩我哥哥卡雷尔家里了。每天我都到他公司去等他。到下午五点半钟我还看见他穿着白大褂在这个维也纳木材公司的院子里来来去去跑上好几趟。爸爸已经去世了，幸好他已

不在，免得看见这个本可以拥有爸爸这个公司的卡雷尔却偏偏爱跟漂亮小姐和朋友们在布拉格四处游逛而不关心爸爸的公司。也许卡雷尔事先早已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到后来爸爸的全部财产丧失一空，因为他没想到德国人会打输这一仗。我记得卡雷尔带着我到萨尔茨堡[①] 时，他将那里的一座漂亮别墅指给我看，当时爸爸本来有钱将它买下的，可是他既然在霍多宁[②] 有一幢更漂亮的别墅，又何必在一九三四年买下这一座呢？主要是爸爸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不单他一个人这样，而整个全家，甚至莉莎[③] 和乌利叔叔[④]都这样……我跟着卡雷尔每天换一个地方去消遣：有一次我们去的是萨赫尔大饭店，后来又去达莱恩吃小鸡，然后又来到德蒙咖啡馆，那里的售货员小姐说话特别客气。出于好奇我还跟卡雷尔去过“夏威夷女郎”咖啡店，后来又去了格林辛酒家、克洛斯特纳堡饭店。或者我们一道漫步在卡恩特诺大街和卡拉本大街上。我简直被这维也纳、被这些商店和维也纳式的德语迷住了。我曾多少次略带伤感地希望过：我要是能重新开始我战后的生活，我一定哪儿也不去就住在维也纳。在这里就跟在家里一样，所有这里的人都跟我在一九四五年前在一起生活过的人一样，因为我妈妈是奥地利人，一个林务区长官的女儿。我越是喜欢维也纳，我嫂子便越坚持说，维也纳是不错，但在维也纳就得干活儿、干活儿、再干活儿，说她在鞋厂每天得干到下午六点。

---

① 位于奥地利境内。

② 位于捷克境内。

③④ 都是本书第一人称的述说者——赫拉巴尔的妻子碧朴莎她父亲的朋友。

卡雷尔对我说:“我在这里是个外人,维也纳没有接受我。我在维也纳的生活只是上班下班,然后看看电视,准时睡觉,以便早上能按时起床去上班,拼命地干呀、干呀,一直干到五点半。我在这里完全是个外人,只有在休假的时候才能想到哪儿去哪儿。在休假期间我想去哪个海里游泳就去哪个海。圣诞节期间我可以去滑一个星期雪,随便去哪儿。可是在这座城市里,我却是个外人,苏台德人,尽管我最美好的年华曾经是在布拉格同捷克朋友和捷克小姐们在一起度过的。一直到希特勒来到之前,我一直把布拉格当做我的家。我记得,希特勒乘车经过维也纳时,我妈妈还坐车到那里去看见过他。她幸福得哭了,连莉莎和去年去世的碧辛卡姑姑也是这样,可是我却马上意识到,我跟我布拉格的姑娘们和所有布拉格的朋友们的缘分算结束了,因为我们曾经住在苏台德,是德国人,我就得上前线……”卡雷尔曾经多少次给我讲过这些经历,而且不时用块小手帕捂着他的下巴……

我回布拉格不像来维也纳时那么找不着北了。在弗朗斯·约瑟夫车站上,我眼泪汪汪地站在一个小窗口旁边。卡雷尔给我买了一件新套装和满满一箱子内衣与小礼品。现在他站在月台上看着我,冲我微笑,像断了线的木偶国王那样站在那里。嫂子跟她平日那样,总是穿着套装。她拉着我的手,笑眯眯的。她正是卡雷尔所需要的那种女人,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什么事也不会使她感到震惊。她了解自己的风格,她完全知道卡雷尔离了她不仅行不通,而且会崩溃。哨声一响,快车缓缓开动,卡雷尔哭了。他用手帕擦着眼睛,也轻轻地擦了一

下下巴。我嫂子微笑着，很明显她高兴我还回布拉格去，接待我在这儿住了十三天之后她能休息一下。我还看到，卡雷尔弯下身来，用手帕轻轻拭去裤腿上和锃亮的鞋尖上的灰尘……

我丈夫在布拉格的车站上等着我，嘴边布满皱纹，也没有亲我一下。我没挨着他走，因为他有一股啤酒味儿。他心虚地冲我微笑，提着我的箱子。因为找不到出租汽车，我们只好乘电车。我望着窗外，看到布拉格的确乱七八糟的，到处扔着废纸；我主要看到了差不多一半街道是管式结构；我看见在进到布拉格市中心之前的市郊区，一群群大篷车式的临时住宅，用木条、厚木板、横梁围成的栅栏。我奇怪自己以前怎么没注意到这些。我看到，布拉格的市中心跟维也纳很相似，只是那郊区……我把我丈夫和我在街上看到的情景搅混到一块儿了。我不禁得出这么个结论：我丈夫的内心也是这副模样，连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穿衣服就像这些布拉格街道和广场一样……当我们下了电车，当我转到我们这条小巷，我不禁摇晃了一下，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楼房和小平房都快要倒塌，墙皮剥落，每两栋楼中就有一栋楼的滴水管已被拔掉，街上满是垃圾。随着过道上一股寒气袭来，院子里吹来一股凉风。贝朗诺娃太太又在开水龙头，一桶接一桶地在浇水，浇她窗子底下那块地，用稻秆扫把将水扫进下水道。她欢迎我说："您甭告诉我您去哪儿了。您知道，我在汉堡住了二十年！"我沿着台阶往上走，我已经看见了！在那些从屋顶耷拉下来的爬山虎枝杈和藤条后面闪现着两扇白门和白窗户……我对丈夫报以微笑，等我走进我们家，昏暗中那刷白的椅子、桌子，用石灰粉刷过的墙以及镜子里照出来的一切都在闪闪发光。经镜

子一照，什么都多了一倍，于是我们家就像摆满了桌子椅子……桌上还一直摆着那个光芒四射、用红丝带捆着的小包，那本包着的样书，跟我刚从出版社拿来的一个样。我丈夫将脸凑到我跟前，我吻了他一下……我说："有什么新闻？"我丈夫说："《珍珠》[1] 昨天正式出版上市，当天就被抢购一空……"

由于刷油漆；由于跟我丈夫没完没了地喝啤酒，贝比切克，这位常年蹲在利本尼、蹲在瓦尼什达先生和我丈夫这儿的椅子上的贝比切克他死啦！人们在他死后一星期才在斯洛万卡他的住宅里找到他。他孤苦伶仃一个人，他的亲戚什么的还都在加拿大某个地方。酒店老板万尼什达先生在人民委员会宣布说，出殡的一切费用由他来承担……于是我们去到火葬场那个小小的殡仪馆。万尼什达先生随身带来一把吉他。那里摆着一副棺材，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棺材里躺着约瑟夫[2]·斯瓦特克。我丈夫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他对我说："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从来不知道，贝比切克的姓叫斯瓦特克[3]……"随后出来一个人，只是重复了一遍讣告上的话。后来我将惟一的一朵花放在棺材旁边，万尼什达先生拿着他的吉他来到棺材跟前，对着贝比切克·斯瓦特克鞠了一躬，在演奏几个和弦之后便开始唱起那支贝比切克·斯瓦特克最喜欢的歌："住宅区的小姑娘，你的笑脸多漂亮……"他唱得如此动情，仿佛他雇的那位名叫本耶明诺·基克里的在他酒店唱那

① 指作者的处女作《底层的珍珠》。
② 约瑟夫的爱称为贝比切克。
③ 斯瓦特克的意译为"节日"或"命名日"。

“啊，我惟一的……”一样。正当他在高唱“住宅区的小姑娘，你的笑脸多漂亮”的时候，从徐徐拉开的黑丝绒帷幕中走出几个工作人员，他们默默地听着万尼什达先生富有感情的歌唱……棺材缓缓移到一堵大墙的后面……

当我丈夫用出租车将作者该得的样书和自己加买的书运回家时，我们真是高兴至极。他一共加买了六十本，马上打开包，又一本挨一本像摆小瓷砖一样地摆开。这我都看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宝儿爷原来是这么个孩子气的人。然后他在这些书上签了名……他还逼着我将其中的一本抱在怀里当做我的新生婴儿来呵护，说通常就是这么做的，说维杰斯拉夫·涅兹瓦尔[1]将他的孩子[2]交给他的情人去抱着以表示他的一番心意。因为，就像我的宝儿爷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的书才是他真正的孩子，说他不只是这些书的爸爸，也是他们的妈妈。甚至比亲生母亲还要亲，因为这样的作家，我丈夫指着自己说，在他的肚子里，然后在他的脑子里，得把这孩子怀上九个多月才能生下来。他像做母亲一样感觉到孩子在他肚子里怎样一天天成长、翻身、踢脚；他跟做母亲的一样担心，不知这孩子会不会是个傻子，他在世界上能不能立住脚……我丈夫就这么叨叨着，满地板都摊着他的书。我瞪大了眼睛，说：“真的？这不可能！……谁听说有像你这样的？你的脑袋不疼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把你往哪儿送？

① 维杰斯拉夫·涅兹瓦尔（Vitěslav Nezval，1900—1958年），捷克著名诗人。

② 指诗集。

是去贝什科维采，还是去波赫尼采[1]？”

就这样发生了第一件不幸事件……我的宝儿爷坐在民族大街的书店[2]里接见读者并签名。我丈夫订做了一套漂亮衣服，还戴了条领带。他的读者都挤在桌子旁边。我丈夫旁边坐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大概是书店的售货员。她将读者递来的书搁在我丈夫的钢笔下面。我丈夫抬起眼睛、直望着读者，问他们该在上面写些什么，然后再在上面签个名。他激动不已，不是什么高兴不高兴的问题，而是被读者们对他的敬意感动得心都变软，甚至左眼都有些斜视了。他坐在那里，的确有点儿像尼科尔斯堡那位犹太牧师的儿子。我当时站在那儿的一个角落里，隔着一本诗集看到我丈夫，我像一个暗探一样藏在这本诗集后面看着。我看见我的宝儿爷在出洋相，他的洋相出在这时他很相信自己，相信那里那些读者。他正是为他们而写的这本《底层的珍珠》啊！我回家仔细一看，他的《珍珠》怎么能比得上史克沃列茨基[3]的《懦夫》和《尼龙年代》呢？即使用《底层的珍珠》中的全部短篇来换契诃夫先生的一个短篇我都会愿意哩！他全是被他那些读者给弄迷糊了。他们把我丈夫看成了一种奇珍，见了我丈夫甚至脸也红了，结结巴巴话也说不清了，为自己能见到这位大作家，并能和他说话而感到幸福得不

---

① 布拉格两处有着专科医院的地区名。

② 原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门市部。

③ 史克沃列茨基(Josef Škvorecký，1924—)，捷克著名作家。他在前苏联进驻捷克后侨居加拿大，不但自己继续写作，而且与夫人共同创办了一家专门出版捷克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史克沃列茨基同时为多伦多大学文学教授。

知所措……我看到书店门口的队伍越排越长，我丈夫的自信也随即增长。他已经有点儿笑脸了，他已经不那么神经紧张。我丈夫只有在利本尼的那些小酒馆里才觉得自在。只要我们一上哪个大饭店，或者去参加什么社交活动，见到那里的人们穿得漂漂亮亮，言谈举止斯斯文文，我丈夫就脸色发白，干点儿什么都出错，或者面红耳赤、结结巴巴，直到我们离开这场合走到门外才恢复正常。他跟这些举止文雅的人在一起总是不停地出汗……可是在这里，在作家签名这种场合里，谁都对他很友善，他看到的净是在作家面前显得很谦卑的人，于是我丈夫便表现得跟在酒店老板万尼什达那儿和在"老邮局"饭馆那儿一样自在。后来售货员们关上了书店正门，书店外面还有许多读者在拍打窗户，可是没办法，已经六点钟了。只是那最后一拨人得到了最后签的名……我的宝儿爷站起身来，仿佛我们是参加完婚礼刚从扎麦切克[①] 回来。他身上一股啤酒味儿，脸上有黑眼圈，嘴边满是深深的皱纹。他招手向书店经理致意，甚至还亲了一下年轻女售货员的手。我们从书店后门出来，在我们身后响起了锁门声。我和丈夫并肩走着，我面带微笑迈着步，用雨伞尖头撑在地上走着，因为我穿的是那双红高跟鞋。我直想笑，因为直到昨天，我的宝儿爷一想起第二天要让他去签名，便心慌得直想呕吐，整夜没睡觉，就像当年在婚礼前一样紧张不安。他嚷嚷着，说他哪儿也不去。每当非去不可时，他就像一头被人用绳子拽着走上屠宰场一样不幸和反抗的牛……如今他走在我身旁，我甚至看得出他在想什么：每

① 利本尼区的一个小宫堡，人们通常上那儿举行婚礼。

个迎面而来，走过民族大街的人，都认得他是一位作家，向他微笑地点头致意，表示问候，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儿。突然，在他把我拽到平卡希酒馆喝啤酒之前，人群中有人在挥手，并大声嚷嚷“你可真棒！干成啦！”然后，他在平卡希酒馆请我吃了一顿，后来又坐到酒吧高台边喝了一通啤酒，他自己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那服务员从锡面柜台里取出来并给顾客们斟上的酒……

我说，“妈妈，这怎么可能呢？我看了一下他那本出了名的书。我读它的时候，总有这么个印象，觉得凡是读它的读者都得在家里继续接着将它写完。我丈夫写的东西就像我采购的半成品食物一样，回到家里还得加工烧煮，尝一尝，让它变成可吃的食物。我说呀，妈妈，我们在家里讲德语，可是，妈妈，我上过捷克学校，他那些短篇小说有点结结板板的，就像坏了的牛奶一样。你怎么看，妈妈？”我婆婆正等着我说这个哩！“姑娘啊！你说得相当对！瞧，他不仅在小学，而尤其在中学，文法课的分数总是‘不及格’或者‘最差’，我说的是捷克语文法。还留过两次级，一次是在中学一年级，另一次是在中学四年级。除了别的好几门课得‘最差’之外，捷克语这门课也总是不及格。姑娘啊，我那个宝贝儿子原来干什么，什么不灵。他十岁的时候开始用钢丝锯在木板上刻些花纹之类的东西，准备做个小箱或者小盒什么的，可是从来也没做成过……后来又集邮，我给他买了个集邮册，他有一盒子很珍贵的邮票，是在阁楼顶间里找出来的。他是怎么把这些邮票贴到那个挺贵的集邮册上去的呢？用阿拉伯树胶！先在邮票背面抹一层阿拉伯

树胶，贴上集邮册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往邮票的正面抹上树胶，结果弄得到处都黏黏糊糊的，他自己身上、我们身上、桌子上都是树胶，头发粘在枕头上……”婆婆说话间忍不住笑了，“要不就学着钉书，照着一本手工手册上写的：先用绳子绑一个框子，把散了架的平装书压在框子下面切齐，然后便开始钉。钉得他斜着眼睛，伸着舌头……后来又做了一个硬书皮，可是那钉在一块儿的书页与硬书皮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总斜着……我的好姑娘，他的手就这么笨，做事儿就是这么不能干哩！你不知道，报纸上登的那些填空游戏、猜词、画谜和智力测验他连一个都做不出来……光会红脸，脑子笨得要命……唉，等他到了青年时代，他又想学摄影，每次从洗澡间钻出来时弄得周身都是显影水定影水，可是一张照片也洗不好，总是有一层烟雾模样的东西浮在上面……开春的时候，他便开始栽种花草，他找来些石头和阿尔卑斯小花……唉，他多少次砸了脚划破了指头，累得死去活来，才把那假山砌出来呀……可是两个月之后，他在那里什么也找不到了。假山已被泥土和杂草埋掉。姑娘啊，从我讲的这些事，你对你的宝儿爷总该有一个印象了吧……后来，德国人关闭了高等学校，他就只好去埃克特贸易学校上学。他知道，尽管他努力了，可仍旧是惟一的一个没有学会速记的学生，他只会打字……学当列车调度员时，我这位宝贝儿子又是惟一的一个没怎么学会发电报的人，其余的人都笑话他哩！……弹钢琴也一样，他的指头不灵，尽管他在演奏，甚至还弹李斯特和肖邦的作品，他自己乐意，可他那手指头总是在钢琴上哆哆嗦嗦磕磕绊绊的。他个人弹琴的时候还好一些，可只要有人看着他的手指或者站在他后面，

他便不弹了，脸一红，不弹了……他惟一能干的就是卖苦力，每个假期都到塞德拉切克博士那儿去装卸黑麦，然后将它们一袋袋从脱粒机那儿扛到粮仓里。塞德拉切克博士的庄园在扎拉比，雇了一个监工和十个收庄稼的女工。我这大学生儿子就在那里打工。大家都夸他，干这种事他行，因为他是块能扛重活的大木板。干重活，这倒是他最拿手的。这又不用动脑子。他码完麦堆之后，便去桥下酒店喝酒，他还在那里演奏斯特劳斯的圆舞曲，那里连乐谱都给他准备好了……可在那里他又把挣的工钱花个精光。他说一口气花掉自己亲手挣来的钱感到特别痛快，尤其是花掉干重活挣来的钱！在克拉德诺钢铁厂时是这样，在废纸回收站打包时也是这样，在剧院当布景工时还是这样，他打杂工干重活还干了四年之久。姑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别的什么也不会啊！一直到现如今，他什么都试过了，看看哪样活儿对他最合适。瞧，真没想到，他竟成了个作家……姑娘，说这是美国式的荒诞作品哩！这一套我也不相信，可报纸上是这么写的，我看得见。我的孩子，扶住我一下，别让我倒了！据说他是走上了一条成为畅销书作者的道路。这可能吗？不可能！可是你瞧，事实摆在这儿！这又是可能的！还说这世界上没有奇迹！？我真担心他还要写出些什么书来，因为如今读者们都反常到极点……谁还去读高尔斯华绥[1]

---

① 高尔斯华绥（Galsworty John，1886—1933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呀？谁还去读阿库巴谢夫呀？谁还去读伊拉塞克[1]呀？啊哈！都来读赫拉巴尔吧！这是咱们的录事员……”婆婆直乐，还拍了一下手……我说，“妈妈，他连个表都填不好，怎么能当作家呢？他什么都填上，可他不是这里丢一条便是那里补一项，填得很糟糕，该填‘名字’的地方，他填上姓；该填‘姓’的那一格，我这位宝儿爷又填上名字；在‘民族’一栏里填上国籍；在该盖公章的地方签上名……每次都挨人家一顿训，要是由我把表送去，我只得红着脸无地自容地跑回来。每填一份表，我都得跑四五趟呢！”我婆婆一直忍不住笑，对我的每句话她都点头表示同意……我说：“妈妈，你还觉得好笑？”

我常回忆起那些珍贵的日子。当我丈夫没有钱的时候，我给他从巴黎饭店带一小锅饭菜回来，他总是很高兴，从来也等不到第二天，便立即把那一锅饭菜热一热，半夜三更用勺子吃着牛里脊肉、焖肉汤或红烧肉。我还回忆起，当我的宝儿爷提着网兜去取书籍出版的预付酬金时，我真希望有人把这些钱偷走，可是人们却以为我丈夫的网兜里装的不是上万克朗，而是什么没中着的彩票之类的东西。他提着这个装着巨款的网兜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里瞎逛，上酒馆，把装着上万克朗的网兜随随便便挂在墙壁哪根钉子上。

如今他不仅换了饭店、啤酒馆，连朋友也换了。他自己花

---

① 伊拉塞克(Alois Jirásek, 1851—1930 年)，捷克著名历史小说家，著有《杨·胡斯》、《抗击众敌》等以捷克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数部历史小说。

钱喝啤酒还不算，还一个劲儿地为朋友付啤酒钱。他很少去哪儿喝葡萄酒，即使去了，也呆不住。可他必须上啤酒馆，因为他更爱的倒不是啤酒，而是啤酒馆里那些无聊的贫嘴、那股疯疯癫癫的闹腾劲儿。总之，他热爱那里我所讨厌的一切。我在这种小酒馆呆上一个钟头就被那股烟味酒味儿熏得头晕脑涨。可我丈夫还偏偏喜欢酒馆里这些乱七八糟东拉西扯的瞎侃神聊。如今他喜欢上了平卡希酒家和作家出版社对门的瓦洛希酒家。如今他又和另外一些朋友到金桶酒家去喝啤酒，到伏尔塔瓦河对岸的奥林匹亚酒家去喝啤酒，喝的是他最爱的名牌皮尔森啤酒。有一次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那里又有一些他的新朋友。我非常喜欢那位很帅的林基先生，还有那位给我丈夫编书的杜哈切克先生，他是个大酒鬼，他在奥林匹亚酒家给我看了他的每日啤酒消耗账目本，五年内总共喝了约一万五千瓶半公升装的啤酒。这位杜哈切克先生来自农村，可是如果有必要，他敢跟个彪形大汉拼命。那一次，他站起身来，挥手要打架，可到后来他克制住自己，决定不去理睬那个大汉。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位名叫卡雷尔·贝茨卡的先生，剪短发，挺好的一个人。他的头发浓密蓬乱得跟刚释放出狱的犯人一样，我还真的以为他在监狱里呆了十五年哩。他开始写作，我丈夫读了他最初写出来的那些短篇小说，立即将它们交给了出版社编辑杜哈切克和托斯达尔先生。阳光透过窗口射进了奥林匹亚酒家，屋子里很舒服，我丈夫的那些朋友都非常快活，快活得有些离谱了。我丈夫的网兜里装着预付的一笔稿酬一万五千克朗，全是一百克朗一张的钞票，零零散散地塞满一网兜，他提着就像提着两斤菠菜那样。每隔十五分钟服务员就端来一批

啤酒。后来，进来一个人，就让酒馆门在他身后大开大敞着，他有一副很漂亮的男高音嗓子，唱着“我到马可斯城去玩，那里的幽默笑话堆成山……”随后又进来一位戴眼镜的，人们向我介绍说他是画家米古拉什·麦德克。走来几个女招待员，恭恭敬敬地欢迎这位画家。问他想喝点儿什么，米古拉什·麦德克要了一份维尔木特酒[1]，有个戴眼镜的服务员问他：“麦德克先生，您还要点儿别的什么吗？”画家要了一个深底儿碟子。服务员笑了：“要这个干什么，麦德克先生？”他回答说：“我呕吐时用。”我站起身来和大家告别，可我只跟林基先生握了手就离开那里。后来我才知道画家米古拉什·麦德克有糖尿病，他一喝多了维尔木特酒就要呕吐，所以要一只盛汤用的深底碟子。

实际上是我给自己安了个套环，事与愿违。我本来建议我的丈夫呆在家里写作，由我来养活他。头半年确是这么个状况。到后来他不仅不需要我给他用平底锅从我干活的饭店里端些饭菜回来，连那五十克朗零花钱也不用给他了；恰恰相反，他钱多得让我吃惊。随着我没想到的他的成就，开始了他的国外旅行。有一次同作家们坐大轿车在奥地利兜一大圈，我给他当的向导，那一次科拉什[2]先生也去了，所有的诗人一个个真像当诗人的模样，只有我丈夫像个不再踢球的足球运动

---

① 法国、意大利一种不带甜味的苦艾酒。

② 科拉什（Jiří Kolář，1914— ），捷克当代诗人、美术家。早年写诗，后来弃诗从画，通过打破诗画之间的界限而跻身于世界现代造型艺术权威人物之列。从1976年起定居柏林和巴黎，在全世界举办画展。

员，像一个农民。

后来又去了英国、法国，然后又到了美国，在那里同作家阿诺什特·卢斯蒂克[①]成了朋友。他也不像个当作家的模样，一头鬈发和一张像小姐那样秀气的脸。当我得知他在特雷津[①]集中营呆过整整六年，从十六岁起就受过这么大的磨难时，我几乎不敢相信。他不喜欢德国人，听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德文字。阿诺什特知道该吃什么，他吃蔬菜和肉。而我丈夫，不管给他吃什么，他都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他们住在巴黎的纽约宾馆和伦敦火车站附近圣·拉扎尔饭店时，还没等到汤和冷盘上桌，尤其是我丈夫，便饿得把摆在桌上的所有面包和芥末吃个精光。我甚至为没有跟他们一道去这些地方而感到高兴，要不然我会为我的这个没有吃相的宝儿爷而感到害臊的。当他们来到伦敦机场时，正赶上一伙工人抬着一架三角钢琴，我丈夫突然莫名其妙地离开了代表团，像倒车一样用手指挥工人们该往哪儿搬这架钢琴。结果，我丈夫将这些倒霉的人带到了下面一层的地下室里，又从地下室往下搬到地窖仓库里，他们本该把钢琴搬到三层楼上面的餐厅里去的。工人们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中找到我丈夫，真想狠狠揍他一顿。布拉格的作家们拿他好一阵开心，斯洛伐克人更是骂我丈夫说他没给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长脸……

---

① 阿·卢斯蒂克（Arnošt Lustik，1926—　），捷克当代作家、剧作家。曾多年被关在集中营，1968年到以色列，后到南斯拉夫，现已定居美国，讲授电影与文学。他的作品多描写犹太人的命运。

我听说，卢斯蒂克[1]，每当他的孩子们闹得他没法写作时，他便提着一个篮子进城去，买上满满一篮柑橘、香蕉、巧克力和其他好多吃的回来，把孩子们叫到跟前，指着一篮子东西对他们说："瞧瞧！你们的爸爸需要写作，而你们却闹翻了天。如果你们能安静下来，这一篮子好吃的就是你们的。你们为什么能得到一篮子好吃的呢？因为你们的爸爸一写作，就能够挣到钱；可你们要是像野兽一样吼叫着，爸爸就没法写，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得到个屁！"卢斯蒂克先生还有一件事使我很喜欢他这个人：他为了能够安静地写作，由于那一篮子好吃的没起到作用，孩子们还是太闹。于是在罗乌比奇科瓦·霍达买了一所小木舍。当卢斯蒂克终于能坐到窗前的打字机旁，准备在萨扎瓦河边这座小屋里安安静静写作时，突然一声巨响，震得小木屋都微微跳动了一下，可是阿诺什特继续写他的书。到中午那爆破声又接连不断，吵得他都觉得家里虽然孩子们闹，也比这里清静得多，他还不如在家里写作。他于是朝发出爆炸声的方向走去。发现在他的小房子后面有一个花岗石采石场。他问他们大概要在这地方采多久，人家告诉他说，这是用来筑高速公路的，说每天两班倒。卢斯蒂克后来只是微笑着问他们这里的花岗石要多久才能开采完，他们回答说："不会太长时间，大概十年左右。"我丈夫对我说，他从来没见过像阿诺什特这样愉快、这样逗人爱的伙伴，说他们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纽约，总是住在一起。说所有航空小姐都爱上了卢斯蒂克先生。在巴黎时我丈夫一大清早便醒来了，只有实在太累时才能睡

① 卢斯蒂克即阿诺什特。前者为姓，后者为名。

着。他们睡觉的时候总是敞开着窗户，而在火车站附近的圣·拉扎尔饭店喧闹得让人根本没法睡觉。一大清早就有两位航空小姐坐在阿诺什特的床边，梳理他的鬈发，她们为能给作家梳头而感到荣幸。阿诺什特坐在那儿，穿着睡衣，胖乎乎的，也睡足了。他那样子，仿佛从来没在集中营呆过；恰恰相反，倒像从小过的奢侈、富裕和舒适的生活。我丈夫告诉我说，在纽约时，阿诺什特走遍所有他熟悉的犹太区。那里不仅出版了他所有的长篇小说，也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我丈夫醒来时，阿诺什特还在睡觉。他的床周围总有许多编辑在坐着、躺着和抽着烟，等着阿诺什特醒来，以便跟他谈话和签订合同。他们不仅想要他那些已经写出来的书，而且还想要他那些准备要写的书。而阿诺什特一醒来，总是对我丈夫说："你这个难对付的家伙，咱们今天去看望一下卡赞[1]，不管你到哪里想喝啤酒，我都给你买一听最好的一拉罐。"于是我丈夫便跟着阿诺什特几乎步行逛遍了全纽约。他还告诉我说，有一回他们出了旅馆门，来到二十八街。突然响起一阵枪声，警察们握着扭开了保险的连发手枪正朝着地铁口射击，从地铁口又有人朝外放枪。人们有的惊慌逃跑，有的趴在地上，跟在电影里一样。胖乎乎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阿诺什特·卢斯蒂克走到那个正弯着腰、举枪对准地铁口的警察跟前，轻轻拍了一下警察的肩膀问道："请问，这里什么地方有邮箱？"

这一回，我丈夫让我到婆婆那里去，把他已在宁城付了钱

① 卡赞(Elia Kazan，1909—)，美国导演、作家。

的五公斤早熟梨取回来。我和婆婆坐在一起，对她说了好多好多话，不算诉苦告状，因为我对婆婆说到的关于我丈夫的事情，都引得她哈哈大笑，因此她除了交给我这五公斤梨子之外还添了一只小花猫，并且对我说："要是小猫还帮不了你的忙，别的任何东西也就无济于事了。因为你那位宝儿爷在家十年来最喜爱的就是猫咪。"于是我便把小猫带回家。等我丈夫东奔西跑回来，他一看见这只小猫，便连对那些梨子也没想起问一声。我看到了我以前在我丈夫身上没有发现的东西。他见到这只小猫又惊又喜又激动，立即给它端来牛奶。等它挑肥拣瘦吃饱了，我丈夫便用小木箱为它铺了个床，然后又给它找来一个旧盒，里面放些沙子。这个晚上他哪儿也没去，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小猫，抚摸它，伸给它一个手指头让它蹲在上面，将它挪到他的脸旁，说这样的小猫咪能消除忧愁和痛苦，说这种小猫咪很懂感情。他马上铺自己的床，将小猫带上床去睡。小猫紧紧依偎着他，可我丈夫呼出来的气带有一股啤酒味，小猫连忙转过脸去睡，我丈夫不得不立即起床刷牙，于是小猫便挨着他的下巴美滋滋地睡着了。我丈夫面带微笑，小猫则抓着他的手指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丈夫不想让小猫在夜里也都这么挨得太近，只得自己让开它一点儿。就这样一整夜都姿势很不自然很不舒服地睡着。小猫咪嘬着他的指头，而我丈夫，我的这位宝儿爷觉得很幸福很惬意，因为小猫咪的粉红小嘴巴在触碰着他，且睡得那么香甜……

从我带回小猫咪的时候起，我丈夫变了个样儿，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地去酒馆了。晚上他总是尽量呆在家里，把两个炉

子都烧得暖烘烘的。他好像已经充当了小猫咪妈妈这一角色。我的宝儿爷不仅养成每晚刷牙的习惯，而且一到晚上便不再喝啤酒，免得嘴里有股味儿。不管我什么时候醒来去看他们，总看见小猫咪在嘬我宝儿爷的指头。尽管后来小猫咪已经长成一只大公猫，可他们还一直是这么睡觉的。大公猫从来没有在不躺在我丈夫身边嘬着他指头的情况下睡着过。我们给这只公猫取了个名字叫“艾当”。艾当十分爱我丈夫，它每天盼望着傍晚到来。我一铺床、一抖床单，艾当便一溜烟钻到床单下面，摸黑在那里玩耍。我也爱上了这只猫，仿佛它是我们的孩子。它白天喜欢在顶间阁楼里取暖，呆在我丈夫打字的地方。如今即使我在家，他也写作，因为有猫儿坐在他身旁，且很内行地看着打字机上的键盘，又满怀深情地看着我丈夫。一会儿又爬到我膝盖上来坐一坐，然后再回到我那正在写作的丈夫那里去呆着。这小动物简直成了我丈夫的缪斯啦。可有一天出事了：猫儿没回来，整整一夜都没回来。我丈夫非常着急，他走出家门，找遍各个板棚，第二天又到各邻居家里去打听他的猫是不是去过他们家。我的宝儿爷还跑遍街上的每座建筑，那些已经无人住的地方。他喊着它的名字，细听有无它的动静，心里越来越着急，老觉得他的小艾当在某个什么地方喵呜叫着。可是这猫到晚上、夜里都没回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丈夫起床，我也起了床，才发现艾当站在半开着的窗台上，举着一只小爪子。它一脸惊色，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家，它这家里的一切是不是安然无损。我丈夫喊了它一声，艾当一步蹿进厨房，狼吞虎咽地喝着牛奶，一会儿又停止喝奶，瞅瞅我，看看我丈夫，有点像对我们表示谢意，之后又接着喝牛奶，喝着喝着

又停下来，望望我们。我们俩都知道，它要是没有我们恐怕得饿死，说不定有人会宰了它。我们两口子互相深情地对望着，而且久久地亲吻着。我们互相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我们彼此是多么地深爱着对方。猫儿也看到了这一点，先在我丈夫怀里蹲一会儿，后又到我怀里蹲一会儿，过一会儿在我身上扭动几下，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眼睛含情脉脉地瞟瞟我。我以前从没养过猫，这会儿才逐渐地体会到，动物是怎样来表达它们心中的爱意的。从猫儿这小脑袋瓜子里产生出的这种情感力量，是我无法拒绝的。我也闭上眼睛，碰碰它的脑袋，我们就这样交流着爱意，彼此都感到很好。真有点儿像我跟我丈夫在结婚之前交往的那种感觉，就像我给他从巴黎饭店带回一小锅饭菜、从我每次上班后得的小费中拿出五十克朗塞给他的那种感觉……

每当我还在上班，我丈夫泡在小酒馆里的晚上，我们的艾当总是在堤坝街24号主楼的烟囱背后等着我们。在那里它有个瞭望点，从它这个瞭望点可以看到街道拐弯处，看见我们怎样从这拐弯处的煤气路灯下走出来。要是我丈夫到电车站去接我，我俩便一块儿回来。艾当蹲在屋顶的烟囱旁，谁若走到那街道拐弯处，它便伸出小脑袋，使劲盯着，好看清来人是谁。要是我一个人，或者跟我的宝儿爷一块儿走来，我也每到那拐弯处便借着路灯的微弱灯光朝我们屋顶的烟囱那儿看。不管是我、还是我丈夫，只要看到那颗珍贵的猫头，而它也发现了我们时，它便立即消失不见，因为它在屋顶上等了那么久的我们终于回来了，它自然欣喜若狂，忙着下楼迎接。我们一去开

大门，它便在门里边喵呜叫上一声。等我们开了门，它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迎接我们：急急忙忙跑过来，在我们脚旁蹭来蹭去。到了过道上，它便伸直一条后腿一条前腿，然后又换过边，伸个懒腰。我或我丈夫便弯下身去拍拍它。这时，猫儿闭上眼睛，站起来，抬着前腿在地上蹬那么一会儿，因为它知道，我们中间的一个会将它轻轻抱起，放到怀里，亲亲它的脸。这只猫便仿佛晕了过去，呆着一动也不动。这时，我们也往往同它一样感动……

慢慢地，我已经预料到，我丈夫将继续像个体面人那样工作下去。我的宝儿爷写出三本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了。每出一本都得到出版社的奖金；每出一本，即使印数高达五万册甚至十万册，却也总是在出版的第二天便已卖得一本不剩。我丈夫同意哪天晚上我们一道去遛遛布拉格的街道。书店橱窗里将陈列着他的书，我们将浏览这些满是他名字的橱窗……这一切都曾经仅仅是梦啊……我看到，我丈夫的读者仿佛都始终走在他的前面，仿佛他们打了赌，看谁会追上谁，谁打垮谁……读者们在继续消化掉我丈夫这些简单得像小学一年级的识字课本一样的乱七八糟的文字。我宝儿爷写的那些东西越来越大胆甚至放肆。在文中说些通常不能大声说的东西。他自己也为与读者的搏斗而感到害怕和吓一大跳，认为总有一天会要落得个坐大牢。他所有的错误行为、他所有的劣迹都会拿到法庭上去理论一番，这我倒高兴。眼看我丈夫写东西越发放肆，我也幸灾乐祸地觉得，他这回只得闭上嘴巴挨罚了，可是他每次都摆脱了这一厄运，甚至还获奖，甚至在国外也开始

出版他的书……

我在《人民民主报》上看到一则广告：出售在克斯科的一栋郊外小木屋，售价为四万克朗，我立即想像出一座森林边的小木舍。我丈夫将在工作日来这里，我则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来这里。假如我的宝儿爷有了这栋小木舍，他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没命地写作，等他把那点儿没写完的文稿写完，他就会对他的写作道声阿门。因为我丈夫不会再有继续写下去的理由，因为他除了有我、有猫之外，还会有一所小木舍。我已料到，如果我们能得到这栋小木舍，我的宝儿爷将会在木舍的每间房子里生上火、点上炉子。在没有炉子的房间里，他会想法去安座炉子，在没有烟囱的地方装上个烟囱。一生起火来，他便会从一个炉子走到另一个炉子那儿，不停地往里面添柴火。有了小木舍，他就会老上森林里去。从我们过去的散步中我已经看透了他，他只要见到一株漂亮的白桦树，一棵漂亮的云杉，便立即站不住，久久地盯住这株白桦、这棵云杉。我得格外注意，生怕他会跟这株树长到一块儿，再也变不回来了。于是，我们给刊登售屋广告的人去了一封信，并等着他的回音。

后来那人回信了，我们为克斯科小木舍付了定金，然后又亲自去那里看了一下，接着便找公证签合同、补付款子……我丈夫一门心思惦着这一小片将属于我们的林子和小木屋，简直等不及人家交出钥匙。他搭坐公共汽车往那儿跑，步行着在那周围转悠，仔细欣赏林中的云杉和白桦，欣赏这些已有一百三十个年头、即将属于他的古树。他感兴趣的不是这栋房屋，

而是这些白桦和云杉。这块即将属于我们的一小片林子附近的邻居，看见来了这么个陌生人，都纷纷感到不安，甚至准备搜捕他。他一再向他们解释，可是邻居们仍旧坚持让他快离开这儿，否则要去叫警察，说因为经常有很多流氓无赖在这里晃来晃去。搬来前，我们试用了新买来的小汽车，接着房主将钥匙、合同书交给我们，一小片林子、一个小不点的厨房和一个小房间便是我们的了。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丈夫立即叫来了泥瓦匠，又在屋子里装了个炉灶、修了个烟囱。即使天热，他也生着两个炉子，厨房里一个、房间里一个。因为林子里的住房很潮湿。可是只等我们一暖和过来，我的宝儿爷便开始筹划起来，说是要加盖一层楼，把屋顶掀掉，在那里弄一间工作室，斜顶的，锡片屋顶，可以听得见雨声，就像在啤酒厂时那样。就在他满脑子这种计划的期间，他成天绕着白桦、云杉转来转去，每次散步回来都精神抖擞。他完全丢开了写作，哪儿也不去，也不在家里请客设宴。他像着了魔似的迷上了这个地区，像他小时候那样，像他成了个年轻小伙子时那样迷恋着这个地方，那时，他跟宁城的姑娘们常常一直散步到这里，沿着小河一直到克斯科的森林这边……

"妈妈，"我说，"请您别生我的气，我可越来越觉得我丈夫的写作有点像他们过宰猪节[①]那样乱七八糟的。妈妈，可惜您

① 秋末冬初，农民在家里将猪宰了，请客设宴，有庆祝一年收成之意。赫拉巴尔和他的朋友们却在宰猪节喝得酩酊大醉。

没有听见咱那位宝儿爷是怎么跟诗人马利斯科[1] 谈论宰猪节的。您知道，他们是多么盼望这个宰猪节啊！他们俩鬼鬼祟祟地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妈妈，他们甚至去买了一本关于如何宰猪的斯洛伐克文手册来看。书名叫做《家庭宰猪》，一买就买了两本。他们像读《圣经》一样地读着这本书。还在姆莱克·卢科斯尔比，他们的朋友博列克家养了一头小猪。博列克的太太叫米莱娜。有一次，我们还到他们家里去了。马利斯科拍了拍那头小猪告诉我说要过一次宰猪节。那时我还有点儿不相信。不过，不信也得信，因为他们什么都已商量好了，甚至还请了瓦德曼·马杜什卡来帮忙宰猪。只因为马杜什卡到附近的巴德克一所学校去了，宰猪的事只好延期。博列克只好给大家发电报说：'我病了，宰猪宴延期。博列克'。如今又来劲儿了。妈妈，上星期我丈夫和诗人马利斯科想要过宰猪节了，于是我们又坐火车到姆莱克·卢科斯尔比去。天气冷得要命，我的宝儿爷买了一瓶松子酒，在车上便把这瓶一公升装的酒喝光了，弄得满车厢都是松子酒味。后来，我们下了车，从赫卢麦兹朝姆莱克·卢科斯尔比走，走到大街上，马利斯科仰面摔了一跤，脑袋磕在硬石块地上，准备送给米莱娜的三公斤柑橘全撒在地上，马利斯科便躺倒在这一大堆柑橘之间。我丈夫乐坏了，说他朋友躺在柑橘中的那样子非常好看……真丢人哪，二楼有扇窗户被推开，正在午睡的林区主任被吵醒了。他穿着一身制服探出头来嚷道：'你们还算知识分子？'等到马利斯科先生

① 捷克诗人、民族剧院的大提琴演奏家，赫拉巴尔终生最亲近的一位朋友。

明白过来，他满肚子怨气地想像着：要是我丈夫摔倒了，他肚里那一公升尼特拉产的松子酒准会全喷出来……我们就又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妈妈，真要命！……”

“这算什么？”我婆婆说，“姑娘，你得习惯这些。他跟这位诗人，好些年前就已经喝醉过好几次呢，这才要命哪！有一回，在马利斯科先生住着的那个地方，在地窖里，也这样喝松子酒喝醉了。那天正赶上大礼拜五，我那宝贝儿子理所当然是他们中间喝得最多的一个啰，因为他想当作家、当运动员、当尖子、当世界冠军嘛，于是便拿松子酒当水来解渴……马利斯科先生喝得糊里糊涂的，只知道将我儿子放到一辆手拉车上，车子从自来水厂一直拉到啤酒厂，一路上只听得马利斯科家的铃铛响个不停，让所有打开门或从窗口探头出来的人都来看热闹，亲眼看看我那喝醉的儿子怎样躺在小车上。他们把他一直拉到啤酒厂。咱家奶奶打开门，她眼神不大好，连忙跑到厨房里惊慌地说：‘他们把波尔压死啦！’波尔是我们家那条狗，幸好不是波尔，而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不得不去请大夫，因为我儿子晕过去了……姑娘，跟他在一起呀，你有的是快活日子过哩！”

我说：“妈妈，等我们来到姆莱克·卢科斯尔比，他们那一通热烈的拥抱啊，可真叫欢天喜地！米莱娜肯定是喜欢上了诗人马利斯科。我们立即打开松子酒，做好了过宰猪节的一切准备：院子里摆上了木盆，仓房门大敞着，里面摆满了烤好的小甜面包，是配小香肠吃的，到处摆着一罐罐麦片粥。他们已经

不给猪喂食了，好让它到第二天早上消化一空。大家先吃买来的粗香肠，开好的猪肉罐头，还喝掉了所有的松子酒。我丈夫和马利斯科先生都很开心，他们感到美中不足的只是勃勒东[1]、还有艾吕雅[2]和扎拉[3]没能和他们在一起。博列克直接捧着瓶子灌啤酒，他们笑个不停，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笑，站在那里发呆。博列克也勉强算个诗人。妈妈，他可会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哪！有一次我们在索依克家，博列克来了。好多画家和我丈夫的朋友们坐在那里，博列克说：'对不起，朋友们，我来晚了。我刚从律师那里来，为庆贺我妻子的生日我买了所别墅。'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博列克接着说，他需要一位画家去帮他装饰一下原来的家，在赫卢麦茨的庄园跑马场，说他在那里养了些栗色马和乘骑。说这画家的任务是给跑马场画三幅大画，六米长的，说他可以为装饰这跑马场花上二十万……妈妈，博列克于是与汉普及鲍什两位画家谈妥了这事儿，可是到后来，妈妈，啥事也没成。真的，就像许给米莱娜的那所别墅一样，也像那次请了瓦德曼·马杜什卡来办宰猪节一样，没兑现。后来，我们打着灯笼走到地窖里，那里淌着水，还放着一个大木盆。米莱娜将腌肉放到卤汁中入味准备熏制，诗人马利斯科和我丈夫对每块肉都闻一闻，尽管它们臭得要命。等他们把这些肉重新码好之后，便拿了一块后臀尖上来。米莱娜用块鲜

---

① 勃勒东(Breton, André,1896—1966年)，法国作家、诗人，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② 艾吕雅(Eluard Panl,1895—1952年)，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③ 扎拉(Tzara Tristan,1898—1963年)，法国诗人，达达派创始人之一，后为超现实主义者。

红的肉做成肉排。后来，哈利什博士开着小汽车来了，他也喝得醉醺醺的，可他是一位很帅的男人，衣冠楚楚、脸刮得很干净。他跟马利斯科先生很合得来，因为马利斯科是民族剧院音乐大师、大提琴二把手，而哈利什则是位大提琴业余演奏家。哟，妈妈，他们好一阵热烈拥抱啊，特别是当哈利什隆重宣布说他的情人昨天生了一个小女孩，他得去赫拉台茨·克拉罗维看望她时，气氛更加热烈。后来，米莱娜对我说，哈利什博士在大学教书，那儿有个女大学生爱上他，如今给他生了个漂亮的小孩。哈利什博士还说他今天晚上得赶回家去，他女儿今晚要举行舞蹈课结业式，他得穿上礼服去参加。那我下午宁可跟哈利什博士一道坐车去赫卢麦茨，我答应明天一大早再跟诗人马利斯科的太太一道来参加宰猪节。妈妈，跟哈利什先生一道坐车可真是一种冒险，他因为生了个小女孩而兴高采烈得几次将车子开到沟里去了。快进城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不去参加女儿的舞蹈课结业式了，而要回家去取大提琴，然后立即回到姆莱克·卢科斯尔比来，说是不能丢掉一个机会，让眼下头脑尚清醒的马利斯科用大提琴至少演奏一段安东宁·德沃夏克[①] 的音乐，以庆祝明天的宰猪节，说因为天才的作曲家德沃夏克也曾经是学当屠夫出师的。”我哭笑不得地将这一切讲给婆婆听，可是婆婆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可难过的。我看到她还感到很高兴哩！她仰望着天花板，然后对我说：“你瞧，姑娘，我算是已经熬过了这一切，如今就轮到你来适应这些事儿啰……

① 德沃夏克(Dvořák Antonin，1841—1904 年)，享有世界声誉的捷克作曲家，与斯美塔纳同为捷克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代表作有：“自新大陆”交响乐、歌剧《水仙女》、《魔鬼与卡佳》。

我说，你就把这生活当做美国滑稽怪诞作品来看吧！……后来呢？”

我说：“妈妈，等我们回到姆莱克·卢科斯尔比时，已经是中午了。只有博列克一个人还算是个活人，直接拿着瓶子在喝啤酒。米莱娜则冲着那年轻的屠夫大发雷霆：‘我要宰了他！’她挥着一把沾满油的大刀直嚷嚷‘我要宰了他，他把我的香肠全糟蹋了，他往里面搁了半斤姜，给我把香肠做成姜肠了！’……院子中间一摊猪粪水，旁边是一堆猪粪，粪堆上停着一辆斯科达小轿车，车门敞着，方向盘面前躺着不省人事的哈利什博士，他一只手耷拉在车门外，猪粪水一直齐到了他手腕那儿。哈利什博士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心满意足地微笑着……后来，妈妈，从仓房里出来一列奇怪的队伍：年轻的屠夫肩上扛着半边猪，走到最前面，屠夫旁边的是诗人马利斯科，他的脸贴在这半边猪的后臀尖上，傻呵呵地微笑着，手里拿着一根香肠，就这样脸一直不离猪后臀尖地跟着屠夫走进敞着门的屋子里。在他们后面跟着一个喝得烂醉的男人，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根据他的衣服认出他是咱家的宝儿爷，我丈夫。他端着一大锅生猪油，身上一直穿着在民族大街巴尔达那儿缝制的那套新衣服、新衬衣，戴着那条很贵的、但已经弄得满是油渍的领带，脚上那双我给他从维也纳带来的漂亮皮鞋上沾满了猪粪……米莱娜在催我们：‘快来吃吧！挑自己喜欢吃的吃！香肠和碎肉猪血肠已经放在黑麦秆上了，别像块门板似的站着不动！’于是我们各人拿了个碟子挑些自己爱吃的吃了起来。可是诗人的太太维拉一直被她所看到的一切吓得傻

呆呆的。我在车上听她讲过她爸爸一直想根据头衔证件争取个男爵封号叫冯齐克尔什么的，她自己根据历史文献也该是女爵冯齐克尔什么的……喏，妈妈，维拉在厨房里担惊受怕地说：'我丈夫他怎么啦，米莱娜？'米莱娜边倒猪肉粥边挥一下手，显得毫不在意。维拉还是心事重重：'他就那么难受？'米莱娜喝了一大口松子酒说：'咋不难受啊！早上躺在打谷场上直喊：拿刀来！'妈妈，我从窗口那儿看到我丈夫穿着那身漂亮衣服用一把刀将猪板油切成小方块，就像他写作时那样全神贯注地切着……我当时气得真想捅他一刀，一直刺到他的心脏……可是一心想获得爵位封号的维拉还在追问米莱娜：'我丈夫他吐了吗？'眼边露出了青筋，由于中风而使得脸稍有些歪的米莱娜又挥一下手，在走到院子去之前，大笑着说：'要真吐了倒好！'……后来，诗人马利斯科全身油污走进来，这都是他的脸挨着猪后臀尖蹭的，他对大家说：'热烈欢迎！美妙动人的女仙们！米莱娜，我饿了，给我来一份香肠和汤吧！我今天不吃面包，要啃猪耳朵。'妈妈，这就是你说的什么美国荒诞滑稽作品。妈妈，哈利什博士，就是那个手都耷拉到粪水坑里的人走进了厨房，睁着那双漂亮的眼睛站在那里说现在是请卡雷尔[1]、民族剧院乐队第二把交椅用大提琴演奏德沃夏克一段乐曲的时候啦……"

婆婆笑够之后，挥一下手，意思是我讲的这些跟她等会儿要对我讲的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通过交谈，不仅我婆婆，还

① 即马利斯科。卡雷尔是他的名，马利斯科是他的姓。

有我自己都开始为下面这个问题在找答案，那就是：她的儿子为什么曾经是这个样子？而且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当婆婆将他交给我时，我们俩都认为我们能把他变成一个有礼貌、体体面面的人。可是他，就像我，还有我婆婆所见到的，还是那个老样子；为什么他过去、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他吃起东西喝起酒来总想要当尖子、当冠军？实际上他是个羞怯胆小的人，他为什么还老躲着我们？而在他实在没处可躲的时候，他便当着外人的面丢人现眼出洋相。婆婆回忆每次宰猪节时，她的儿子吃起香肠血肠来就是撑破肚皮也要抢个第一名。每逢我们有客人的时候他便来劲儿，而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便拿着一根冷香肠，将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而且只要一根就够了，配着面包吃，只喝一点点啤酒。秋天一到，我们总是从饭店老板那里买来许多山鹑，总是烤上满满两盘，十六只山鹑。我的那位宝儿爷，只要有客人，他就要在他们面前逞能，一气吃掉四只。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他便只吃一只最小的、或者一只熏的山鹑。我常从熏肉灶那儿提来满满一筐，要是只有他一人在，他只吃一点儿，可要是有客，他就要吃好多好多，而且不吃面包，让客人看了很不体面，到第二天，他便躺着起不来，病了……为什么他要干这一切呢？……

我说："妈妈，我这位宝儿爷啊，他总像干了什么错事似的。他自己也常说，他一直有种感觉，仿佛自己得了张坏成绩单似的不敢回家。妈妈，这肯定在很早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他如今老躲着人，他不喜欢呆在家里，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如今，妈妈，我们买了这栋小木房，又怎么样呢？他要是上小酒馆去了，那倒好。可是警察队长对我说，他常常用望远

镜观察一个人，那人总是躺在地里的麦秸堆里。队长然后开着他的车子在他的管区转了两个钟头，回来时，看见我丈夫仍旧躺在麦秸堆里，摊着两只手，睁眼望着苍天。妈妈，你知道吗？有条路直通到草垛这儿，有两条走拖拉机的道路也通到那儿，紧挨麦秸垛前面还飞起过小型直升飞机……而就在那里躺着我那宝儿爷。他躺在那里连肩膀都快被遮住了……他躲着我跑到这里来了，只有这里才有安宁。队长向我这么通报说……”

婆婆变得严肃起来，她好像有些沉重，不怎么乐意地回忆着对我讲述道：“其实我也曾见到他爬着梯子到牲口房里去，姑娘，那里铺了些干草，足够八匹马四头牛躺的，他在那里一呆便是好几个钟头。有时，他又跑到下面那片林子里去，在两棵白桦树旁用洋铁片搭了这么个窝棚，还装了栅栏。窝棚没窗子，他常常呆在里面，炉子里还生着火。外面出着太阳，而我儿子却钻进了黑暗，钻进这么一个只能坐着的小窝棚里……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就不乐意回家，常常站在厕所墙角里，跟个没有爹娘的孩子似的。等到他当了大学生，又经常爬到阁楼顶间里。一下雨，那洋铁皮做的屋顶便叮当响，可是我儿子把木板钉在一起，做成了这最后的角落，那儿有个看得见天空的小窗子，我常常听见他一步一步上楼梯……实际上他是从啤酒厂逃到利本尼的。为什么？大概也只是因为堤坝巷那儿没有阳光，连夏天都得生炉子取暖的缘故。但他逃来利本尼的主要原因是他可以一个人呆着，一切都由他自己安排，自己去买，自己去粉刷墙壁……可是现在，姑娘，现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蜷缩到麦秸垛里，几乎埋到肩膀？我要给你说的已经不

能算做荒诞滑稽作品，没准说到底还是荒诞滑稽作品？那就是：在我还没结婚的时候就生下了这个儿子。在那个时候这种事是丢人的。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妈妈忙着做午饭，我对爸爸说我怀孕了，我男朋友现在还不愿意娶我。脾气暴躁的爸爸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拖到院子里，然后拿着他的猎枪对着我嚷着：‘跪下！我要毙了你！’我吓坏了，合着手求他……幸好我那明白事理的妈妈走出来，说：‘别这样！快来吃饭，要不就凉了！’……”

事情发生在早上，我发现我的宝儿爷躺在地上。起初我以为他又喝醉了。有时他常踉跄跑回来，如果我在上班，他便上床去躺着，就这么躺上好大一会儿，根本就看不出来他那副踉跄醉相。他也不胡来，相反还显得很可爱很乖，因为他躺在床上，还满脸笑意。可他突然翻来覆去扭动着身子，呼唤上帝把他带走，还对我说，在他肚子那儿，在他肝里，就像有人用滚烫的钥匙在捅他的肝脏。他刚一说完，便又爬到地上打起滚来，身子缩成一团，又想吐，又往厕所跑。他脸色刷白，眼睛却显得特别漂亮。他求我拉着他的手，向我许诺说从今以后要改好，只喝矿泉水，说要开始新的生活，又让我握着他的手，抚摸他。他抱起猫儿艾当，把它当做饰物一样搁在脑袋上，可是猫儿却离他而去，甚至敌意地竖起耳朵，凶得像一匹要咬人的劣马，然后钻到了床底下。我丈夫从这里看到一种预兆：猫儿能预感到它主人的死亡。他于是又呕吐了，求我别离开他。他哭诉着，哀叹着，我给他拿来一只小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他得了这场病反而感到高兴。仿佛他的胆囊听到我的请求，仿佛

他那肿大的肝脏就是对我的好心劝说与警告的证据的一个句点和惊叹号。我曾多少次求他别喝那么多，别吃那熏猪大腿，别吃沾了好多胡椒的咸肥肉。他越是哀叫或是叹息，我越是窃笑，将小桶推到他跟前，他对着它吐得死去活来。当猫儿从床底下走出来时，全身的毛都竖起来，它朝这个装着呕吐物的木桶一闻，忍不住立即从敞开的窗户跳出去。我按照我丈夫的要求打开了所有窗户，他一直请求给他放些新鲜空气进来。我的宝儿爷就这样开始跟我告别、跟利本尼告别、跟布拉格告别、跟他的朋友们告别……就像他喝醉酒回来时那样，他喝醉回来总是痴头呆脑地傻笑着坐到我的脚上，要不是我把脚缩起来，他差点儿把我的腿都坐断。他就这么坐着，笑眯眯地对我说，有哪些哪些人向我问好："米尔达，就是那个击剑运动员向你问好。沃拉吉米尔向你问好，那个瓦夫拉的哥哥大瓦夫拉向你问好，他要在'青年阵线'出书了，马利斯科和布希尔也让我代他们向你问好，还有'公猫'饭馆的领班服务员一百次地向你问好，'金虎'酒家的服务员特别向你问好……"他把他所认识的人都说了一遍，而且都只是向我问好。如今他躺在自己房间里的地板上渐渐咽气，躺在地上继续呕吐，如今他只是哀叹。当猫儿已经离他跑到屋外，当它的第六感觉告诉它，它的主人很快会死去时，我丈夫又说出所有他朋友的名字，让我替他向他们问好，说他在生死搏斗中仍然惦记着他们："替我问候击剑运动员米尔达和沃拉吉米尔，问候本卡希的领班服务员，'两只母猫'饭店的两位服务员，所有服务员，问候我兄弟……"等他说出了所有他的熟人名字后，他感到轻松了些，于是求我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张纸，在呕吐的间歇期间他开始

在地上挣扎着写他的遗嘱，这遗书是这么开始的："在上帝把我召唤、我将与世长辞之际，我来吩咐这几件事……"他将所有他的财产遗留给我，将他的书留给他的朋友们，将我们在克斯科的小木房留给波拉班·赛米采体育运动俱乐部的足球运动员们，让他们在那里集中，就像杜卡拉俱乐部的人在沃诺卡拉西集中一样，让赛米采的人比赛前在克斯科二十八号这所小木房里集中……我来回踱步，站在门边，望着外面，太阳还没出来，但在城堡后面那些屋顶上已经能看见一点琥珀色的光芒……写遗书也是我丈夫的一种嗜好。有一次我们只是坐飞机去布尔诺，他也写了份遗嘱放在桌子上。他要是一个人到外国去旅游，什么也没给我带回来过，只有一次带回来一副眼镜，可这是在布拉格火车站买的，他还硬说是从伦敦买回来的贵重眼镜。他的那些遗嘱几乎老是一样的内容：一切都留给我。要是我们一块儿坐公共汽车或小轿车、或者坐飞机去哪里，他便写一切留给他的弟弟，书留给他的朋友，小木房留给波拉班·赛米采体育俱乐部的足球运动员们……从他当了著名作家那时候起，他便担心他这条命了。在街上甚至只走人行道上的边石，还一个劲儿地往上瞅瞅，看看是不是那屋檐板会掉下来砸着他，又左顾右盼怕汽车什么的轧着他，仿佛所有横祸都可能朝着他来，想尝尝废掉一个出名又出色作家的味道似的。当我们后面一座楼里装修的人上早班，在那个研究所里锯子锤子响个不停、锯着那些粗大木头时，当每隔十分钟紧挨着我们厨房就像有个什么重东西掉下来轰隆一声巨响时，我们的房子就得震动一下。每隔几个钟头便有一声更大的巨响震得墙皮都掉下来，泥瓦工每个月都要扫一大堆出去。当响起

第一声轰隆，研究所楼里那根分成两半的大梁掉下来时，我丈夫正好写完他的遗书，同时他的胆结石那股疼劲儿也过去了。他站起身来，周身无力地移到床上躺下。我将呕吐的东西提出去倒了，给他打来一盆干净水，帮他洗了把脸，擦擦胸口，然后叫来猫儿艾当，我摸摸它，将它抱起来在门边站了一会儿。猫儿像往常一样假装晕过去，我们轻声地亲热一会儿，然后我将它送到床那儿。我的擦洗得干干净净的丈夫正闭着眼躺在床上，他这时看去真有点儿像个死人。我将猫放到床上。我丈夫伸出手来抚摸它，猫儿搔了一下他手心，然后娇里娇气哼哼几声，蜷缩在他头边的枕头上，抓着他的手指头，嘬着嘬着甜滋滋地睡着了……我丈夫睁开眼睛，冲我微笑，我则皱一下眉头。但我知道，我的宝儿爷活过来了……

我们这座楼里举行了婚礼，住在我们楼上外廊里胆怯的英达结婚了。就是那个老躲着我，实在躲不掉就满脸通红的人。可自从他把我丈夫当做偶像崇拜时，便开始喝酒。他找了一位漂亮的姑娘，维也纳的小圆锥体型。他只要一喝醉，便冲她大喊大叫。我不怎么认识英达。他跟我一样，先在教堂贴了张举行婚礼的通告，然后就结婚了。婚礼是在什罗斯贝克的一座小宫堡里举行的，然后在世界饭店办的婚宴。婚宴之后，客人们到新房来为新婚夫妇举杯致贺。当下午大家纷纷离去之后，喝得醉醺醺的英达穿着那身婚礼服，佩戴着桃金娘花，笑嘻嘻地走下来。我们的艾当立即从窗口蹿出去，被这个喝醉的英达吓得哆哆嗦嗦呆在院子里。英达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另一只手拿着几只酒杯，他被酒烧得满身大汗，在我们家坐下

来，倒上酒，搁在我丈夫面前说："赫拉巴尔先生，我是您的学生，您给我指出了道路，读了您的书，我又重新成为了人。现在我谁也不害怕，请您干一杯！"我丈夫又开始呕吐，就像患了晕车症，他拍拍英达的肩膀，将他带到门外，祝贺他，并向他鞠了一躬。可是英达在爬楼梯时，爬到第四级便滑下来，睡着了，穿着婚礼服睡着了。我看到穿着一身雪白的新娘子艰难地将英达一级一级往上拽，拽上一级又接着拽。新娘子很壮实，跟维也纳姑娘一样像个圆锥体，她一直把他拽到楼上才将他放下。院子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人从对面窗户里瞅他们。她将帘子往空中一撩，自己靠在外廊栅栏上。很美的一幅图画，在我们这座摇摇欲坠的破楼站着这位年轻的新娘，一位像刊登在杂志上的新娘，我不禁对她微笑了……

到头来我还是高兴我丈夫从别什江搬来这块镜子，并用螺丝钉把它装在我们房间里的墙壁上。这镜子有一米高、三米长。每当我跨进我们的院子，要是窗户开着，我就能看得见自己怎样往家走，我还看见自己怎样从阳光照耀中消失在院子的阴影里，我从我们房间墙上的镜子中看见了我自己。随后，我便消失了。等我走进家里，即使外面有太阳，我也得打开灯，屋里影子黝黑的，而且还有些凉意……要是我丈夫不在家，我便在镜子前面走来走去。有时我叉着手，仔细地端详我自己。这块镜子从我小时候就跟着我，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照过这面镜子。后来我长成大姑娘了也是照的这面镜子。在我们被装上平板拖车去收容所之前，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爸爸渐渐离去的背影……后来，当我们在别什江重新开始生活，

这面镜子不仅照见过我的生活，而且还有我爸爸我弟弟海尼的生活。我们大家曾盼望着全家共着一本护照去德国，可是只有我爸爸和妈妈得到许可，而我和海尼因为上的是捷克学校，不得不留在这镜子里、留在家里。我从这镜子里望着爸爸离家上火车站去，我只见到他渐渐离去的背影……后来，我们站在火车站……然后火车……再往后我们哭了。等我们回到家里，这面镜子里便只留下了孤苦伶仃的海尼和我……后来我在别什江的这面镜子里最后一次看见自己。当我已经不再想活在这世界上，当我觉得这世界的一切都变得丑恶的时候，我望着这面镜子，我从自己的眼睛里看到，我不能再活在这世界上了。就因为这种对一个爱情失败的女人的世俗眼光，我也没法活下去了……那一次我在镜子里望着自己，抓了满满两把药片，望着这面镜子。在我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之前，在我晕倒过去之前，突然我好像大喊了一声，在强烈的灯光下，我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几乎代表我整个一生的我所有的情景……

如今我常在镜前漫步，照一照自己，在这利本尼，在永恒的堤坝巷这个地方。就像我丈夫说的，从他出了几本书的时候起，他有一个印象，他将注定永远呆在这堤坝巷了，我也一样。在这儿这面镜子里我总将自己打量个没够。要是我丈夫在我跟前，我从来不往镜子里瞅自己一眼。我得独自一人来照镜子，我经常看到自己是多么地不精心打扮。想当初，我曾经去过日什科夫我从前的男友伊尔卡的妈妈那里。如今我已经忘了这个伊尔卡，也忘了他的吉他，甚至忘了他为我演奏的所有那些西班牙吉他独奏曲。可是后来，从维也纳的姑姑碧辛卡那

儿往日什科夫寄来了惟一的一封信，这封惟一的信擦亮了我的眼睛，使我感到羞愧。从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起，我开始注意打扮自己，我买了那双红高跟鞋和新衣服，因为我姑姑从维也纳来信说："既然你不想让人家把你当成一团土豆泥，你就应该努力让人家把你看成巴黎蛋糕。"于是我便成了巴黎蛋糕。我每天都照镜子，好让我在出门之前真的打扮得像个样儿。每当我夹了睫毛画了眼影，我照镜子时近得像在闻那面镜子。从我到维也纳去看望过卡雷尔的时候起，我也经常想着碧辛卡姑姑……在我从维也纳回来半年之后，我那位善于将自己打扮得如同巴黎蛋糕的碧辛卡姑姑到店里订做了一件新的打褶的尼龙绸衣裙，是参加舞会穿的。圣诞节晚上，她装做对圣诞树表示惊讶的样子，匆匆从烧着柴块的壁炉前跑过去，她戴着的小头巾着火了，那件打了褶的巴黎式尼龙衣裙、飘着的尼龙长巾……还有假发都着火了……直到如今，碧辛卡姑姑仿佛也常常和我一道来回走过我这寒冷的房间。每当我端详自己，我似乎常常看见我那姑姑在我的身后探出的头，那还是我在小时候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模样。以后我只是根据照片才认得她……可是现在，在利本尼，在永恒的堤坝巷，她仿佛仍然在我身后探着头。我听见她在轻声对我耳语："你必须总是将自己打扮得跟巴黎蛋糕一样美丽可口……"

我的宝儿爷喜欢在这镜子里照一照，可他从来不坐着照，而总是在镜子前迈着步端详自己。他盯着自己看上好大一会儿，然后走来走去，琢磨着自己。我好几次看见他这样，我回家时，从院子里就看见房里亮着灯，镜子旁还挂着个吊灯，所有

的家具也都映在镜子里，院子里如有哪一家办喜事，从院子里看去我们房里就像挤满了人，这是所有宾客在我们家镜子里的再现。可是我丈夫，如果只有他一人在家，他会是另一个样子来端详自己。他似乎在细看自己老了多少，他细细观察自己的眼睛，他的两个手掌与镜子里的手掌对撑着，敏锐地观察着自己，他对自己总也看不够……我看到，这么细细观察自己的人，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患有重病，是因为他知道也许一年内就得死去。我的宝儿爷就是这样照镜子观察自己的。等他的胆结石好了，他还是不相信自己，常在镜子里研究自己的状况。他常常用指头掀起他的眼皮，看看有没有黄疸病迹象，他摸着嘴边的皱纹，他那塌陷的脸，摸着他的黑眼圈。他从来没有对他在镜子里的这张脸表示过高兴，常常相反，他越来越变得严肃，担惊受怕。我丈夫不仅喜欢自己担惊受怕，而且也为别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担惊受怕，因为我丈夫总把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当做他自己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他的胆结石没再患这段时间里，他也只呷一小口啤酒，连一小块肥猪肉也不敢吃。我丈夫本来爱吃烤臀尖和猪大腿，如今他只能吃煮牛肉，走路也慢了。如今我总走在他前面，以前我总走在他后面离他三步远，如今我走在他前面了，我回过头来吼他一声："你干吗走那样慢啊！"但我心里并不因为这个而感到高兴，相反，我生他的气。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什么病也没有，是他的胆结石把他吓坏了。我丈夫那时简直为他还能活在这世界上而感到惊奇，他经常安慰那些重病号要如何如何，可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没病却还吓成这个样子。他成天摸着肚

子，还老爱到阿丹姆大夫那里去打听他的血液情况。可是阿丹姆手一挥，笑了笑，对我丈夫说他已经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说他跟所有其他这类病人一样还没到动手术的时候，要等到那块石头需要动手术的时候再说。因为从我丈夫的血液化验中根本没有什么癌症或肝硬化之类的迹象。可是我这位宝儿爷，每次从大夫那里回来都要到镜子跟前看呀看的，硬说他从大夫眼神里看出他在瞒着什么，不愿说出真实情况。说大夫跟护士打着耳语，说等我丈夫一转过身来，阿丹姆立即停止了背着他时讲的悄悄话……

就这样，这个给予所有人以乐观主义的人，这个跟沃拉吉米尔风风火火走过大街小巷和各个饭馆酒家的人，这个略微有点儿醉意但总是满脸微笑，谁见了都要回头再看一眼的人，如今却像受了惊吓一样走在大街上，有时甚至回头四下里张望，常被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吓得战战兢兢，总像做了什么错事一样心里不踏实……我在他面前迈着步，这可算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我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即使天气晴朗，我也拿着一把雨伞。这是我丈夫有一次跟沃拉吉米尔一块儿喝醉酒买回来的，他一下买了两把，一把蓝色绸子的，一把粉红绸子的。其实这也不是给我买的，而是为我丈夫他自己买的。他那次从饭馆里出来，被一家橱窗吸引住了，于是走进店里。有一次他看见了运动帽，虽然是冬天戴的，可在夏天就开始卖了，他一下买了四顶，非常昂贵的毛线运动帽。另一次买回来两条苏格兰围巾，他是从来不围围巾的，但硬说他的衬衫是敞领的，不围围巾就要感冒……也就是那一次他还带回两把雨伞，一把

蓝色的一把粉红的。外面老大的太阳，他却带着两把雨伞进了院子，说是送给我的。可是在这以前他们已经带着这两把雨伞跑遍了布拉格各饭馆酒家。他们感到很幸福，因为他们两人拿着这两把雨伞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了风头人物，成了天字第一号……我则买了两双一样的鞋子，红色的意大利高跟鞋。如今我正是穿着这双鞋子在跨着大步，我丈夫走在后面，慢腾腾的像只有病的小狗跟在后面。他不时地回头，左顾右盼，眼睛非常忧郁。他轻声告诉我说，就在这一带，他浏览过登记死亡的地籍簿，感觉到死神在怎样地注视他，说他早就读过这本地籍簿，但只是读过而已，可现如今，当他如此重病一场，几乎一命呜呼时，便实实在在地看到这一切，看到这死亡在大笑着用望远镜注视着他……

有一次他独自一人到布尔诺—日德尼采去探视他外婆、外公以及他波普舅舅的坟墓，最主要的是想到巴尔宾卡他出生时那所房子里去住两天。如今他的表兄弟伊希克住在那里，他跟我丈夫一样有着一张公猫脸、高颧骨，长得跟阿瓦尔人[①]和鞑靼人[②]差不多。就像我丈夫所炫耀的，他到日德尼采坟场下方这所房子里来，是为了能沿着那盘旋楼梯爬到顶间里去。伊希克将原来房间里和厨房里那些旧家具都搁在这个顶间

① 其来源和语言均未能确定的一个民族，公元 6—7 世纪在东欧起过重要的作用，原居高加索，后来介入日耳曼部落战争。6 世纪下半叶以匈牙利平原为中心建立帝国，805 年被查理曼大帝征服。

② 讲突厥语的民族，主要住在前苏联伏尔加河中段及其支流卡马河沿岸，后来泛指亚洲大草原或沙漠上的一些部落或所有游牧民族。

里，因为他不喜欢这些旧东西，已经买了现代家具。那是我丈夫儿时住过的地方，他就出生在其中的一张床上。还有这些画像，如今都脸朝墙扔在顶间里。这些圣像都捆成卷，等着哪位亲戚来把它们拿走……我丈夫又将这些家具摆到原来的位置，当时他坐在一张罩着红天鹅绒布的小桌子边，桌上摆着一本天鹅绒封面的相册，里面装着我丈夫所有先辈的照片，就像十一位足球队员一样坐着的高颧骨男男女女，美女和宗教法庭审判官式的男人，这个饱经风霜的大家庭。我丈夫一一抚摸着这些东西和家具，再一次看看那些圣像，那是他孩提时最早看到的画像。那时他还是个躺在摇篮里和刚会走路的娃娃。这里还挂着那盏吊灯，点煤油的……当我丈夫告别这一切回家时，带走了一个装调料的小柜子，上面有好些小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姜粉……胡椒……新调料……还有一个装香草的特别抽屉。他把这柜子带回来，放到我面前说："这只是拿个样品给你看看，让你知道我们的顶间里存放着一些多么漂亮的东西和家具。那是我作为三岁小孩时用过的家具。后来我长大了，每个假期都住在那里。"他说他得把它们运过来，说我们要搬家，买一所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一间自他来到这世上之后首先看到的这样的卧室和厨房。

我那宝儿爷可真神，在他康复之后，大笑着给我讲了他在波尔纳被溺水的事儿。他之所以讲得这样津津有味，是想让大家羡慕他，让人们坚信我丈夫即使在溺水这种事情上也是第一名，也是共和国冠军、世界冠军。他从日德尼采回来后，便去了波尔纳，想看看啤酒厂，以便了解一下他曾经去过的一个厨

房。他曾坐在那个厨房里的一张小椅子上，整个世界都随着他转个不停，因为他在三岁的时候曾经醉得解不开鞋带。他认出了里面装着整天喧闹的中、小学生的那扇大门，那里曾经是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他也认出了哈苏卡老板的那家糖果店。但更主要的是他想瞻仰他曾掉到里面喝了几口水的那条小溪。他那次溺水惊动了整个镇子，大家都以为他淹死了，孩子们给他送来了放进棺材去的小画片……如今我丈夫就站在这条他曾经掉进去的小溪旁，他曾第一次尝到死的滋味，这是个非常不幸的偶然事件。如今他呆在这里，不无遗憾地感到这死神直到现在才向他走来，来到利本尼，就像每次死亡一样来得不适时日……后来，他又整整一下午站在波尔纳的广场上，在砂岩那儿寻找从水池里映照出来的太阳。在他五岁的时候，为寻找这太阳他差点儿淹死在这水池里。那是个星期天下午，有位坐轮椅的太太从窗口看到他，坐不坐轮椅这点倒不重要，主要是当所有的人都坐在家里享用星期日午餐时，惟独她没去吃，因为她正患胆囊炎，便从窗口看到这个小男孩掉进水池里。于是我丈夫便体验了生后夭折、死后复活的这种滋味。是米哈列克博士将他救上来的。这位博士曾经在普舍齐纳森林中发现过一个名叫安涅什卡·赫鲁卓娃，割断了喉头的女尸。这就是我丈夫哈哈大笑着向我和好些人描述的他那些死亡经历。

后来，我的宝儿爷和我一道去过宁城。他曾在那里度过他最美好的年华。这段时光使他总觉得自己是扎拉比河畔的人。他领着我一个劲儿地游览那些从他六岁一直到现在仍旧没变的街道和房子……我得跟着他走在那些直冒臭气的土墙四周

的小街上，我得仰着脑袋观赏那赛采赛风格的水塔。塔顶上原有个特大的铁栏杆，活像一顶大皇冠，不过如今它已不在塔顶上，而是躺在水塔旁边地上让人抚摸。我还得一根一根触摸那石桥上的栏杆、那石头结构，因为他小时放学回家，总是用指头触碰着它们往前走。我还得跟他一道走进圣伊希教堂，因为那是他当小学生时常来的地方，因为宗教课老师尼克只给礼拜天上教堂的学生加分。我丈夫说他喜欢上教堂。后来我丈夫又将伊兹德茨克街上一个带栏杆的平台指给我看，说学生们曾在那平台下面等着诗人马利斯科在即使出太阳的时候变"下雨"的戏法[1]。后来我们又站在一扇通向古代刑讯室的文艺复兴式的大门面前；再后来便来到那扇通向旧教区牧师住宅的大门前面，这扇门永远关着。我和我丈夫从门缝往里看，只看到几座雕塑和园子里几根毁坏的篱笆桩，倒在地上的一块小碑，还有一座高大的红塔。后来我又站在那儿看了教长的花园。我发现我丈夫越来越为指给我看的一切而感到兴奋。他从来不往他指给我看的地方看一眼，而只是看着我，看我的反应如何。而这里的一切我都没经历过、没见到过。我拿着雨伞继续往前走，只是不停地表示我的惊讶："真的吗？这可能吗？哪有这样的事？……"他甚至把我带到啤酒厂。我对这里感兴趣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曾经在这里生活得怎样。他们的心一直还留在这里，因为在这里他们曾经有过一段幸福时光，就像我的幸福时光曾在霍多宁，直到战争结束一样。可那座供穷人住的廉价房只是表面上比较漂亮。这里曾经住着另样的人，有着

① 在平台上撒一泡尿到平台下孩子们的头上。

另样的生活方式。好像这里曾经住过好些贫民户，大门边就是牲口棚。当我们朝院子里一瞅时，我丈夫的情绪便一落千丈。瞧那里面乱七八糟的，到处乱摊着牲口圈、生锈的工具和无用的东西。我丈夫想要指给我看的是那些长着长生草的漂亮屋顶，从那儿可以见到四周风光的屋顶，在那第五层楼处，冷藏库上的屋顶，发酵房上的屋顶，我丈夫如今压根儿再不敢爬上去了。因为在这个对我丈夫来说无比荣耀的啤酒厂如今已经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我这是最后一次来了。”他对啤酒厂说。之后我们回到城里。我丈夫沉默不语，突然像从梦中惊醒，四下里看一下，俯身于栏杆，望着有一米深烂泥的河岸，望着他童年的这条河的河面，也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河水黄得像桤木树浆……突然，到了桥的末端，我丈夫抢到我前头，像他以往那样跨着步，回过头来。他的脸上又露出一种放肆无礼的笑容，就像他向我讲述过的：哪个男孩如果见到他这种笑脸，便会立即从自行车上蹦下来，给他一个耳光，然后便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对这种无礼诡笑的一种回报，他们之间就算摆平了，然后跳上自行车继续走他的路……

我丈夫爱说他自己的性格一天要变好几次，他说他几个小时地微笑着，自己觉得好像赢了上百万；然后又几个小时地苦着脸，像闻了臭屎堆似的。说他的性格像四月天，说他像个沮丧型的疯子，好几个小时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别人畅谈美好前景，为的是在后半天来思考不再活下去的问题。喏，就这样，他可理直气壮地认为他有这样的性格，可我就得老有好性子。他也看出来，我的性格也有点儿像小孩，也是四月天气一会儿

晴一会儿雨的，于是他一会儿来给我上课要我注意心理平衡，一会儿给我念塞内加[1] 有关内心宁静的章节，他容不得我安静地休息一会儿。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事：有一次我回家时，从院子里便看到，他坐在镜子前的椅子上，前前后后起码对着镜子照了一个多小时，他正使劲想透过镜子来了解自己，就像他乐意回到他的故居宁城，又从宁城回到波尔纳，再从波尔纳回到他的出生地日德尼采一样，他一直在对自己提出责难。这是我对我丈夫惟一尊重之处。他对他自己老有一种非常坏的看法，他仔细琢磨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这些事使他饱受惊吓。他曾经像一座荒芜房屋的破门烂窗，像一口投了毒的水井，拼命地用一些纵横交错的板条将它们掩饰遮挡起来。也许正因为这样才在内心深处深深同情那位受了伤害的小姐；正因为这样他才如此热爱鲜花，从最先开放的雪花莲到秋冬的水仙他都喜欢。他喜欢漫步、趟水，好几个小时地在克斯科的林子里、草坪中游逛，而且总要带来一束花。我丈夫的手指头已经有点儿僵硬，因在克拉德诺钢铁厂干活被铁锹磨损得已经不能完全伸直了，可是每当他去采花，总是呆头傻脑的带点儿孩子气，只摘那些不长在一起的单个儿花朵。他不喜欢买来的花，他自己也从来不买花……因为他觉得从雪地里采来第一朵雪花莲是一种荣耀，像去接受什么神圣的天赐尤物似的。这时，不许我跟

---

① 塞内加(Seneca Lucins Annaens)，公元前1世纪一本拉丁文论雄辩术著作的作者。

他说话，也不许我看他。每当他在做一件他认为美好的事情时，他容忍不了我的目光，他想完完全全独个儿去做，那才感到自在满意。而我自己从来没采过花，我跟花无缘，我在家里种的花，一朵也没开过。在别人家的窗台上百合花开得好好的，我们的百合连个花苞也不长。在别处能开的同样的花，一到我这儿就不行，连杰里科[1]的玫瑰也是这样，甚至连西番莲也不开。仿佛这些花就是我，代表了我的命运。我丈夫曾经对我这样暗示过，他还为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家连一朵花也不开而担惊受怕。他还问过我，是不是有孩子放在什么地方寄养着，说我们可以把他要过来，在家里虽然谈不上有多快活，但总会比现在好些。我把他连同这些问题撵得远远的。

我丈夫带回一大把雪花莲、黄花九轮草[2]，还有一大抱铃兰花。他刚从森林中来，全身散发着一股清香味儿。他得意洋洋地带来这些花，就像他洋洋得意把猫儿艾当抱到林子里去一样。我们那只胆小可怜的猫，不喜欢森林和草地，它只爱利本尼那座院子、那个屋顶、那排板棚和上门槛那儿去。我丈夫像抱着一束花一样得意洋洋地抱着这只猫，将灌木丛中所有新长出的叶子指给它看，将所有的花指给它看。带着它在林子里散步，把它搂在怀里，告诉它这叫什么花、那叫什么树，让它闻一闻，还得让它碰碰树上的小枝干……当白桦树枝和落叶松开始发绿，他便用一朵朵花配上叶子和白桦枝松枝扎成花束，而且总是用一根粗粗的绳子，不是什么秀气的细绳或丝

① 约旦一城市。据《圣经》称，犹太人以鼓声摧毁了该城。

② 黄花九轮草，又名高秆报春花。

带，一圈一圈地捆得紧紧的……在做成一把把花束之后，便分送给别人。给我一束，其他的便送给克斯科的漂亮女士们。那些年轻太太们也和他、和我以及所有小木舍的主人及他们的朋友们一样，周末到他们的木舍来休息。而这时他总是想起自己的外婆，那位在日德尼采也有一座漂亮花园的卡德辛娜。她的爱称多着哩：卡笛娜、卡佳……外婆花园里的花多得一年四季都有得开，从铃兰花到紫宛[1]，到冬天甚至还有银色菊。她总是用这些花扎成一把把花束。他姥姥跟花简直有种奇特的姻缘。她最爱的就是花，她把她的信仰映印在花之中，她爱基督和圣母玛利亚就像爱她的亲人一样，她觉得他们并没有死，而永远是年轻的。就像他所说的，他的姥姥最爱那长得像一颗颗小小的心一样的荷色牡丹、勿忘草和芍药，其次还有安东宁圣人手里总拿着的那种圣百合花。

……我丈夫喜欢秋水仙，对它的美惊叹不已。他常常在春天将草地上刚刚长出来的那些深绿色叶子指给我看，说这是秋水仙的叶子，这些叶子要枯萎的。不过一到秋天，当再生草被割掉，遍地就开出一种紫颜色的花来。我丈夫将它们拔出来，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冻僵的花儿捧回家。但他从来不把这种花捆成一束，而是轻手轻脚地将它们放到一个装了水的玻璃瓶里，这些秋水仙就能开上整整一个月。花为紫色，秆儿几乎透明得跟玻璃棍儿一样……丁香花开的时候，孩子们便折下整整一枝。我丈夫便用那剩下的小碎枝扎成花束。当孩子们

① 紫宛，即中国品种的翠菊。

像拽猫尾巴一样淘气地折断一根柳枝时，我丈夫便像卫生员一样用剪刀将这些残枝修剪好，放到小罐里、洋铁盒里或啤酒罐里养着。可我丈夫从来不喜欢接枝的丁香，他总喜欢普通丁香。那些开在乡下坟地里、开在农家荒芜的园子里、院子里的丁香，这才是他真正心爱的丁香，蓝色的丁香、哭断肠的丁香。他的黑发姑姑捷诺什科娃就有着这样一双眼睛，一双像圣母勿忘草一样浅蓝色的眼睛。……每当我丈夫拿丁香回来，我就知道，他会说，"这是我眼睛的颜色，我年轻时候就有这样颜色的一双眼睛。"我啥也不说，装做没听见的样子望着院子外面，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可我装做看到了一个什么使我格外感兴趣的东西……

我丈夫和他写的东西，简直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他根本不注意写作风格，也不去下功夫。我对文法就知道得很少，可是我相当有把握地知道，我丈夫实际上不怎么会用捷克文写东西，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像从外文直译出来还有待加工的素材，只是随随便便划拉出来一件什么事情，还需耐心地加工修饰。可我丈夫还恰恰以此为荣。他为他的作品是这种未完成的半成品，他为老掉墙皮、露出秃壁、砖头碎裂的这种现象而感到兴奋。我丈夫的这种文风很像布拉格的院子，像到处乱放着脚手架的残骸，像那些满得都已经堆到垃圾桶外面来的破烂儿。我丈夫写的东西就是这些用不着、被遗忘的、剩下的旧材料、零件、铁丝、暖气片，是每个星期日运到废品站去的东西；我丈夫写东西，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写出的那些画面就

像哈尔法周围那些院子、垃圾焚烧站的破窗框、切卡德[1]的破钢烂铁；我丈夫写东西就像工人穿衣服一样不讲究。他喜欢到哈尔法、到布拉迪斯拉发饭馆去吃午饭，在那里久久坐着。“这美好的一切都已成过去了。”他对我说，“那种每个工人穿着洗得特别干净、洗成了浅蓝色的工作服上班的星期一早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工人们的工作服要穿到开始破旧，让铁丝剐得一个个洞才算够。有些工人就穿着这样的工作服到维索昌尼各个饭馆里就餐或小吃。”说他们像穿上小丑服的国王。他对我说，这是一种时髦。这么个穿法，就像把去那些糟糕的男小便池、去那些可怕的厕所也当做一种时髦一样。我丈夫见了这些厕所都害怕，简直恐惧。可他如今只要一有空，就到哈尔法去，不仅要去光顾他常去的那两家饭馆，而且首先要绕着所有工厂、大院小院转一圈。他还得自己单个儿去到这些地方。这种荒芜，这种所有一切乃至工人工作服的破烂不堪，使他那样地聚精会神，心里亮堂和着迷。可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工人，只等汽笛一响，换班时间一到，便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漂漂亮亮从这些工厂、车间走出来，仿佛被一根魔术棒指挥着完全变了一个样。他们穿着牛仔服，五颜六色的短外套，坐满小饭馆小酒家，喝着啤酒，笑容满面。我丈夫说，这些上工时穿得最破的人在维索昌尼、在利本尼都有漂亮的住房，高级地板。这些工人一回到家，先在前厅换鞋子。他们不仅有个漂亮的厨房，而且还有个舒适的餐厅，连小孩也有单独的居室。这些工人喜欢穿得漂漂亮亮，他们有洗澡间，讲究的卫生间。可是当

① 布拉格一家机器制造公司的传统代号。

他们一走进维索昌尼和利本尼的工厂、车间来上班时，便又掏出那套满是尘土、破得掉渣儿的工作服，他们去厕所时，也不在乎这里的小便池和堵塞不通的大便池有多臭……

……从我婆婆对我所讲的一切，从他自己向我讲述过的一切中，我有了关于我丈夫一幅这样奇怪的画面：他这个人很易受环境制约。时代一变，我丈夫也跟着变，他甚至把它看成是自己的装饰、长处，看做不仅是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是自己的写作风格……"他最早写的那些诗是我惟一喜欢读的，那么脆弱、温柔、羞涩。"婆婆说，"他写这些诗，是由于他爱上了一位十六岁的姑娘、国营厂子里一个工人的女儿伊辛卡，他们家在扎拉比有一座小房子。这就是他的初恋，他的初恋脆弱得在四年之后完全破碎，因为这位姓格奥吉娜[①] 的姑娘美得让我儿子得了病。"我婆婆说，"他受不了这个美。他害怕美丽的姑娘，一见到美丽的女人、姑娘，便会吓一大跳，发高烧。跟格奥吉娜在一起呆上一刻钟他便发烧、脸红、讲话结结巴巴下句不接上句，除了格奥吉娜他什么别的也不能想了。到后来不得不请位大夫来给他看病，因为这张漂亮的小脸蛋使他睡不着，老出汗。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还能学法律。"婆婆说，"上大学时，他中午便立即从布拉格回到家里，整个下午只跟格奥吉娜在一起，只在易北河岸散步。"婆婆说，"我曾经想让他们一道去参加些社交活动，可是他们说：'这样就足够了。'礼拜天一到，我儿子便跟她上城里的集体散步长廊去散步。他一清早便自

① 格奥吉娜即伊辛卡的姓，伊辛卡是名。

己熨裤子，自己擦皮鞋，连鞋跟儿都抹上了鞋油。然后刮上好半天胡子。因为他晚上把头发睡得乱蓬蓬的竖了起来，于是便使劲往头发里倒发油，接着用梳子梳、刷子刷，而且是很密的刷子。然后还得戴上压发网，压上整整一个钟头，或者戴上一顶用带子系在下巴颏底下的黑帽子，就像那个时候游泳运动员时兴戴的那种帽子。然后还得花好长时间挑选衬衫、领带。他换了多少次领带和衬衫啊！他有好几套在布拉格订制的漂亮衣服，还有从布拉格买来的鹿皮手套，从捷卡恩名店买的灰礼帽，那顶最贵的礼帽，系了一根黑丝带的灰礼帽。我连看他一眼都不行，否则他就冲我大喊大叫。我看到我儿子是多么地惧怕那集体散步啊！他虽然上那儿去，可是他仿佛被他自己吓着了，他仿佛觉得自己配不上格奥吉娜这位只穿了件用别针别住衣裙的城郊姑娘。等他从集体散步场回来，脱下外套，只见他的衬衫全湿透了，即使在相当凉的初春或秋末，他一脱下外衣，也总要站到扭开的水龙头跟前冲洗好半天他的脑袋……”

“看来他是在重复我的初恋。我曾经也这样爱过。我的初恋，”婆婆说，“曾经是我的一切。初恋总该是这个样子。可是我怀孕了，我当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被自己的怀孕惊呆了、吓坏了。我轻生过，我因为这初恋，这肚子里的孩子而不想再活了。我感到见不得人，我崩溃了。直到——我已经对你说过一次，后来，我跟家里说了，爸爸想毙了我，只有我妈妈说了一声：‘快来吃饭，要不星期天午饭要凉了！’我的初恋使我受那么大的罪！我羞愧极了，我恐惧得要命。那时在奥地利没结婚便怀孩子是件很丢人的事儿。我这个儿子实际

上是延续了我的命运啊！我那种对爱情的恐惧感、那种害怕、那种我无力消除的卑贱感都转移到了他身上。在我整个一生中，我的初恋也就是我的过失。所以他才会因他的初恋伤这么大的元气。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字一字地打出他的处女诗作。只有在这小斗室里他才找到了一丁点儿安宁。可是他这些最初写出的小诗，他的这些小册子，就跟他对格奥吉娜的爱情一样，他为这些诗而感到害羞、红脸。每当他胆怯地将这些诗拿给人家看的时候，真好像不得不将与他相好了一年的姑娘介绍给人家一样，又好像那次把与他相好四年的格奥吉娜带到我们家那样害羞。不是为她，而是为他对她的爱情、为从我这儿分走的爱而感到害羞。他觉得这爱情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但同时也是一种罪过。这期间他很注意自己的打扮。他讲究穿着，但这是为了格奥吉娜。他想把一切弄得更漂亮、再漂亮些，能有更漂亮的领带和鞋子，这一切也都是为了格奥吉娜。可是在他有了这一切的同时，在他穿好戴好打扮好的同时，他又感到失望，因为他想让自己成为另外一个样子，成为他永远也成为不了的那样子，像科涅奇尼老师那样，像到我这儿来过的年轻演员那样，像那些懂得交际、善于谈吐、举止文雅、连抽烟的姿势也很标致的美男子那样。这都是使我儿子精神崩溃、红脸的原因。他从来就不善言辞，一张嘴便跑题，然后就悄悄溜到他的小旁间里去骂自己一通。对着镜子骂，说自己最好是别活在这世上，就像他那时一直读着的那本《少年维特的烦恼》上写的那样。……就这样，我在家里供着这么两个爷们儿，一个是我丈夫弗朗茨因，他在我面前也总是萎靡不振，说我漂亮，他与我的美没法相媲，与他对我的爱无法协调起

来。我儿子跟我丈夫的心态一模一样，这两个大老爷们儿一见自己的老婆在他身旁，本应高兴，但却相反会六神无主，两个人都一样。只有当他们仅仅是自个儿跟他们的爱人在一起时，那都是挺高兴的。可是他们容不得有人朝他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娘儿们看一眼，更甭说跟她们跳个舞、聊个天了，那他们马上就会想到自杀、拼杀。我这两个爷们儿都有些妒忌心，都够自私的！到头来这初恋就成了麻烦、不幸，美丽的不幸！"

"……有一次，格奥吉娜一个人出去跳舞，到波杰布拉迪喝午茶，一个眼旁有块红斑，额头上有块胎记的青年男子爱上她。从此格奥吉娜便再也没上我们家来过。我儿子因而病倒了。他病了半年睡不着觉，瘦成了个皮包骨。这简直是家里的极大不幸，就像我那次遇到不幸那样：当我初恋的人负心与别人结婚了时，我赌气嫁给了爱我的弗朗茨因。"婆婆给我讲述着这些。我从没想到跟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个男人竟然跟我的继父仿佛是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我丈夫，当我读了他早期那些诗歌时，真没想到他竟有这么强烈的感情。我相信我婆婆的话：我丈夫那时虽然非常纯真，但也正因此才啥用也没有。因为那时他想得到的太多，到头来反而什么也得不到……

有一天夜里，我们从利本尼桥上走过，在索列尔车站那儿从电车上下来一位女士，她后面跟着一个男人、一个年轻运动员。他在车站给了那女人一个耳光。我忙说："咱们快到热特夫去吧，别管这些事儿！"突然从电车上跑出来一个小个子男人，这人我们在广场街常见到，他是一名煤气水暖工，白天他总穿一身工作服，跟我丈夫一样头发很稀，但是从耳朵这边横过头

顶一直梳到脑袋的另一边，而且总是抹着发蜡，好像一把贴在脑袋上的刷子。他脖子上总像画家一样扎着一块带色的小薄巾。到了晚上便换上各式T恤衫、短上衣，而且总穿双特别皮鞋、带色的袜子，走过广场街四下里看看该给谁尝尝他的拳头，一个地地道道的打抱不平者。如今他在这一站下车，往那大个子脸上狠狠地扇一巴掌，打得他跪倒在地。我尽管叮嘱我丈夫赶快回家，可我自己却情不自禁地站住了。我弄不明白，这么一个小个子怎么能把一个大汉打倒在地。大汉从地上爬起来，用手背擦擦血，看了一眼这个终于找到了该挨揍对象的小个子水暖工，他正伸出指头强调地说："你记住！谁要在我面前欺侮妇女，我就把他打翻在地！"这大汉站起来准备反攻。他因挨了这一巴掌弄得面子上很下不了台，就想出这口气。可是水暖工一跳起来，又将重重的一拳打在那大个子的下巴上，这个运动员又倒在地上。水暖工还大声嚷嚷着："有本事去找警察呀，他们就在离这不远的地方！你来写个备忘录并签个字吧，就说你打了这妇女一个耳光。来呀！"大汉站起来说："咱们回去！"抬腿就走了，还边走边擦着血。我丈夫激动地看着这一切。本来，他以前便与这水暖工在万尼什达酒家、世界饭店碰过面，彼此问候打招呼，可一直没敢跟他搭话，直到这次我丈夫才说："揍得好！"那水暖工笑笑，样子有点儿像科希采一位名叫波拉克的足球运动员。他微笑着瞅瞅自己右手的关节说："赫拉巴尔先生！我叫鲁希奇卡。"有位亲眼目睹了车站上这场殴斗的老人离开广告牌从我们身旁走过，嘟嘟嚷嚷发着牢骚说："瞧这世道，闹得人都不敢出门啰！"从此，那位总穿着干净衬衫、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抹得溜光、仿佛刚从理发店出来的鲁希奇卡先生便与

我丈夫建立了神圣的友谊。我丈夫对这位爱打扮的郊区男士很敬重，开口必称鲁希奇卡先生，每次出书都要送给他一本，并在上面签名。我丈夫甚至经常骂骂咧咧地叨唠："真见鬼，可惜我不会润色，要不然这可写成一篇很好的短篇，一本关于鲁希奇卡先生的小说……"我还见过他的妻子，总是那么标致，一副慌张的样子，领着女儿在买东西；或者，像郊区人通常那样：漂亮女子穿上漂亮衣裳，到广场街来溜达溜达，到古利克店买上一杯咖啡，在古利克店对面酒馆里坐着抽支烟。当她遇上她的丈夫，这位头上抹着发蜡的利本尼爱打抱不平者时，便跟他客客气气打个招呼，说上几句什么。女儿跑过去跟他亲热一番。鲁希奇卡先生然后继续沿着广场街往前走，根据大家的要求，挨家挨户地干他的活儿。有一次，万尼什达酒家的洗碗池堵住了，鲁希奇卡先生在桌子上铺一块仿鹿皮围裙，在围裙上摊开他的管扳手、他的一整套工具、钳子等等。全酒店的人都安静地看着这位穿着干净工作服和高领衫的鲁希奇卡先生戴上白手套……我丈夫惊呼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只有工头才戴这样的白手套，圣诞节期间扫烟囱的人挨家挨户分送挂历时也是戴的白手套啊！"鲁希奇卡拧开灯，因为万尼什达老板的院子上空已乌云密布。鲁希奇卡先生用他那些镀铬工具跪着扭松了洗碗池下面的螺母。万尼什达先生递给他一个桶。鲁希奇卡先生打扫干净排水管，取出碎丝，清洗了排水弯管，一板一眼地，好让大家都能看到他的工作，然后又将水池下方的各个零件装回原处，扭紧螺母，一开水龙头，水便痛痛快快地从排水管里流走了。后来我再也没见到过鲁希奇卡先生的镀铬工具，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我只要在广场街上遇到他挎着那工具包，我便仿佛透过那

工具包看到了他的镀铬工具，看到他拿着它们创造出的一种了不起的风格，就像诗人科拉什先生喜欢描述的那种郊区特有的风格。……

自从我丈夫出了三四本书，当了作家这时候起，他经常被邀请到学校、图书馆参加与读者见面的座谈会，他每次都答应去参加，可要是碰巧在开会前他病倒了或有什么事，他总是非常高兴，因为不用去参加座谈会了。要是遇上他没法推卸的那一天，他便总是那么惊慌不安。他有时还得坐火车、坐长途汽车到外地去开这些会，甚至到第二天才回得来。可是即使在布拉格参加这些会，他也总是紧张得够呛，脸色苍白、说话颠三倒四。跟我告别时那副表情，仿佛他是要去住医院或者坐班房似的。有好几次我也跟了去，随便站在个什么地方，眼睛看着别处。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他那一直驱散不了的慌乱与恐惧，这种来自自己的讲述和回答问题的恐惧。他从来没法针对人家的问题来回答，总是说上三两句便跑了题。我怜悯他，那些热爱他的读者肯定也跟我一样为他捏把汗。因为我丈夫对什么问题都予以答复，对那些本应沉默不该说的，他也在公开场合下说。声音断断续续，像有人捏住他的喉咙那样结结巴巴地说话。可是，他一旦抓住了自己这股语流，他说出来的便是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口头短篇小说。这时他完全忘记他是站在听众面前。突然他说话的气势就像他在写作那样滔滔不绝，像他呼吸一样流畅、自如。他那速度使我和听众都屏住了呼吸。他对人们说了些什么荒诞无稽的话呀！他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甚至开始流泪，为自己而感动。在这一瞬间，不仅是我，还有大

厅里的其他人都有这么一个印象，不只是印象，而是认定我丈夫是讲故事的高手，是天字第一号、举世无双的世界冠军。……

只有我能看见，等我的宝儿爷一回到家里，便往床上一躺，两眼盯着天花板。即使我关了灯，猫儿爬到他胸口上休息，我这位开过座谈会回来的丈夫也这么躺着，两眼瞪着天花板。因为他睡不着，直到天亮他才睡去，老这么愣着想着：这天晚上他曾经答应了多少人再到他们那里去座谈、去受罪。每次座谈会不仅占去我丈夫开会这一天，而且还有开完会后的两天，他总有些心慌意乱，责骂、埋怨自己，说在座谈会上他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说必须过两天他的脑子才能恢复到开座谈会前的状况。我丈夫就这样在床上躺两天，反复琢磨着读者在座谈会上给他提的那些问题，同时还一个劲儿地自责没有回答好。直到如今，两天之后，他才找到在那里该说的正确句子。这时，我就只好劝慰他，仿佛他是刚从被抽过血和尿的医院回家来的。因为他总觉得他的肝有点什么毛病，我就不得不安慰他，说他没有癌症，只是有点肝硬化。

我丈夫从小学、初中、高中在学校里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他实际上住在城郊，进城只是为了上学，除此之外他总住在城郊的啤酒厂里。他不习惯与人交往，也不习惯呆在屋里，他经常呆在树上、屋顶上，一直是在室外。他没完没了地散步，像他妈妈所说的，他一天走上几十公里跑到啤酒厂那一边的河旁草地上，一直走到克斯科森林那边。可是等他一走进酒

馆、走进教室、走进车厢，总而言之走到人群的地方，眼对眼、鼻子对鼻子的时候，我丈夫便又自己将自己封闭起来。我即便带他上剧院、甚至去看电影时，他也有种罪过与耻辱的感觉，像我婆婆说的害羞得脸红得跟个姑娘似的。

我丈夫钦佩那些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人生观，并根据它来区分"可"与"否"的人，而他自己，却从来不会说个"不"字，总是同意一切。有一次，有人到我们家来请他去饭店里吃煮面条，我丈夫即使不想去，也还是跟他去了，还答应他写一篇谈话录，去参加座谈会，或者去一个他自己压根儿就不爱去的地方。我丈夫没有主见，有的只是一种过失感。也正因为这，他对什么都表示同意，仿佛想以此来求得对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宽恕。有一回，我就这样坐在院子里，我丈夫买面包去了。那正是在一个下午，有太阳。进来一个年轻人，问我丈夫在哪儿，我说买面包去了。他说他等他。我以为他是保险公司职员哩，他戴着领带，上衣却裂开了线缝……后来，门一响，我丈夫提着网兜进了院子。那个年轻人一出现在他面前，他便猛吃一惊，吓了一跳。那人看见我丈夫吓成这个样子，不禁乐了："您是作家赫拉巴尔吧？"我丈夫点点头，脸红得更厉害了。年轻人掏出身份证，自我介绍说他是内务部的职员。我丈夫微微一笑，搭着年轻人的肩膀，轻松地喘一口气说："我真高兴！"那年轻人说："可您吓了一跳，是不是？"我丈夫兴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撒谎说："可不是吗？我还以为又要请我到哪儿去参加座谈会哩！"年轻人愣了一会儿说："我们可以单独谈一谈吗？"我丈夫将一网兜面包交给我，自己拿一个吃，领着那个年轻人

进了屋子，猫儿艾当跟在他们后面。我啃着小面包，透过敞开的窗子听见他们两人在低声地交谈。猫儿艾当坐在写字台上，跟往常一样，每隔一分钟冲着他们喵呜一声，仿佛是表示同意。半小时后他们走出来，艾当跟在后面。我丈夫的样子似在笑，可却在忍着不哭出来。他们相互握握手。那位上衣裂了线缝、打着领带、有双漂亮眼睛的年轻人，像是位诗人。他对我鞠了一躬，还私下里对我说："您就当什么也没看见，不必在什么地方谈起今天的事儿，好吗？"我望着院子的地面，一直没把眼睛抬起来……

我丈夫得到了去巴尔托罗姆尼伊街的邀请，说是要他去参加一个读者座谈会。他中午就去了，晚上才回来。回来时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比他最近几次从读者座谈会回来时更加疲惫不堪。最近他老爱在这些会上谈自由，说自由对于他一个作家来说是绝对要一见不撒手的。可是他到晚上才从巴尔托罗姆尼伊街回来，且闷闷不乐。从这一天起，他的眼睛便挪动了位置，像犹太教牧师的那样。他说话小声，左顾右盼……后来听他告诉我，直到下午五点以后才结束对他的有记录的审讯。由我丈夫说，人家用打字机打，然后再由他签名。说他与巴威尔·迪格里特[①] 说过话，说他们一道出去郊游过，还带了一瓶酒，有个农夫还在那里给他们演奏过竖琴。说他们一块儿喝酒，谈论世界政治和文学来着……我丈夫后来对我说，他刚

① 巴威尔·迪格里特(Tigrid Pavel)：捷克新闻记者，二战后侨居法国，1989年哈维尔上台执政后，为捷克文化部长。

被叫去时，谈话还很轻松，有说有笑。说当他们来到巴尔托罗姆尼伊街那栋楼房的走廊上，准备上电梯时，那个自称是参谋部大尉拉拉赫的人还对我丈夫说，可惜他忘了带本我丈夫写的书来让他签个名。我丈夫对他说："这里的样子与醉汉收容所完全相反。这里的门没法从里面打开，而在醉汉收容所，每个病号，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走掉。"我丈夫还说，"连这走廊上的门，也跟疯人院的不一样……"拉拉赫气得往桌子上一拍巴掌说："我们这可不是在什么座谈会上或者酒馆里！现在得根据你的交代做出记录：你是怎样帮助敌人和共和国的叛徒巴威尔·迪格里特的……"我丈夫将他在那里讲的一切告诉我，他的过失感越来越重了。他本来就觉得来到这个世界是个错误，如今又加上了他跟共和国的叛徒交谈过这一过失。……我严肃地看着我的宝儿爷，他可爱高谈真理。说一个人应该敢说话，即使要付出任何一切，也不应该害怕。他总爱说一句话："我的自由得靠我自己去取得……"

我坐在二楼的外廊上，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整个院子。昨天还从邻近研究所的大墙上飞来一块墙皮落到我们院子里。我还看到我家敞开的窗户，那些爬山虎的长藤沿着扯起的铁丝绕着，像女人的长发耷拉到院子的地上。我就这样望着我们这座小院子，望着敞开的白门和被爬山虎缠绕着的白净窗户。我听到在我坐着的楼下贝朗诺娃太太正提着一桶一桶的水往地上浇，还边浇边嘟嘟哝哝、骂骂咧咧。突然从楼下响起沃拉吉米尔的喊声，他在喊我呢："赫拉巴尔太太！"我从外廊里探出头去，沃拉吉米尔站在那里，举着手。他的个子真

高大，他伸直身子，我探出头来，一伸手便接过他在利本尼哪个广场上揪来的一束郁金香。我收下了花，沃拉吉米尔对我说："太太，请告诉博士，我刚刚跟'老邮局'饭馆的小伙子们交谈过，您告诉他，钢锭熔化了，常常和我们坐在卡雷尔酒店跟大叔一块儿喝酒的那个费舍尔先生死了。上午，费舍尔先生正跑着的时候，撞在一个钢水槽上，淌出的滚烫钢水追上了他，把他的脚全烧没了。他死了……他的棺材将会很短！您再告诉他，还有一个人，就是常跟博士一块儿乘车去克拉德诺的那个人告诉我说，在他们一起干过活的高炉旁边的废铁站那儿，运来一批报废汽车，当人们剪开一个装着轧扁的轿车包时，发现有一条人腿也轧在里面……您把这件事也告诉他，好吗？这束花是我送给您的一点小意思。您知道，您丈夫如今已经出名了，有完全不同的一批朋友，我如今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百姓。"说着，几步就跨出院子，越过湿漉漉的走廊不见了。我还听见他的脑袋碰在带罩的电灯上的声音。贝朗诺娃太太又因为他踩在干净的地上而骂了他几句，继续用她那装满水的桶在浇水洗地……

的确，自从我丈夫出了第一本书，到最近出的一本——第五本《房屋广告》[1]，从这时候起，连他过去那些朋友，并不是出于嫉妒，可都说我丈夫变了，说他如今已是个作家。于是有一个这样的普通人再也没到我们家来。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他老写那些同样的东西，老写一些关于木箱的短篇小

① 该书全名为《连我都不愿去住的房屋广告》。

说，那些活像一口棺材的木箱，那些放在街道拐角处，里面装着修补城郊道路的工具木箱、那些用大锁锁着的木箱，那些系上铁丝的木箱。后来我还经常见到这些木箱被打开，穿着蓝工作服的工人们从这里面取出杈子、锄头、耙子、斧子、锯子等等。他喜欢谈起这些工人，他说，在他成为公职人员之前，他也曾经修过路，也有过这些木箱上的钥匙。没有任何东西像这些箱子和拿着杈子锄头耙子斧子和锯子干活的工人们的谈话内容那样使他激动。那人是个工人干部之类的，他喜欢喝啤酒和罗姆酒，可远比我丈夫的举止文雅。他总是坐在窗边，听着、微笑着、抽着烟。他打着领带，只要一开口，总是说的修路工人和这些木箱的事儿。他再不来我们家了，死于一种肝病。他几乎写了整本关于这些木箱的书，可是这本书、这部稿子丢了，就像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布希尔先生帮我丈夫出版的任何一首诗一样。这位布希尔先生是从斯特拉什尼来的。人家都说他从小就在花园里造一艘大船，船上还有机舱和桅杆。说这船大得没法将它从花园里搬到河里去，除非把它拆了运到河边再重新拼接起来。

油漆工什莫朗茨先生也不上我们家来了。可以说，除了沃拉吉米尔以外，什莫朗茨先生就是常到我们家来的那些诗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小姐们最爱追求那位什莫朗茨先生了。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什莫朗茨先生不仅有一头梳得很好的浅色鬈发，像刚从理发店出来的那样显得精神，而且穿得很帅，更主要的是，他老是绅士风度。他把超现实主义者雅克·瓦切当做他的偶像，不过他只是像超现实主义者那样生活，写东西并不

多。每次什莫朗茨先生一来，就像一道光亮射进暗室，因为他的头发油光散亮，又因为他在外面为脚手架涂漆，所以他总是晒得黝黑闪光。如果说有人像希腊神祇，那就是什莫朗茨先生。他已有点儿发胖，总想保持体形，便坚持打网球。他为自己的肚子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可我却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什莫朗茨先生实际上不胖不瘦正合适。

住在利本尼上区的印刷工斯坦达·瓦夫拉也不到我们家来了。这个斯坦达喜欢打扮，爱吸烟和写个小诗及短篇小说什么的。他也为自己懂文学，熟悉波德莱尔[1]、兰波[2]、布雷顿[3]和艾吕雅等多位诗人而感到骄傲。这个斯坦达实际上是这些小伙子中最俊的一个。他天天上班，为他这份工作而感到自豪。在穿着打扮上可谓无可挑剔。他满脸亲切的笑容，对我彬彬有礼。后来听说跟沃拉吉米尔·博乌德尼克成了好朋友。博乌德尼克带着他去参加“招魂术”活动，这些活动通常在街上汇集一帮行人、看热闹的人和听他讲话的人参加。由沃拉吉米尔亲自主持。他在布拉格墙上画几个斑点，然后就这几个斑点大发一通宏论：如何轻而易举地将布拉格剥落的墙壁变成一个画廊。

---

① 波德莱尔(Baudelaire Charles，1821—1867 年)，法国现代派诗人，代表作《恶之花》。

② 兰波(Rimbaud Arthnr，1854—1891 年)，法国诗人，是象征主义的典范人物。

③ 布雷顿(Breton Nicholas，1553—1625 年)，法国多产作家，1589 年被评为最佳抒情诗人。

那位经常与我丈夫站在瓦尼什达老板的酒店走廊上喝啤酒的小个子布景工巴夏，也不上我们家来了。想当初他们只是这么在走廊上站着，就能喝掉十瓶啤酒。这位小个子巴夏有个漂亮的小女儿，名叫蕴杜尔卡。有一次他们将她借给了我们带到克尔克科诺谢山脉那儿去度假。她同我们一块儿睡觉。这小姑娘像她爸爸布景工巴夏一样聪明。巴夏可是把挣得的钱喝了个一干二净。他跟我丈夫要好到这个程度：当他们两个都喝得烂醉时，便在我家门槛上一直坐到半夜。有好几次他们用一根钉子在厕所墙上刻了誓言说，从明天起开始新的生活，两人将结伴去治病，吃禁酒药，绝不再酗酒，因为巴夏已经因为酗酒而误过事了。

我丈夫自从当了作家之后，继续在家里请朋友聚会，但来的都是些新人：有编辑、有画家，还有社会学家。不过他们早已在别的地方喝得酩酊大醉。杜哈切克晚上来时，也已喝醉，可我丈夫还是给他们烧一平底锅猪肉，煮一大锅红焖牛肉，派人拿着好几个大肚罐去打啤酒。他们醉得越厉害，他们的吵闹声便越大。说起话来嗓门一个压一个。也陆陆续续来一些女客，她们比爷们儿还要醉得厉害，有的甚至刚一进门，便挨着墙壁出溜到地上去了。我们家没这么多凳子，他们只好站着，或者滑到地上，把墙上弄得脏兮兮的，或者干脆在地上睡着了。马利斯科先生也来了，他还继续在掰弄手指关节，因为他还一直在民族剧院演奏音乐。有时候杜哈切克还把他的一些朋友带来。这么一来，便有二十来人挤在我们的小屋里。我丈夫可高兴了，我便忙着给大家递碟子，可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拿

不出这么多碟子来。到后又来了一大帮年轻人，我脸一红，解开围裙，拿上我那把雨伞，穿上我的红高跟鞋，卷起我的睡衣，半夜出门了。我丈夫和马利斯科便扎上围裙，招待着这一满楼吵吵嚷嚷的男女。女编辑和女美术家也都醒来了。我一走，我丈夫和马利斯科先生便给他们一人发一个勺子，把平底锅放在屋子中间地毯上，又给他们递面包。猫儿艾当在这些醉鬼中间穿来穿去，用爪子将喝醉了的杜哈切克从它坐着的摇椅上推开……

我丈夫到摩拉维亚他的故乡布尔诺去参加了读者座谈会。第二天回来时，一脸的沮丧，灰溜溜的。晚上，我从维也纳森林回来，看见他坐在桌旁玩啤酒杯垫，用手指转动它，怎么也没法将转动这个上面印有“金虎”字样圆形硬纸垫的游戏停下来。“会开得怎么样？”我问他，把我那双满是尘土的脏脚浸在盆里。他弯下身来，给我打上肥皂，帮我洗脚，一边轻声地叙说着：“一切都很好。可等我走进大厅，看见拐弯处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副夹鼻眼镜，在他身旁还站着个女人。那人对我说：‘我受委托……您是赫拉巴尔先生吗？或者您不是？您是！我的一位朋友，从前的奥地利军官托我告诉您，您是他的儿子，这位女士是您的妹妹……他对那时不能娶您的妈妈却上了前线而表示抱歉。请看，这是他穿着奥地利军大衣的照片，这是他穿着军装的照片。后来，战争一结束，您的妈妈又已经嫁人。可是您知道，血浓于水，这是您的亲爹，一位从前的奥地利军官，如今已是一位老爷爷了。他感到非常非常抱歉，可是您知道，那时年轻人得为奥地利挥洒热血……这是他现今的

照片。'他将这一小包照片给了我，我看着我这个妹妹，她跟我一样有个高颧骨，一张公猫脸。后来，座谈会主持人开始嚷道：'我们找赫拉巴尔同志！座谈会五分钟以后开始！'我和我妹妹站在一起，我像猫儿见面时那样亲了她一下。我的妹妹对我说：'爸爸不敢来，不知道您能不能原谅他。您明天上我们那儿去一趟吧！去看看咱爸！来吧，好吗？'我说，我考虑一下。厅里又响起找我的声音：'请赫拉巴尔同志上台来，座谈会开始啦！'我于是出席了在我故乡举办的读者座谈会，就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我妹妹五分钟之后，手里还捏着一张穿着旧奥地利军服的男人照片。有人在介绍我和我的作品。我掏出几张照片来看：不错，这是一个挺精神、甚至漂亮的人。可是我越看照片便越清楚地知道，我明天不会去看我爸爸，不，我的父亲。我爸爸是那个虽然不是我的生父，但是抚养了我的人。他曾经总是那么说：'你在中学年年留级都可以，但你必须毕业！'他让我上大学，他曾经为我妈妈而有过负罪感。这个弗朗茨因已经被写进了我的《在被吃光的店铺》一书中。我自然没有去我生父那里，也没去看我妹妹。我那位穿奥地利军服的生父还算不错，再没来找我。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老有一种过失感，因为我生活在使弗朗茨因和我妈妈难受终身的过失之中，于是无过的我总是往过失里钻，我总是躲避，躲避我出生前就已安在我身上的过失。喏，就像我曾经对你说过的那样，就像贝尔特斯先生所说的：我虽然在朝前迈步，可却用手指指着我的面具，我像一个演员戴着这面具，拿定主意扮演小丑、滑稽人物……"我丈夫喃喃地说着，我朝下看他，他正蹲在我面前替我洗脚，替我洗脚。我顿时强烈地意识到，他是我的

丈夫，我是他的妻子。

我在利本尼这家里时，跟猫的对话多于跟我丈夫的交谈。这猫都学会了回答问题。它总让人把它抱起来。瞧，它已经蹦起来，我抓着它的胳肢窝，猫儿闭上眼睛，我把它搂在怀里，这瞬间我认识到母爱大概是什么样的。当猫儿紧紧地依偎着我，当他蜷缩在我膝上，我陶醉得心都软了。有时它呼呼大睡，可是在入睡前它总要久久地望着我的眼睛，两只小爪子趴在我肩膀上，望着我。有时它认为我没洗脸，便仔仔细细在我脸上舔个够。有时候它又认为我只有耳朵不干净，于是又细心地把我的耳朵舔一遍。而且还总要叽里咕噜地对着我的耳朵说点儿什么甜言蜜语。说一遍，又说一遍。当它已经在我的膝盖上蜷缩起来，便又有了新的主意，我静心候听着，它又往我耳朵里悄声说了些非常动听的话语。我特别期盼这种时刻。我跟我丈夫一样地盼着回家。要是没有这猫，他在家里恐怕呆不住。除非又在家折腾个什么家庭聚会。猫儿艾当到早上才回家，我们的窗户总敞开着，它先瞧瞧第一张床，然后瞅瞅另一张床，随后选定一张来睡觉。它每次出去都睡在另一个地方。我们从来也没猜中它睡在谁那里。它的爪子要是脏，我就用块抹布给他擦干净，我还要给它擦干净肚皮。边擦边骂它几句。也只是装着骂骂而已，就像骂孩子一样。它知道我爱带着它睡，于是便美滋滋地闭上眼睛打起呼噜来。随后我便将头枕在枕头上。外面要是很冷，猫儿艾当便钻进被褥里打它的呼噜。它在被窝里暖和过来之后，便挨着我伸直身子，它的个子长得后爪子够着了我弯着的膝盖。它甜美地呼吸着，舔舔自己，然

后伸个懒腰，整个地放松了，于是我们俩都睡了。我觉得非常舒服，尽量多躺一会儿，猫儿在被窝里躺着够热乎的，还出汗。可是散发出来的是香气。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脑袋正好挨着我的眼睛，它眯缝着眼睛瞅着我，我也瞅着它，就这样互相监视着，彼此细细观察着，等到我们双方都有把握地认为，对方还呆在原来的位子上没动时，我们才放心地安然接着入睡。有时我丈夫起床后，便走来瞧瞧我们。这是我俩夫妻生活中最美好的片刻。我丈夫在晨曦中俯下身子看着我们，然后挨个儿抚摸我们一下。他又看着我那刚从睡梦中醒来的笑脸，看着猫儿舒坦的呼吸。我从我丈夫眼里也看到他跟我一样怀着对这只小动物的温情。猫儿看出了这一点，它为拥有我们两人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它每天都在审视这种由它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幸福。它甚至细心到这个程度，要是它注意到我们两人中有一个更忧伤，它便会投以更加忧伤的目光。艾当也为我们吃什么它也能吃什么这一点而感动。要是我们中哪一个不从自己的饭菜中拨出一口给它，那就要惹麻烦，它便跳到椅子上，并将前爪搁到桌子上。要是这样还不管用，还没引起注意，它便又将一个爪子搁在我们中的一个人弯着的胳膊肘上。有时我们假装根本不知道它在这儿，它便像早晨用爪子敲窗户那样敲打着，表情十分焦急，简直近乎绝望。它终于悲伤地喵呜起来。后来，我们便给它一小块馒头，还有一小块肉、一点儿土豆，总而言之，我们桌上有什么，我们吃什么，样样都得给它一点儿。因为这食物、这午餐、这晚餐、这早餐，对于它来说，是证明我们还爱不爱它的试金石。有时我们在吃午餐时给它一个小碟子，猫儿便两条后腿蹲着坐在椅子上，前腿搁在桌子上，面前摆着盛

有食物的小碟子。它吃饭的时候，先左右环视一番，然后吃得有滋有味的。多少次我都拿猫儿艾当给我丈夫做榜样。我每次责备我的丈夫吃饭像个野人，狼吞虎咽的，就让他看看艾当吃饭多斯文。它跟我们在一起吃饭，那风度跟我丈夫恰恰相反。艾当好像听懂了我的话，越发吃得有条不紊的，就像它干其他事情那样。不过我最高兴的是看它吃早饭，它总是得到一份热牛奶，里面放些面包碎段，它叉开两腿，喝着喝着肚子就慢慢胀大，然后总要歇一会儿，假如我丈夫在家，我们俩都等待着这一片刻：如今猫儿回过头来，身子并不转动，可爱地、久久地望望我，望望我丈夫，仿佛是在表示感谢。它大概感觉到在它喝牛奶的时候我们俩都在瞅它，所以它也瞅瞅我们。我们弯下腰来，都摸一摸它。在我们这样俯身瞅着猫儿的这一片刻，我们也总是互相交换个眼色，我们挨得很近，几乎是半蹲着，眼睛挨着眼睛。猫儿总是逼着我们彼此笑一笑，我们便闭上眼睛，就像我们常常跟艾当的那样互相碰一碰额头。艾当知道这一切，它和我们之间有着它自己和我们的秘密，我们相互爱着。艾当还注意对我们一碗水端平，免得我们彼此嫉妒，因为猫儿艾当清楚地知道它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

我丈夫还坚持着访遍布拉格所有小饭馆小酒家，并有为它们各写一篇小报道的远大目标。于是去到波多里，同时顺道去医院探望他的朋友、诗人扎布拉纳[1]先生。但是在进到诗人

① 扎布拉纳(Zabrana Jan，1931—　)，捷克诗人、小说家，俄、英文学翻译家。

扎布拉纳先生的病房之前，先得经过一间住着四位老寿星的病房，就像扎布拉纳大笑着告诉他的：他们四人合起来有三百九十岁，他们穿着黑礼服，就这么坐着等死。我丈夫劝诗人说，治感冒和咽炎的最佳办法是多喝啤酒。只穿件睡衣的诗人往身上披了件冬大衣，便和我丈夫一道又穿过那间住着四个等死的老人的房间——他们合起来的确有三百九十岁。然后上卡拉斯基酒家去。那时正当中午，我丈夫还特地关照啤酒要度数高的。喝着喝着诗人便开始朗诵"垮掉的一代"[①] 成员的诗来。接着又大谈金茨伯格[②] 和凯鲁雅克[③]，然后又谈到颓废派天使，他们就这样一直喝着啤酒，还往啤酒里掺了格罗格酒[④]。天已经黑了，等诗人想起了弗林格蒂[⑤]，于是又谈论了一通他的诗，还边谈边喝着啤酒及格罗格酒，直到服务员准备关门，开始将椅子扣到桌上时，他们才只好付账告退。等他们出了酒馆，被这些美妙的"垮掉的一代"诗歌弄得走路摇摇晃晃。诗人扎布拉纳说，他看到的全是这些诗人的一张张面孔，他感到头晕目眩。他们只好叫了辆出租车，回到利本尼已是后半夜。由于格罗格酒性发作，两人都摔倒在院子里，我丈夫喊了我，可他摔倒在地起不来。他可真像马利斯科所描绘的那个样

---

① "垮掉的一代"，20 世纪 50 年代末出现于美国知识阶层中的一个颓废流派。

② 金茨伯格(Ginzberg Louis，1873—1953 年)，出生于立陶宛的美国犹太教学者，曾移居美国。

③ 凯鲁雅克(Keruac Jack，1922—1969 年)，美国诗人、小说家、"垮掉的一代"的领袖和发言人。

④ 格罗格酒，罗姆酒或其他烈性酒加糖和水熬成的烈性饮料。

⑤ 弗林格蒂(Farlinghetti Lawrence，1920—)，美国诗人，50 年代在旧金山发起"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

子："他可真会摔，摔倒在地也是一幅舒舒服服躺着的姿势……"于是他们就这样躺在那里。我气得睡不着觉。那位夜莺[①]先生穿的是睡衣，他试着爬起来，可后来也放弃了这个打算。他敲敲我的窗户，可我宁可装做不在家，到早上我才将他们放进来，这才看清了扎布拉纳这位诗人，这位全名叫洪查·扎布拉纳的诗人，科拉什曾描述过他，说洪查[②]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而且喜欢玫瑰花束，说他和这位扎布拉纳以及希夏尔[③]在敖德萨的时候，只有希夏尔知道给敖德萨的女士们献上一束红玫瑰以纪念巴别尔[④]等人的短篇小说。喏，那天早晨天亮之后，我的宝儿爷跟死人一样躺在桌子底下，而诗人扎布拉纳悠闲自在地交叉着二郎腿，给我朗诵了"垮掉的一代"诗人的诗。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不管他穿的是睡衣和冬大衣，反正我还没有听到过有人像他朗诵得这样动听。他还隔一会儿便感谢我一番，说到我们这个院子里，他的感冒就好了。他的眼睛跟《大都市短篇小说集》里描写的查尔斯·拜尔的眼睛一样漂亮。这个查尔斯曾经在摩天大楼上那五米高大钟下等候他的恋人，那两米长的分针转一大圈，他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的恋人没有来，因为她的车子坏了。诗人扎布拉纳的眼睛也像这位查尔斯这么俊美。他给我朗诵诗的时候，我丈夫躺在桌子底下哼哼。后来过了好大一阵子，诗人扎布拉纳先生吻一下我

---

① 指诗人扎布拉纳。

② 扎布拉纳是他的姓，扬为他的名，洪查为扬的爱称，其实都是扎布拉纳。

③ 希夏尔(Hiršal Josef，1920—　)，捷克诗人、翻译家。

④ 巴别尔(Babel Issak Emmanuilovich，1894—1941 年)，英国短篇小说家，以写战争小说和敖德萨的故事著称。

的手之后，便同我丈夫一道去吃牛肉和酸鱼，以便调理一下胃口，他们踉踉跄跄走过院子，我丈夫还懒洋洋的，扎布拉纳却已兴致勃勃，即使穿着拖鞋和大裤腿的睡衣裤也满不在乎。他们回来的时候，诗人扎布拉纳已经心满意足，有点儿想回去了，可我的宝儿爷却躺下了，还一个劲儿地埋怨那酸鱼吃得他直难受。过一会儿扎布拉纳又返回来，给我送来一束玫瑰花，出院子的时候还转过身来给我一鞠躬……我丈夫一直躺着打嗝儿。下午我不得不去叫辆出租车，因为我舍不得废掉那两张电影票，由库珀[1] 和赫伯恩[2] 主演的《午后情爱》……"你醒醒吧，我的老天爷！"我对我丈夫说，可他却走路颤颤悠悠、饱嗝打个没完没了。电影是在煤库后面关闭了的科林城旅馆附近放映的。放映室只有两个大篷车那么大，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俩因为有请柬才捞得了座位。《午后情爱》一开映，我丈夫便开始打嗝。影片中的茨冈人在演奏"迷恋曲"，我丈夫站起身来，从观众的一条条腿之间迈过去。银幕上出现一块黑影。他匆忙跑到外面。大门旁边是围着煤堆的铁丝栅栏。谁都听得见，我丈夫在那里吐得死去活来，还有那被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的干嚎声。而我，为了维护我丈夫的名声——因为我丈夫交代过，要我随时随地注意维护他的良好名誉。于是我站起身来，我的身影便也出现在《午后情爱》影片银幕上。我转过脸来对着直射银幕的强烈灯光，对着观众说："对不起，我丈夫

---

① 库珀(Caoper Gary，1901—1961 年)，美国电影演员，是好莱坞长久受欢迎的明星之一。他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有魅力的平凡人物。

② 赫伯恩(Hepburn Katharine，1909—　)，从事舞台及电影表演达 50 余年的美国著名演员。曾多次获奥斯卡奖。

吃了酸鱼尾巴！”然后坐下，过了一会儿，电影中的茨冈人又在用小提琴和吉他演奏“迷恋曲”时，我丈夫又跨过观众的膝盖挤了回来，冲着灯光眯缝着眼睛，用手指着自己的嘴巴向大家解释说：“我吃下了酸鱼尾巴。”我一把拽他坐到位子上。电影中的茨冈人在蒸汽浴室、在淋浴龙头下继续演奏……电影放完了，我羞得恨无地洞可钻。所有观众都哈哈大笑，而且还祝贺我丈夫说，在放映如此绝妙而又庸俗的电影时走出去透透风真够舒畅的。而我这宝贝丈夫重又将吐在铁丝网栅栏旁的酸鱼尾巴指给他们看……

我丈夫对克斯科的这片林子喜爱得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之中。他还高兴地发现，这里虽然没有了利本尼那些家庭聚会，可是却有另外一些欢庆机会。不管谁讨老婆或者生孩子，谁过生日或者命名日，都要在我家里庆祝一番，少不了请来很多客人，喝上一大桶啤酒，好多瓶烧酒，还有烤小鸡和其他烧烤食物。再加上我丈夫一年之内结交了许多过去的富裕农民、现在的农业合作社社员、所有的无地农民、小店主，甚至公安部门的助手。因为我丈夫根本分辨不清这些上酒馆去的人谁好谁坏。去的小酒馆有森林小屋、赛米采酒店、小镇酒家，甚至到离家较远的维莱卡、赫拉斯特、曼特尔谢特等等这些地方的酒馆去。他走到哪儿都受欢迎，因为我丈夫喜欢当众表演个什么的。在聊天侃大山方面，在喝啤酒方面那他可真是头号种子选手、冠军。到了秋季和冬天，就有人邀请我丈夫参加宰猪节，一大清早他就已经呆在个什么地方看着人们怎么把猪从圈里赶出来，他眼泪汪汪看着那子弹从专门杀猪枪里射进猪的两眼

之间脑门子里。然后他便系上围裙，帮着烫猪刮毛，还特别喜欢洗猪肠子，边收拾边喝着酒，不停地跟人家聊着天，因为我丈夫也算得上半个农民……当我跟他走在地里时，他看到庄稼熟了总是激动不已，像个国王一样走在田坎上，用手抚弄熟了的麦穗。到该收割的时候，他便揪下几根麦穗，嗅一嗅味道说："一个礼拜之后，塞德拉切克博士[1] 该收割庄稼了。"我丈夫还懂得怎么种植甜菜和作饲料用的玉米。喏，一年之后，这里每个小饭馆小酒店都有了他常去坐的席位。跟他坐在一起的有老农民、新社员。我丈夫也很爱听他们讲地里的活儿……他还画了一张当地的地图，在上面注上各块田地和草场的名字，回家后还一直为那些名字兴奋不已。他挨个挨个儿地往上填名字：在我们那块被松树林包围着的林地后面是诺瓦克草场，还有那名叫"噼啪响"的大片田地，田地那边是松树林，这里的人管松树叫黑果，林子名叫"砖瓦厂"，然后是一条小溪，也就是一条小水沟，流经诺瓦克草场、桤木丛，流入易北河。再下面便是草场弗赛西、河畔草地弗哈尼涅、田地约达克，还有一个自古以来就叫巨橡林的，因为那里有许多高大的橡树，过了桥到河那边便是利托莱。逆易北河而上有一片河滩，沙子很细，曾经是军人游泳场。拐弯处有一小块地方也可以让老百姓去游玩，人们就叫它"橡树林中"，我不得不陪我丈夫去那里一趟。在沙滩上有几根大橡树干，已被烧焦，又黑又硬像块大石头。他像在布拉格总有一张布拉格地图，将他去过的小酒家都注在某条大街、小巷、广场上一样，如今不仅往这张当地的地

---

[1] 赫拉巴尔年轻时常去他家帮忙收割、码稻草。

图上写了草场、田野、湿地、森林的名字，而且在林场分布地图上写了各个林场的名字，如象鼻子、谋杀村、宁城羊肠路、臭水沟、葡萄园林、鹿耳朵井等。

我丈夫在家的时候，总是坐在桌子旁边，从白天直到天黑地望着外面通向我家大门口那条白桦林阴道，道上第一棵白桦树的树干比别的树要粗一倍，是个大美人。它粗壮的枝叶像链条拴着回转木马一样甩向四方。我丈夫说，这棵白桦跟别的白桦树同样年纪，可是它既粗壮又有力气，抢在别的树前面及时占领了空间，别的树虽然也长得跟它一般高，可是没有与这位大美人同步抢到发展空间，因此旁边的枝干没能伸展开来。那棵大美人的枝干长得油黑油黑的，而其他这些树的树皮虽然更嫩更漂亮些，但只能往高里长，只要来一场大风，这些瘦高个儿白桦树就有可能被折断。可是狂风从来没刮到这条小林阴道，因为旁边有一排橡树挡着。这排橡树仿佛给我们家的这块空地镶了个边。管林员在种松树时，在林子边上镶一圈橡树链。我们走在这片已有一百四十年之久的松树林中，只见砍倒了一些老松树，我丈夫数了数这些松树的年轮，他指着这些树干的年轮给我看，说有些树干很细，仿佛比那些粗它一倍的树要年轻一半，说这就跟我们人一样，即使上的是同一个学校，在普高或过去的七年制中学，每个年级几乎都有同年同月出生的学生，但个子却不一样大。我丈夫总爱给我上课，教导我些什么，可我总是半信半疑地听他讲，因为他说的那些东西总让我觉得难以置信、模棱两可，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在家的时候总爱给我讲解点什么，我觉得他有点古里古怪，他对我的这种感觉表示惊讶不解。他喜欢独自一人想他自己的事，

喜欢幻想，但并不是怀念什么或者想哪个女人，只是突然在我们的松林中冥思苦想起来。他慢慢地蹲下来，手掌托着下巴，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就这样像个什么阿拉伯人一样蹲上个把钟头，美滋滋地微笑着，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因为他怕在眨眼的瞬间会失去他所见到的东西。我真受不了他这个样，我常想，我丈夫是个二百五。于是我便突然大着嗓门喊他一声。我丈夫对我这想法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堪不好意思，可却被我吓一大跳，脸也白了，说不出话来，仿佛刚刚被我从睡梦中吵醒……"你还不如去找点事儿干哩！瞧，我们的门槛得钉严实些了，一方面那条缝老灌风，再说，老鼠会钻到小屋里来的。"我丈夫背靠树干站着，或者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手掌托着下巴蹲在那里。当他瞟我一眼时，我看得出来，我惹他生气了，他恨着哩！"我已经没处可逃了！"他绝望地说，声音在发抖……

我们自从买了这栋小木舍，我每个星期便都到克斯科来度周末。虽然我们在屋顶上加了间锡顶工作室，可我没见我丈夫写作过。他写东西跟在利本尼的时候一样。我丈夫想要开始写作时，便好几个小时地聚精会神，望着窗外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光喝咖啡不吃饭或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当他坐上这么两个小时之后，将纸装进打字机，他同他的打字机和凳子便像插上翅膀在空中飞翔，在云彩上方飞翔，如同童话中的飞毯一样。他写东西的时候，一边敲着键盘，一边嘴里嘟嘟哝哝念叨着。有时他盯着这部打字机看，仿佛对它说很快就要带着它从窗口跑到森林里去。每当他在敞开的窗口旁写作，天气好时或者在院子里、凉台上，有时在厨房里写作，那景象可真特别：

比方说跑来一群孩子，他还接着写他的书，一边还要不停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客人们总是悄悄地从他那儿走开。有时邮递员给他送来信或者汇款单，我丈夫点点头致意，然后接着往下写。大家都高兴见到一位正在写作的作家。可是见他写得那么快，又都不相信他能写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他们有时走到他身后，越过肩膀看他如何哒哒哒哒将一个个字母打到纸上。然后点点头便走出去了。孩子们继续在院子里玩耍，球儿常从他头顶上飞过，可他根本不在意。不过要是换了我在他肩膀后面瞧一眼，他便大声吼叫，就像他所说的，仿佛被人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受不了。

我丈夫有我在跟前便停止写作，他怕我。当我提前回家，就像过去看见我在利本尼的院子里出现那样，如今在克斯科他只要看见我在白桦林阴道上往家走，他便立即四肢发软，将写作用具收拾起来，“你能写完的，”我挥一下手说，“明天，等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别出去酗酒！该在家里写东西，我反正要去上班。”我生硬地说。他又不跟我说话了，然后便到林子里去转悠。回来的时候，又不知在哪儿喝了个半醉。我觉得自己至少在这一会儿占着优势。他却又使出一招来回敬我：只要我一来，一刻钟之后他便走掉了。在林子里、在草场里游荡，沿着小河、淋着雨，然后又泡在小酒馆里。每次都说，我出去走走，到林子里转转，可总是到深更半夜才回来，通常我都睡了。他在林阴道路口跟住在附近的熟人喊话，总是扯着嗓子在那儿喊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他们离得老远喊着话约定明天哪儿见面。我们的林间小屋从来不闩门，总是开着的，就像我们在利

本尼也不关门那样。夏天敞着大窗户，冬天开着小窗户，好让我们的小猫艾当能够出去或者回来。在克斯科这所小屋里艾当最喜欢跟我呆在家里了。它蹲在我的膝盖上，一副可怜相，由于害怕森林而吓得不断出汗。直到我们将它放到汽车上，它才恢复平静，精神起来。一路上用它两只小爪子遮住眼睛，只要从行驶的汽车里朝外看一眼便又吓出汗来，连忙遮住那往后退去的景象，直到来到维索昌尼才站起身来，爪子趴在车窗上朝外面看。等车拐到龙科瓦、经过热特瓦来到科特拉塞克，猫儿艾当便眉开眼笑了。它看看我、亲亲我的手。我们一停车，打开车门，它便蹿到 24 号大门前，伸上一个懒腰，跑到院子里，还没等我们掏出行李，它已经在水泵那儿甩动着小脑袋冲洗灰尘了。

在我为客人端盘子送上烤鸡的那家旅馆里，在我们的烤鸡高级小餐厅里，我早已干得轻松自如了。我甚至还拿着大钱夹子负责收钱，还收小费，数额之可观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过的。我在这个小餐厅里行动自如，像在家里一样。我早已不知什么叫紧张和疲倦了。在布拉格市中心这个小巧的餐厅里，认识我的客人都叫我艾丽什卡，那些跟我非常熟的人便叫我碧朴莎太太。他们来这家小餐厅也跟回家一样自在。到这里来的有电影和戏剧演员、导演、带着白色微笑的黑人、大学生，还有虽然已经走过橱窗、可是看到我们金灿灿的烤小鸡又返回来的客人。我在这里工作感到很幸福，甚至每天都为能到这里来上班而感到欣慰，特别是当我有那个大钱夹子之后。可是这段美好时光却很快就结束了。来了另外一名女服务员，一个染

了头发的傲慢女人。她从来没干过这活儿，餐厅里的女孩儿们说她是经理的情妇，让我对她留神一点儿，可我对自己的位置却很有把握，因为我不仅在巴黎饭店的厨房里干过，而且还在大堂里干过，并且在这里已经干了四年多。可是经理突然走来，让我把钱夹子交出来，让他那个臭娘儿们来收钱。我被羞辱得红脸了，因为无缘无故交出钱夹子，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就意味着失去信任，我气得解下围裙，辞职不干了。

一个星期后，我便成了废纸回收站的一名职工。这里的司机常常开着车到焦街我丈夫工作的地方运回来大包大包的纸。我这么一个习惯于闻烤肉以及饮料、沙拉和花香的人，我这么个习惯于像舞蹈家活跃于高级餐厅的人（因为我从小就渴望当个舞蹈演员），我这么个在餐厅里总是右脚向前摆出个舞蹈基本动作的人，一夜之间便成了一名有着自己的椅子、写字台和柜子的职员，透过我对面的窗子便可看到卡车如何开进院子里、打好包的废纸如何整整齐齐码到卡车上。在我办公室旁就是一间大房子，里面有十来个女工在打废纸包、堆着无数册旧书。而我是当会计的，由我来收这一车车的废纸和废旧书，开发票，将一笔笔账写进当天的账簿，一天一结算，然后将每天的账汇算出一星期的账目，到月底再算出当月这废纸生意的总账，每月一次汇总，最主要的是我还得给接收我们这些废纸的造纸厂列出账目。一个月之后我才发现，这项活谁也不愿意干。因为无论卡车开进来、卡车装上废纸开到造纸厂去、装货、卸货我都得在场，什么都得经过我的手，我什么都得写下来，把数字加起，计算，一天一百五十张收据和发票，我得在

每张条子上盖上我们公司的章子、签上我的名字。

正当我从宫殿旅馆餐厅的好职位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丈夫却沿着他的杆儿在往上爬，成了作家协会会员、文学报编辑部成员，还和门泽尔[①] 将小说《严密监视下的列车》改编成电影，为此获得曼海姆大奖。于是又高升一步，门泽尔先生为这个剧本获得奥斯卡奖。后来我丈夫和伊希被邀请到布拉格宫[②]，他们两人都获得克莱门·哥特瓦尔德[③] 国家奖，从此他成了国家功勋奖获得者。实际上我也成了国家勋章获得者，因为他拿回来的是两块勋章。那勋章不怎么显眼，但很雅致。就这样，正当我丈夫沿着他那根棍儿往上走之际，他抽屉里的存货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他从那里掏出来的这点东西，在宁城啤酒厂时还在写的这些东西，后来合成了一本书，名叫《花蕾》，是沃拉吉米尔·博乌德尼克作的插图，他为此得了四千克朗的报酬。可是三天之内便把它花得分文不存。我的宝儿爷沿着那根棍儿还在往上走，他在各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被编成一本书，名叫《家庭作业》，他那国家勋章获得者的棍儿把他抬得如此之高！可是，要紧的是他抽屉已经见底，空空如也，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倒要看看，这位国家勋章得主如今还能写出些什么来。

---

① 门泽尔，捷克著名的电影编剧，他与赫拉巴尔合作将赫氏的好几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

② 布拉格宫，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府所在地。

③ 克·哥特瓦尔德(K. Gottward，1896—1953 年)，捷共领袖、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48—1953 年)。

在一九六八年这时期，我丈夫已经停止写作。他早上提着篮子或网兜去买东西、遛街、上编辑部和上酒馆。如今，我成了坐办公室的人之后，下午便能回家，不再有什么热闹的家庭聚会，也不再有什么举杯欢庆了。我们那些我本就对他们不怎么欢迎的客人只要一看到我，只要我一瞅他们，便叽叽咕咕跟我说："要不要去打一罐啤酒来？"我立即堵住他们的嘴严肃地宣布说："不能再酗酒了！"他们也到克斯科来。我丈夫通常不着家，拄着手杖挨个挨个村子地串去了。他只要在哪里一坐下来，那些有钱的没钱的农民、合作社社员便立即将他围起来。我丈夫便又是说话、又是笑，快乐至极，大家都快乐极了。我丈夫于是在每个酒馆里同他们大摆宴席，而到我家来找他的那位倒霉的朋友，正坐在我这儿等着他哩！

当他被授予功勋作家称号时，我便自己在克斯科举办家宴，我将邻居们请来，大家一块儿喝酒，我还准备了很多盖上火腿香肠、鱼子、干酪什么的面包片。大家都很高兴，邻居们把自己能够和这样一位名人、克斯科的装饰品碰杯当做一种荣誉。猫儿艾当躺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出汗，它一直在那儿躺着，直到天快亮了，客人们才走出门去，拉着手风琴和小提琴，甚至躺在满是晨露的草地上，演奏着《无穷的魅力》，像茨冈人在电影《午后情爱》中热情奔放地演奏的一样。由于他们抽烟不止，在我们这栋林中小屋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等大家都走了之后，猫儿艾当被这烟雾熏得特别难受，便跑到屋外去迎接黎明。我们躺下时，我丈夫还好长时间呼唤着艾当，让窗子开着，窗下还放了张桌子。太阳上山的时候，一声枪响将我俩惊醒，

我丈夫立即跑出门去，喊着猫儿的名字，找了它整整一上午、整整一天。这场家宴之后，我俩坐在小屋里一大堆碟子中间、一大堆香烟头中间，坐在洒满了酒水的桌子旁边……墙根那边摆着艾当的小猫食碟子，而它却再也没有回来。

我丈夫心情沮丧，他走遍各个地方，逢人便打听艾当；他还常常有种幻觉，以为见着了艾当，可却是只野兔，或者一只野花猫。我整个下午都两手耷拉在膝盖下面，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坐在家里等着，我丈夫寻完猫一回到家里，我便怀着希望看着他，他也满怀希望看着我，可是猫儿没有回来。于是我慢慢地收拾一下便独自去利本尼了。我丈夫哭了，躺在床上，哭了。然后又到林子里转悠一通，在这里逗留了三天，等他回到利本尼，我铺好床，他躺下，病了……猫食碟子和碗、朝院子敞开着的窗户，一直照原样保留着，仿佛它可能从窗口蹿进厨房来，我甚至在它丢失的三个月里每天都给它准备了牛奶，每天还给它买了一块肉，给它切得碎碎的，可是猫儿没回来，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将晚上给它装肉的碗、早上给他装牛奶和面包的碟子都拿出去，搁在挡雨板上，让没人喂养的野猫吃去了。从此，我们的艾当再也没有到我们这里来过，既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走到利本尼去过，也没有回到克斯科的林中小屋里来。它消失后，只我们两人，显得格外冷清。我和丈夫甚至经常手拉着手或互相搂着脖子，头碰头脸挨脸地拥抱，因为这个艾当曾是我们之间的媒介，艾当将我们连在一起，当我们两人都以为我们彼此已经不怎么相爱了，已经再也不会那么相爱而且不能……时，艾当站在牛奶碗面前，当它一瞅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亲吻时，它总要逼着我们撞一下脑袋，跪下来彼此吻一下……

这时期我们到摩拉维亚的胡桃林我丈夫的亲戚那儿去了一趟，大家都生着一副高颧骨，来到这里参加婚礼。三十个人同一副面孔，介绍也白搭，因为我和丈夫一样怎么也弄不清谁是谁。我记得，举行婚礼仪式之后，管理教区的牧师也来到教堂，跟其他人一样地唱歌、吃饭。清晰悦耳的摩拉维亚语将大家联系在一起。可是最使我感动的还是赫拉杜芙科娃姑妈，她从婚宴中取了一些小甜点装在一个用来装内衣的大筐子里，上百个小不点的甜点，然后又准备了一个小篮子，装一小块鸡肉。我陪她到墓地上的一座小坟墓前，姑妈摆上带来的食品，久久地望着嵌在墓碑上一位年轻人的照片，然后非常仔细地将整座石墓擦得很亮，整理一下四周的花草。我站在那里凝视着姑妈，她坐在平铺的墓石上沉思着，随后耸耸肩膀，谁也没到这里来。半小时后，她将食品放回篮子里，哭了一场，我们又一道回到欢乐的人群中。人们告诉我说，她的独生子已在坟墓里躺了半年啦，有一次他骑摩托车到布尔诺去商量赛排球的事，和他的新婚妻子坐在一辆摩托车上，与电车相撞，他就死了。而赫拉杜芙科娃姑妈总相信她的儿子没有死，每天吃饭时，总是舀出一碗汤和一碟菜饭装在篮子里送到她儿子坟上，将饭菜摆到墓石上，她自己则坐在那儿等着。每天的午饭都是这么吃的。因为她想，她儿子死了的说法万一不是真的呢？

我丈夫在猫丢了一年之后才将利本尼和克斯科两处的猫食碟子收起来，埋在克斯科松树林下面的一座小坟墓里，还往里面撒了些花，填上土。代替墓碑的是一块大石头……我们常常互相凝视着，早已不像恋人那样接吻了。要是我们同时想起

了猫儿艾当，便额头碰额头地吻一下。渐渐地我们的这吻比我们那奇怪的夫妻房事更显得有意义。同房之时，我们两人都知道彼此已不在热恋之中，然而又彼此隶属于对方……夏天发生了一件事：我们来到克斯科，把行李和提包从车上搬出来，绕着我们的松树白桦林转一圈，和它们亲热亲热。下午我读报纸和杂志，如今，我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什么样的杂志和报纸都有，每一天、每个星期都如此。因为司机和搬运工们运来千百份印错了的报纸杂志，我们就从里面挑一些来看。我在这里读到的印刷品，我自己是绝对不会花钱去买的。就像我丈夫，他所读的书都是他那四年在焦街给废纸打包时找来读的，别的书他没读。恐怕有好几百好几千本可供他读的，可是我看到他老是读那几本书，给他摸得脏得像到了学期末的儿童拼音识字课本一样。当我正在阅读着《青年世界》时，我丈夫走进来，他一脸喜气，甚至惊喜万分，让我感到有一件大喜事在等着我。我抬起眼睛，高兴地说："艾当回来了？"他点了点头。他拉起我的手，将我带到小木舍后面的板棚那儿，说："艾当没有回来，但是它给我们派来了小猫，三只金灿灿的小猫。有两只跟它长得一模一样。"他拿了一个干净的碟子，往里面倒了点儿牛奶，将碟子搁在板棚敞开的门口，没多久三只小猫都跑了过来，像小疯子似的一下跑到碟子里面来了，前爪泡在牛奶里，狼吞虎咽般地喝着牛奶。当我丈夫去给它们往碟子里添点儿牛奶时，它们一弹便跑回板棚里躲着去了，等他添满了牛奶走开时，它们又跑回来，接着大口大口地喝着……

我丈夫到德国旅游去了，贝宾大伯已经躺在冰冻室的棺

材里等着我丈夫去看一眼。出殡的日子在春季的前一天。大伯死在里萨[1]的养老院里。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他早就离了婚，后来又结了婚，娶了达莎，达莎还带来一个小女孩，名叫丹卡。达莎跟贝宾大伯在一起可受老罪了。大伯还在扎拉比的小别墅时就不敢去上厕所，睡一觉起来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用四肢在地上爬，脑袋常常碰在两条椅子腿中间。他就这样生活着，实际上是躺在养老院的"无能行走者"部门里。我丈夫去探望过他，可是贝宾大伯已经不会说话，只是呆望着天花板，仿佛他透过这天花板见到了他的一片天空。大伯火化了。出了两份讣告，一份是按照我丈夫的意思写的，在通常搁上一句诗的地方，我丈夫将贝宾大伯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印了上去："这个世界美得让人发疯！并不是说它真是这样，而在我的眼里它就是这样！"我婆婆不喜欢这个讣告，她让印了另外一份老一套的那种讣告，于是我丈夫又像他一生处世的那样跟我婆婆各行其是了。葬礼之后，我丈夫在格莱戈里饭店请了一次客，那儿的花园里有个保龄球场，在那里摆了一张长桌子，我丈夫已将贝宾大伯的逝世搁在一边，出殡一小时之后这里已是一片欢声笑语，人们讲述着贝宾大伯的一些逗人发笑的故事。大家一块儿喝着葡萄酒、啤酒，吃着炸猪排。这场丧事实际上成了我们的一直闹到夜里的家宴。后来我丈夫又去了一趟国外，回来时，我们又埋葬了科齐扬[2]先生。他死于动脉硬化，他是一步步地渐渐崩溃的。即使他是朗

① 捷克一山区名。

② 作者赫拉巴尔的表妹米拉达的丈夫。

斯基伯爵的私生子这一点也没帮上他的忙，即使他戴的是史瓦曾堡地区的礼帽和穿的是鹿皮夹克，也没救得了他的命。

我没法脱下黑丧服，因为不久我妈妈又去世了。我在德国的亲爱的妈妈死于癌症。我在施韦齐肯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的她。她的身子已经瘦得像个长不大的干巴小女孩。我的妈妈本来性格顽强而执拗，任何时候都没被任何人难倒过，如今却只有这癌症将她慢慢地缩小得可以放进一口白色的儿童小棺材。我刚刚为妈妈的逝世而哭得死去活来，我公公又不行了，他变得很虚弱，医生给他动了前列腺手术，就是在这座我丈夫称之为时间在这里停滞的小镇子里。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正将我公公从手术室送出来，他身上盖块白床单，嘴里衔着小孩用的那种奶嘴儿，给我公公做手术的那位大夫对我们说，让我们作最坏的打算……

我公公死了。我们到停尸房与他的遗体告别。一名职工放我们进入停尸房，只见我公公躺在一张石桌上，样子俨然像位死去的古罗马元老院成员，他身上的褶袍是用床单裹成的。从腰间转到背后一缠。他的两只手摆在胸前，直到如今我才注意到，我公公的手竟因劳累而变得如此粗硬，他这双手一直到手腕晒得跟他的脖子和脸一般黑，因为我公公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专门脱了衣服晒太阳，所以像奥地利所有文职人员一样，体白如雪，只有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脖子和脸是黑的。他那双手因终年与螺丝刀和钥匙打交道而弄得满是伤痕。他一

辈子都是自己修理摩托车和汽车。普热佳[①] 也去与我公公告别，他弯下身来，吻了我公公的那双手……

我们家的世交、画家帅男子汉鲁什·波赫曼为我公公致的悼辞。这位画家像幻影一样出现在我面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帅的人，也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口才。后来在格莱戈里保龄球场里人们开始谈笑风生，气氛逐渐活跃起来。我们又吃饭又喝酒，到最后都有点儿醉意，越来越开心了。只有我婆婆总也不笑，抽着烟，面色如土，她后来便一直是这个样子。如今我公公弗朗茨因不在了，直到他去世，我婆婆才真正悟到弗朗茨因的确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一直非常爱她。从此，我婆婆就变得沉默寡言，只是躺着，上午就睡觉了。有一只老猫围着她转来转去。她拒绝接受我弟媳妇给她的任何东西，她开始去看望住在维诺乌什小洋楼里的邻居们，甚至还去那里看电视，她还打算把那里的洗衣房改建成一间小厨房和小卧室，说要从她和弗朗茨因共同建起的小楼里搬走，到一处像她小时候当姑娘，后来当年轻媳妇的时候住过的日登尼采·巴尔本卡那样的房子里去住。她对这样的小房子像我丈夫一样有着一种神圣的感觉。后来我婆婆希望我公公弗朗茨因埋在一个坟头上有棵大白桦树的墓地里。我们便将贝宾大伯的骨灰盒和装着我公公遗体的棺材埋在那里。

沃拉吉米尔有时也到利本尼来，如今走动得更勤了，因为

---

① 普热佳，赫拉巴尔的弟弟，即斯拉维克。

他爱上了这里的一位年轻姑娘，名叫维娜。沃拉吉米尔决定娶她，定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克鲁姆洛夫结婚。因为我丈夫曾经当过特卡拉[1] 的证婚人，所以这次也被沃拉吉米尔邀请去当证婚人。可是就在头一天夜里邻居们把我们吵醒，利本尼所有的街道居民都起来了。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的上空都响着飞机的轰隆声。俄国人降落了，随后开来了坦克。我去上班时，看到了俄国兵、波兰兵，布拉格有枪击声，一辆卡车开到了巴尔莫夫卡，上面站着一些年轻人，拿着一面血染的旗子。可是我丈夫想坐车到克鲁姆洛夫去参加婚礼，却被坦克阻住了，他只好回来。他想经过斯特罗斯马耶拉克绕道去，可是那里也停着坦克不让过，我丈夫一再请求放行，说他要去参加一个婚礼，他的朋友要结婚，他是证婚人，必须去。全城的人都惊呆了，我的丈夫于是没去参加这场婚礼。他换了衣服进城去了，遇上马利斯科，两人便一起到瓦什坦因宫去看展览，他们使劲捶门，马利斯科先生也一再喊着："开门吧！把我哭喊着捶打的这扇门开开吧！"门缝里响起了一个声音说："展览会延期开放！"我丈夫和马利斯科先生都捶门喊道："你们这样做要负责任的！开门吧！已经十点了，展览该开门了！"

在我丈夫与马利斯科告别的这个上午，这位诗人，为了纪念他所见到的这一切，回去写他的情诗《献给易北河畔的萍蓬草》去了。我这位哪儿都少不了他的丈夫，据他后来跟我说，在瓦茨拉夫广场那儿遇见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外事部主

① 沃拉吉米尔的前妻。

任，说如今苏联的大炮正对着他们作协的窗口，说这座上了炮弹随时准备发射的大炮正停在舒林卡酒家旁边。这位主任身边还跟着一个疲惫不堪的人，作协外事部主任一见到我丈夫就高兴地说："亲爱的，"她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作家伯尔[1]，他想去看看广播电台。"这位主任眼睛里充满着恐惧，她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有过自己的一段……我丈夫于是上了瓦茨拉夫大街，大街上下尽是一群群愤怒的年轻人在高呼着"杜布切克[2]万岁！"的口号。到处停着满载苏联士兵的军车。伯尔惊讶地望着他们嚷嚷道："我亲爱的博胡米尔，你看，他们那双手！他们那一张张脸！他们那满是泥巴的胶筒靴子！……好像刚从前线下来！"军车停在那里，士兵们微笑着，而拿着旗子的年轻人队伍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地在瓦茨拉夫大街来回走着，从旁边的街道上又走来了一群年轻人，都在高呼："杜布切克万岁！自由万岁！"作家伯尔从一个小纸口袋里倒了些白色药粉到嘴里，他的两只手在发抖，药粉撒在他身上。就像我丈夫说的，样子像个受苦受难的农民。伯尔在圣·瓦茨拉夫铜像那儿转过身来朝下看，年轻人推推搡搡朝他涌来，伯尔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喃喃着："圣母玛利亚呀！"我的丈夫使劲安抚他说："不要紧的！"他们就这样顶着人群一直走到斯大林街口。这儿已经没那么多人了，街上停

---

① 伯尔(Heinrich Böll，1917—)，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写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德国艰苦生活讽刺小说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② 杜布切克(1921—)，斯洛伐克政治家，捷共中央领导中的改革派，1968—1969年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反对以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被开除出捷共。

着好些辆苏联坦克，他们不得不走进一家砸坏了的家具店里。我丈夫对我说，伯尔突然变得机灵起来，小心翼翼地迈过打碎的橱窗玻璃碴和家具。他步子准确，像猫步般轻巧，全身都在警觉地听着……广播大楼的这条街上，也停着苏联坦克，其中一辆坦克上的炮口正对着大楼的窗子。另外两辆着了火，有一辆上面的火势很猛，两名苏联士兵在灭火……伯尔抓着我丈夫的手悄声对他说："我亲爱的博胡米尔，我在战争中度过六年光景……我是在第二线的，不仅攻占了巴黎，而且还到了东方……作为一名士兵，我一直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后来又逐渐往后退……我在科隆被俘了。"我丈夫问他："是在易北河畔？""不，"伯尔说，"莱茵河畔。我就是科隆人。我们继续往前走吧！"伯尔又一步一步地迈着，轻盈而又小心，仿佛在夺取一座城市……就这样，我丈夫和伯尔挤到了那些被年轻人包围起来的坦克跟前。那些人继续在高呼"杜布切克万岁！"可是坦克上面及靠在坦克上的士兵们却毫不在意，很平静，仿佛只是在进行一场军事演习。两名军官也被年轻人包围着。那些年轻人正用俄语在与他们辩论。可是军官们的回答都很简练，且面带微笑。伯尔站在那辆着火的坦克旁边轻声对我丈夫说："这事儿要是发生在二战时的德军面前，那恐怕会立即开枪，就地镇压。"又有一辆坦克被点着了，泼在上面的煤油和汽油燃烧起来……苏联士兵们重又跳到坦克上，用外套和毯子扑打着火焰，拼命灭火，有的还在边扑火边笑着。那边人行道上有一摊血，血泊中有几面国旗……几束鲜花，军官们仍被愤怒的年轻人包围着，年轻人用俄语和军官们对话。军官们面带微笑，与此同时士兵们站在那儿，背靠着坦克，手里握着枪，有的

将枪支随便挂在蹲着的膝盖上。……伯尔点了点头，便又转过身来，慢慢地回到被扫射得稀巴烂的店铺里，走进破碎的橱窗，碎玻璃碴在皮鞋底下吱吱作响……伯尔对我丈夫说："那个二百五海塞[①] 在五十年前曾经写道：'……半个欧洲都走在通向混乱的道路上……带着神圣的热情奔向无底深渊，还一路歌声不断……简直是喝醉了酒在唱赞美诗。'就像迪米特利·卡拉马佐夫……"我丈夫兴奋地说："啊！卡拉马佐夫，这可是我感兴趣的人物。啊！还有梅什金公爵和斯达夫洛金……"伯尔微笑着，抚摸一下我丈夫说："我，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哺育大的，我是契诃夫哺育大的。我怀着满腔热情投入战争，因为我想呆在战争现场！我，亲爱的博胡米尔呀，是作为一名志愿兵参加的呀……如今我站在这里，怀着知过的心情。如今我在这里的心情更坏，比我在被俘的半年中要更坏……"

这个八月的夜晚，我在家里坐着，炉子里生着火。室外很暖和，可我们家里大夏天也得生暖气……此时此刻，我丈夫正领着伯尔在逛布拉格。……我刚从我丈夫那里得知，伯尔的确是位大作家，我丈夫还对我描述，他们如何从瓦茨拉夫大街挤着走过沃吉支卡街，一直挤到雅马街，在那里找了一家饭店，就着烛光喝啤酒。可是伯尔只呷了一小口，便再也没碰啤酒杯，于是我丈夫便帮他喝光了杯中的啤酒，因为伯尔说他的肝

① 海塞(Hesse Herman，1877—1962 年)，德国小说家、诗人，1946 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的《德米安》(1919)小说对纷乱的德国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他一举成名，他最后和最长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使他获诺贝尔奖，是一部再次探索人的两重性的作品。

有毛病，只喝了汽水，还从小纸包里倒些药粉吃，撒得满膝盖都是。“伯尔接着往下讲，但他不是跟我对话，”我丈夫说，“更像是自己在忏悔、在自责。因为他发现希特勒军队打输了第二次大战，这失败便把这些俄国人招进了布拉格，如今第二次进了布拉格……‘有一天，这不会太久，这些军队会一直开到莱茵河那边去……我亲爱的博胡米尔呀，’伯尔说，‘如今我在这里见到了他们，这些苏联士兵。我们在东部战场即使都像最勇敢的兵团一样战斗，照样还是得输，因为希特勒已完全抛弃了谨慎，而在苏联军队身上表现出了这种谨慎，这就能胜利。……我亲爱的博胡米尔啊，昨天我还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客人坐在他们二楼上，而今天却有一门大炮在瞄准它。这就叫历史啊，我亲爱的博胡米尔呀，如今恰恰在这里、在布拉格让我碰上了。我们开始的总体战，苏联人用总体战回敬了我们。如今我才明白，直到如今，在这里才明白……昨天在爱德华[1]那儿巴威尔·科霍乌特[2]对我谈到他与诗人叶夫图申科[3]的谈话，‘你们有多少人？’叶夫图申科问。巴威尔回答说一千四百万……叶夫图申科便对他说：‘那么你们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对，我亲爱的博胡米尔，罗马士兵走到哪里，罗马权力便到达那里。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为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打败了拿破仑而感到自豪与骄傲；如今我明白，所有苏联人包括叶夫图申科都为他们

① 爱德华(Eduavd Goldstücker)，捷克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

② 巴威尔·科霍乌特，捷克作家、诗人、剧作家，现侨居奥地利，为欧洲文学做出贡献，获奥地利国家奖。

③ 叶夫图申科(Jevtušenko Jevgenij，1933—　)，俄罗斯当代作家。

打败了希特勒而感到骄傲。因为，在纽伦堡不仅政府成员 受到审判，连我也受到审判，整个民族都受到审判，就像雅斯贝斯[1] 所说的那样。'在雅马街、在布拉尼茨基·斯利贝克，伯尔都这样难过地轻声讲述着。我们坐在靠烛光照亮的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外面还在响着'杜布切克万岁！'的口号声。突然，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人站起身。当我在只靠一支蜡烛照明的暗黑中对这个人说这是伯尔时，也没能帮上我什么忙。我们于是又来到街上，逆着年轻人的人流和旗子一直挤到伯尔所住的那家旅馆。我们站在阿克罗旅馆的地毯上告别。伯尔重又变得忧郁而严肃，眼睛下面有道黑圈，样子活像一个受苦受难的庄稼人。"我丈夫说完之后，我放声大哭了，因为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一天，在莱特纳广场那儿，他们用枪托驱赶和殴打我们，把我们撵到莱特纳一个地下室电影院里，我和海尼、还有我的父母亲在那里坐了整整一个星期……

幸好我早就报名参加合作建房活动并付了钱。我刚一结婚就报了名。等到一定时候，也能住上楼房，有自家的厕所、暖气，有三间房，虽然小，但它却是我们自己的，还有自己的厨房。特别是厕所和洗澡间，我太想要了。对这我一辈子都念念不忘，因为我在娘家一直有这些。在一栋有十三个房间的洋楼里，我曾跟妈妈、爸爸，跟姐姐胡翠，两个兄弟卡雷尔和海尼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在利本尼，如今每当我回到家，打开宅门，两脚就踩

---

① 雅斯贝斯(Jaspers Karl，1883—1969 年)，20 世纪德国哲学家，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

在水里，每当我打开厨房门、卧室门，从天花板上滴下水来，地毯泡在水里，不管我朝哪儿看，到处都在滴水，因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英达，就是那个娶了个漂亮新娘的小伙子，因为他老喝酒，后来他老婆带着小孩离开了他。他早晨烧茶、沏完茶睡着，却忘了关水龙头，水流了整整一上午。到中午，英达的爸爸来的时候才把总闸关了。可是在这六个小时里一直流着的水已经进到了我们的房间，也就是我丈夫永远不愿意离开的地方。当我告诉他我已报名参加合作建房时，他叫个没完："永远也不搬！永远也不搬！我的房子在利本尼！我留在这里，哪儿也不去！"我打开衣柜，里面全是水。唉，可惜了我的衣服啊！我惟一能做的事是撑开那两把伞，一把蓝色、一把粉红色的，那是我丈夫醉得糊里糊涂时给我买的。我气得蹚起水来，就像夏天在洛西里冒雨在水坑里蹚水一样。我娘家在洛西里有所小别墅，夏天住的，如今成了幼儿园。如今我却蹚在冰冷的、有股石灰臭味的水里。我打开窗户，继续在深到踝骨的水中走着，我在湿透的地毯上走来走去，直到心情平静下来为止。我将东西都收拾到箱子里。我们的猫儿艾当仿佛不仅曾预料到会开来军队占领布拉格，而且还预料到它的这住宅、这个窝、这窗户、它所喜欢的这一切将被水浸湿，这院子里所有热闹的家庭聚会不只是推迟到什么时候，而且是永远永远无指望了。在几天前的深夜里，友军开进这座城市，仿佛将永远驻扎在这里。不仅是我们的猫儿艾当，甚至我们的爸爸也及时逝世了。我爸爸死的时候，面带笑容，仿佛他知道，反正也熬不到军队开来，因为我了解爸爸这个人，他一个劲儿地看表，生怕耽误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生怕漏掉什么和平盛事。

自从俄国人来到布拉格之后，我丈夫，这位哥特瓦尔德国家奖得主，一直在等着会有辆小汽车从公路上拐过来把他带走。他害怕这一时刻。所以他特别喜欢在森林中、在村子里走动，有时搭公共汽车上布拉格。我丈夫喜欢乘公共汽车，根本不爱坐小汽车。要他坐小汽车，简直是受罪，还不知找个什么地方存车，也不能多喝啤酒，他受不了汽车排队等红绿灯，一碰到这种情况他便急得骂娘，眼睛也胀得疼起来。他宁可坐公共汽车，一路都在遐思冥想，要是有人在公共汽车上找他聊天，他可不乐意哩，他只是这么坐着，两手在胸前交叉抱着，仿佛自己就是他心爱的姑娘。他两眼望着原野，单调乏味的田野平原，仿佛老从那里看到点儿什么，仿佛对这原野中的什么表示同意。他对这乏味的平原微笑，还说这田野在对他微笑。他就这样常常乘公共汽车出去，有时，当他突然被一种恐惧之情掠住，特别是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说他和另外几个作家被捆绑起来带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时，他更紧张，老盯着通向我们大门的林阴道看，直到眼睛都看疼了，也没有谁拐到我们这里来过，并没有一辆小汽车来把他带走，他于是便搭公共汽车出去，在公共汽车上他用不着害怕任何人，也根本不在乎车子往哪儿开，开到哪儿都行，只要能坐在这车上。他在车上阅读、吃着抹了黄油的面包，等他坐到终点站，便又搭车往回坐。一回到家便向邻居们打听："有没有什么人来找我？有没有什么小汽车开到我们门口来？"

死去的公猫艾当给我们送来的三只小猫见我老喂它们牛

奶和切碎的肉末，已经不再逃跑了，甚至还要跟我卖弄风情，呆在远处，仿佛我在抚摸它们。它们在地上打滚，或蜷缩成一团，远远地呆在那儿对我微笑。它们倒是很想来跟我亲热亲热，可是总还有些犹豫，让我白费劲地向它们伸那么久的手。小猫们甚至已经闭上眼睛，眼看我的手就要摸着它们了，可是它们的恐惧心还是强过别的一切，突然一下又总是飞跑开去。然后又重来一遍：这些小东西重又远远地呆着、爱慕地瞅着我，对我温柔地喵呜喵呜叫着，仿佛在向我表示歉意，表示今天还达不到我的要求，下次再试试看，它将努力克服自己的胆怯……就这样日复一日，每当我来到这里，和我丈夫吃饱了饭，将通向我们家的道路看了个够时，我便起身将一个干净碟子放到板棚后面，倒了点牛奶进去，小猫听见倒牛奶的声音便走出来，用它们的小粉红舌头大口大口地舔吃起来，弄得牛奶都溅到碟子外边了。我立即放下牛奶罐，腾出手来想去摸摸正在舔奶的小猫，可是没弄成，小猫总是在我的手触到它们之前就跑掉了。我还不死心，一只手往碟子里倒牛奶，一只手悄悄地想去搔搔其中舔得最欢的小猫，可刚一碰到它的皮毛，它便蹦跳逃掉了……我只好放弃触摸它们的念头。我们学会了远距离地互相倾慕，而这个距离总算缩短了。有一次当我坐在一个什么地方阅读时，有个什么东西甚至从我后面碰着了我，根据那影子，我看出是一只正在跟我的围裙角嬉戏的小猫。于是我总是坐到那木墩子上阅读，一个星期之后所有三只小猫都来玩我的围裙角儿。我透过这围裙感觉到，当那三只小猫碰着我，玩得那么专心尽意，像拽到一条小鱼一样地在我身后拽着我的围裙时，我有多开心啊！我感到幸福极了，我丈夫也停止

了劈柴，望着我们会心地笑着，因为他知道，这是我们死去的艾当给我们送来的小猫；他还知道，只等一下雨一下雪，冬天一到，这些小猫就会自己来到我们的前厅，然后进到厨房……

这时期沃拉吉米尔到废纸回收站来看望过我。他还像几年前那样充满着自豪感。我惊奇地发现他如今的妻子使他大有改观，看来他的第二次婚姻相当圆满。可是沃拉吉米尔对我说："博士夫人，您看见大炮在对着捷克斯洛伐克作协吗？我原来以为这些俄国人开进来只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正要在那一天结婚，想把我的婚礼破坏掉，以为这些坦克都是冲着我沃拉吉米尔一个人来的。哪儿的事！他们是对着那些横行霸道的知识界当权者来的！我给他们写过文章，寄过请愿书——我的宣言，他们却在《文学报》上拿我开心，拒绝我的画作！如今可有他们好受的啰，他们都像被捏在手心里的小老鼠。谢天谢地啊！您家博士在哪儿？人家都说，您把他藏在克斯科，说他有个掩蔽所，他害怕阳光，是吗？我真高兴自己活到这一天，如今知识分子往上爬不了啰！这些俄国人就像是我叫来的，就像我搞的爆炸艺术一样把他们搞到了《文学报》。请您转告博士先生，他那些《花蕾》会印出来的，可是也请您转告他，等印出来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会跟他的《家庭作业》同样下场。虽然付印了，也装订好了，可是永远也发行不了。这些我都了如指掌！我并不可惜这三万五千册《花蕾》，我甚至还乐意尝尝这种滋味：他们把这些书送到这废纸回收站来，我的每套七幅的三万五千套插图，那总共就是二十四万五千幅我的插图，也将被捣成纸浆。这难道不妙不可言吗？您知道，亲爱的太太，等到这儿堆上二十四万五千张

沃拉吉米尔的插图，这将是我最美好的一天，说明他们没有理解我、排挤了我，将是我最大的感受。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整个一个横行霸道的文坛统治集团，他们印行《文学报》，每周四万份，却哪儿也见不到关于沃拉吉米尔·博乌德尼克的一个字。……要是博士先生没法给《文学报》写稿，那他咋办？要是他的书出版不了，那他咋办？那门大炮就像反对他们的一个象征正对着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二楼那块标牌哩！您知道吗？我如今有空，将在维奥莱[1]举办作品展览会，让博士先生也试着就我的画展说几句话吧！让他找到勇气为我的版画展致开幕辞吧！”沃拉吉米尔说完，笑了笑，重又那么自豪，俨然像个当了冠军的角色……

我们的废纸回收站如今来了很多书，有尚未发行问世的新书，有勒令从书架上取下来的，有从书店、图书馆清理出来的，有那些自从兄弟部队开来后呆在国外没回国的被除名的作家的，或者属于被清洗作家之列的人的书。我丈夫需要他的工作单位作协的一张在职证明书，可他害怕到那里去，便派我去了。我一走进这座几个月来一直有门大炮瞄准着的大楼，走到暗黑的二层楼上一个房间里，便看到一位还没梳头的老太太。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她还在梳头。等我一走进去，她正拿起一个牙刷，放到一只芥末酱玻璃瓶里，还咯咯响了一下。老太太同我一道走进洗手间，她把厕所里抽水马桶上扯断了的链子指给我看。一听说我不是维修公司派来的修理工，而是来给我丈夫开

① 维奥莱，布拉格一文化活动场所，位于民族大街原作家出版社旁边。那里经常举办展览会、音乐会、文学讲座等文化活动。

在职证明的，便大失所望，并告诉我说她原来就住在这里，从作家们搬出去的时候起，便又将这间小房间还给了她。我于是又走进一间坐着一位年轻太太的房子里，当我对她说明来意，她便冲着一扇敞开的门喊道："我们可以给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开在职证明吗？"办公室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绝对不行！赫拉巴尔不是属于清洗作家之列吗？"我也不饶："那你们就给我开个'属于清洗之列'的证明吧！"那位年轻太太重又停止吸烟，冲着办公室问道："我们可以给国家奖获得者开一个已被清洗的证明吗？"有个年纪较大的身穿带格儿人造纤维服的男人走进来，让我到瓦茨拉夫大街劳动出版社最后一层楼上的清洗委员会去问问看，那里有个一有空就修理钟表的职员，是专给被清洗的作家开证明的。他还补充说了一句："如今该由我们坐轿车啰！"我便说："那就告别啦，告别啦！走您的阳光大道去吧！"我走出来，来到通向乌尔什林基的人行道上。瞄准作协大楼的大炮早已不在这里了，可是对于我和我丈夫它还一直在这里。随后我在瓦茨拉夫大街找到了门牌号码，便乘电梯真的上到最后一层楼，在那里找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一间顶楼小房，让我吃惊不小的是那儿还真有一个男人眼睛上夹着个钟表验测镜坐在桌旁。我对他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为何而来、是谁告诉我到这儿来的。那男人继续用个小螺丝刀从一个袖珍怀表里取小螺丝，然后对我说："没门儿！博胡米尔的确需要一张新的职业身份证，可是如今并不对被清洗的作家发放这样的证明。被清洗的作家如今算不得一门职业……"

我将吸尘器拿到我们公司一位老电器修理工那里去修，是

我丈夫坐了辆小拖斗送去的。那天我给什克沃列茨基的《幼狮》开了收据，几乎运来了满满一车皮。我丈夫走到装满《幸福》的造纸车间去了，如今他来取吸尘器时，带来了几乎百十来册书，书名叫《幸福》，斯特朗斯基[1] 写的……我说："喂，那个斯特朗斯基是谁呀？他的那本《幸福》是个啥玩意儿？"我那宝儿爷来精神了："耶！这是上帝亲自给我送来的呀！哎，我昨天还跟他在一块儿来着。他在卡尔林纳有个油泵。瞧，这可真是巧遇！我对他说，'把你那本《幸福》借给我一下吧，我想拿它与贝茨卡先生的书做个比较，他也是被清洗的。'斯特朗斯基一边给我的汽车加油一边对我说：'哟，朋友，我只有一本《幸福》……而这一本还是从斯洛伐克借来的，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丈夫于是来到废纸回收站，把我们的旧吸尘器搬出来，往拖斗里装了好些《幸福》，把那百十来本小书统统装上去。我们一直开车到卡尔林纳……我那宝儿爷又突然容光焕发："瞧，那斯特朗斯基是贵族家庭出身，住过大庄园，要是像我一样，长得更帅一点就好了！这本《幸福》谈的是犯人营里的事儿，写得真棒，一流之作。不是哭哭啼啼的，他在那里显得很勇敢，就像莫哈[2] 在《冰冷的太阳》里一样，也是描绘的监牢……"可是，请注意：这可是一位招人喜欢的帅爷！我在油泵旁见到了这位斯特朗斯基。顿时我就

---

① 斯特朗斯基，捷克作家、剧作家、翻译家。1953 年以叛国罪判刑监禁 8 年，出狱后干过水泵、油泵工，从 1990 年起任捷克文学基金会外事部主任，1992 年为国际笔会捷克中心主席。

② 莫哈（Mucha Alphonse，1860—1939 年），捷克著名画家，曾在慕尼黑、巴黎学习美术，1894 年末为著名女演员 S・伯恩哈特主演的戏剧《吉斯蒙达》画海报，并作招贴画、月份牌、装饰画，为很多杂志作插图，曾四次赴美，画有一组 20 幅大画《斯拉夫史诗》，1922 年仍回捷克定居。

为我的宝儿爷不会穿戴而感到遗憾。斯特朗斯基站在那儿照看油泵，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富于伯爵风度。在他拉开钱匣子时，我暗自说，我以后只来这里而再也不到别处去加油了……这两位被清洗的作家已在相互友好地挥手，我丈夫已经站在他旁边。一比较，真可怕，我的宝儿爷自从我们住到克斯科以来活脱脱像个老农。如今斯特朗斯基走到小窗口这边来了。我将手伸给了他。我那宝儿爷总是先伸手给每个娘儿们，而斯特朗斯基，因为有教养，知道必须等着我向他伸过手去，他还吻了一下我的手背，向我一鞠躬。只有当年常上我家别墅的军官们才这样吻过我的手……我丈夫打开大阀门，将那笨重的管套接在油泵那儿，往里加汽油的是斯特朗斯基。只见油泵后面那阀门的绿盖掀起，就这样开始灌上了。斯特朗斯基兴奋地来回跑动，跟疯子似的高声叫嚷，又跑到我跟前来嚷嚷一通，大概是感谢我给他送来了书。他又吻了我的手，弄得我手上湿乎乎的。然后又大声喊叫着跑进他的四周装着玻璃窗的小房子里，仰天躺到长沙发上……我那宝儿爷已钻进拖车里，将灌油的套管扔在身后，他闭上眼睛，满心欢喜地微笑着。你要是看见他那副神气相就好啦！当我将那一百本《幸福》倒到斯特朗斯基的车后备箱时……他那高兴劲儿简直吓人。

沃拉吉米尔曾在我上班的时候来看过我。他来向我夸耀说他老娘给他买了一套漂亮衣服，像时装模特一样在我办公室对我表演了一番，他还拽起裤腿给我看他穿的新袜子，在那儿脱下外衣，让我看他的新毛衣，甚至还想解开裤子的前开门，脱下裤子，说他穿了条干净的新内裤。不过这只是一种借

口，只是想平静下来喘口气罢了。然后便直截了当说明来意："年轻的太太，我要办个展览会，这您是知道的，沃拉吉米尔要开画展了！""在哪儿？""在维奥莱。系列版画以及最近创作的一些单幅画。年轻的太太'越禁越多'。您的夫君、博士先生本可以为我主持开幕式的，可是他现在属于哪一拨？属于被清洗的作家之列。为什么呢？因为开来了镇压粗野知识分子的军队，这些暴乱的知识分子不仅发行《文学报》，而且还出版带有粗野精神的书籍。请您转告您的丈夫博士先生，他可以在星期二来看看我的展览。"说完后又像服装模特一样转过身去："会让人大饱眼福的。我的爆破主义[①]已经传遍世界，到处都知道。我在迈阿密[②]举办的展览表明，我比美国人超前两年，比波洛克[③]走得还要远。那里人们是知道的。在法国还有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只是在这里，谁都不知道我，因为在这里当权的是——谁来着？粗暴的《文学报》。所有被清洗的作家都躲藏起来了。现在是一个谁也不管我的自由自在的好时机，谁也没法阻止我介绍我的爆破和振动溅洒艺术，介绍我的既有千万年传统，又犹如刚刚诞生的东西，我将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④]与社会主义的爆破艺术手法结合在一起。展览将在长时间一直瞄准着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二楼的苏联大炮炮筒

① 爆破主义，是一种艺术主张，通过振动将颜色大块地溅洒在画纸（布）上形成的画面。

② 迈阿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城市、港口的游览地，有国际美术学院和数所高等学院。

③ 波洛克（Pollock，1912—1956年），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在画布上滴溅颜料作画著名，对美国绘画影响较大。

④ 阿尔塔米拉洞窟，位于西班牙北部桑德市西，因有优美的史前绘画与雕刻而闻名。

的阴影下举办。”沃拉吉米尔说完离去，办公室的女职员们除了敲打几下打字机之外，一个钟头什么活儿也没干，沃拉吉米尔使他们感到震惊。他的确又成了一位美男子，头发修剪得漂漂亮亮的、额头上还耷拉着一撮栗色的鬈发，头顶的鬈发一直拖到后脑勺下，还有几个卷花微微触着了他的耳朵……

可是沃拉吉米尔想成为更大的世界大师，成为更著名的冠军，连这座对准作家出版社大楼的大炮、连他自己的婚礼，这一切对沃拉吉米尔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因此我们那些女职员都为他而疯狂了。当沃拉吉米尔跑来告诉我说他要在维奥莱举办画展时那气势让她们觉得，只要我在某方面表现出半点怀疑，他恐怕就能把我宰了，她们甚至认为他可能真的希望我对他的展览有所怀疑，然后他便会不容置疑地轻而易举地捅我一刀子，他可能用剃须刀将我轻轻一割，用一根丝编的绳子将我勒死，甚至他不费吹灰之力。在他心中充满如此这般压抑着的激愤……早晨我去上班时，惊讶地拍了一下手掌告诉她们，我丈夫对我说了些什么。他说，沃拉吉米尔在维奥莱办展览那天，甚至让人在《布拉格晚报》上写文章说是我丈夫为他宣布了画展的开幕。可是他既没写信告诉我丈夫这件事，也没让人转告过他这件事。只是胆怯地问我丈夫是不是会去看他的画展。就在展览会开幕的时候，他太太正在巴特罗某个地方跟她的老同学们聚会。沃拉吉米尔将他的作品画页印刷品散发给来参观展览会的客人们，可是有人拒绝接受，说是不感兴趣。有个人问沃拉吉米尔是不是知道聂茨维尔的移画印花法，是不是知道马蒂厄这个名字，他要是知道的话，那他就是

个剽窃者……沃拉吉米尔于是喝得醉醺醺的来到巴特罗他老婆那些兴高采烈的老同学那儿，他们都是高中毕业五年的学生，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其中一个问沃拉吉米尔的妻子说："这位是你爸爸吗？让他坐到我们这儿来吧！"维娜大笑着向他们介绍说是她丈夫，而她的同学们仍把他当做维娜的父亲那样对待，开他的玩笑。沃拉吉米尔使劲用大嗓门压住他们，站在那里将所有他对自己最华丽的评价讲给他们听。说他的爆破主义艺术和他本人都是天字第一号的、世界级的健将。可是他老婆的同学们却笑得前仰后翻发出尖叫声。脸色苍白得发青的沃拉吉米尔很伤心。在巴特罗，沃拉吉米尔是孤军一人来对付这高中毕业已经五年的喝醉了的整个一班人和他老婆。他老婆总把沃拉吉米尔认为千真万确的事儿当做玩笑……沃拉吉米尔独自走回家，在钉在墙上的桩子上拴了根绳子，他以为会有人来，可是谁也没来，沃拉吉米尔上吊了，自杀了。当时他想，走来的人会将他从绳子上解下来，就像在此之前解过五十次那样……

我丈夫在火葬场为沃拉吉米尔致了悼辞。他像在湖上一样大声吼叫，激愤地捏着那页纸，念着短小的句子，仿佛在面对一座森林大声地呼喊："沃拉吉米尔呀，你吧嗒一声亲了一下死亡之马，它便来到了这里！……"就这样，我丈夫的挚友沃拉吉米尔离开了人世。他们两人好得跟一个人一样哩！

我丈夫参加葬礼后回来说："惟一的、真正的世界冠军、大师级的沃拉吉米尔，现在我算是看到了，如今，当他亲吻了他

的死亡之马，我才感受到，最棒的意味着什么，只有沃拉吉米尔配得上！直到如今，当他已经离去，我才明白，不仅他所做的，我指的是他的插图、版画，不仅他所写的，他的那些宣言和他的手稿，这一切只有他……只有他才能……本该如此，任何东西也不能置于他的爆破主义之上，任何哲学、任何精神病学、任何文字，以至任何政治都不比沃拉吉米尔奉为至高无上的苍天更强有力。就该这样！尽管沃拉吉米尔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乔伊斯[1]、贝克特[2]和艾略特[3]，他知道还有达利[4]和毕加索[5]，但他们都在他之下，必须在他之下，因为在他心中有这样一股要成为普通插图版画中的出类拔萃者的力量。所以他才居高临下地看我，所以他才如此地仇恨文学人和所有文学报刊，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而这些文化人，他给他们

---

① 乔伊斯(Joyce Jomes，1882—1941 年)，爱尔兰小说家。代表作为《青年艺术家画像》、《尤利西斯》，以其"意识流"手法使人侧目，主要魅力在于人物描写的深度和幽默的广度。但因有些段落不加标点符号，以致有隐晦之感。

② 贝克特(Beckett Samuel，1906—　)，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是乔伊斯的追随者，代表作为《等待戈多》，他的著作是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所作的重大贡献。

③ 艾略特(Ellot T. S，1888—1965 年)，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20 世纪文学产生极大影响，1948 年获诺贝尔奖。

④ 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 年)，西班牙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20 年代末受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意象著作影响，并受巴黎超现实主义者的影响，使其创作开始用一种自称"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在自己身上诱发幻觉境界。

⑤ 毕加索(Pablo Pícasso，1881—1973 年)，20 世纪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西班牙艺术家。作品数量惊人(两万多件)，风格技巧多样化(油画、素描、雕塑、拼贴、陶瓷及其他)，涉猎众多西方艺术流派，情感强烈，不断创新，给各国艺术家以深远影响。

写了这么多的信、这么多的宣言的文化人，他为了让编辑们相信他，给他们寄了这么多的插图版画，可他们竟然不通情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一封信也没给他回复……所以他才这么幸灾乐祸。他知道得很清楚，这门对准作协的大炮实际上是替他来报仇雪恨的，这门大炮实际上是他，沃拉吉米尔用来指着他敌人的一个指头，因为沃拉吉米尔想更充实更实在地活着。”我丈夫对我说了这么一大通话。

克斯科的雨季来临时，幸福便随着雨天回到我们这里。当全身湿漉漉的小猫们在拼命地喝着牛奶时，不仅让我们抚摸它们，而且还让我们任意把它们抱在手里。我这个没有孩子的人于是挨个挨个地跟小猫亲热着。它们依偎着我，我简直幸福到极点。当三只小猫都蹲在我大腿上打呼噜、小脑袋枕在我手掌上时，我丈夫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微笑着，在我与小猫共处的片刻，忘记了自己的那种恐惧，这是一幅圣洁的画面，圣洁的家庭！特别是当天气凉得逼使小猫们一只挨一只地走进厨房、趴在炉灶边暖和身子，我给它们将食物盘从板棚端进厨房时，那几只小猫便成了我们的小乖乖了。第一只来吃东西的总是那只黑白条纹的公猫仔，它的名字跟以前的那只一样叫艾当。第二只来吃饭的是查西尤斯，是只黑公猫仔。第三只来吃东西的是小母猫玛尼奇卡，它有点儿发育不良，是三只小猫中胆子最小的。这三只小猫该干什么，一切由艾当来决定，其他两只总是等着艾当先干。当我们已经关灯，外面哗啦啦下着雨，第一个敢上床的便是艾当，慢悠悠地躺到我丈夫的脑袋旁边，跟着它跳上床的是查西尤斯，然后才是玛尼奇卡，她像摩拉维亚的一位诗人一样总是睡在我们的脚那块儿。有段时间

我们常到那位诗人家去走动，他不止一次地骄傲地对我们说，他出身在一个铁匠家庭，是最小的一个，他的六个哥姐睡在一张大床上，而他，因为个子小，总是睡在脚头，就跟我们的玛尼奇卡一样。那只领头猫的眼睛跟死去的艾当一样，它总是直盯着我和我丈夫的眼睛，直到我们闭上眼睛为止。当我们从布拉格回到这里来，当小猫们已经不指望还能见到我们，当我们的汽车拐到我们的林阴道上，第一个来欢迎我们的便是艾当，然后是其他两只。第一个进厨房的是艾当，第一个敢于跳到我们的大腿上、钻进我们怀里的也是艾当，然后才是那两只。艾当也是第一个开始舔牛奶、吃饭的，然后停下来回过头瞅瞅我们，仿佛不只是为了谢谢我们，也看看我们的眼色。每只小猫都有自己的地方，艾当总是蹲在我丈夫身旁，玛尼奇卡呆在我身旁，查西尤斯则在炉灶旁有它一把椅子……到了晚上，当我丈夫上酒馆里去了（他每天都得去，我都睡着了他才回来），这段时间我便看杂志、洗餐具、扫地，可是不管我干什么，小猫都跟我一块儿干……这几只小猫好像不怎么会玩，从来没时间玩，只是当我有时给它们用绳子拴一只纸鸽子，让它们来捉，它们才这样玩一会儿，可也只玩一会儿，更确切地说，只是为了让我高兴高兴而已。仿佛是它们陪着我玩，而不是这些小猫在玩，因为它们总有些忧伤，老发愣，生怕我们把它们扔在这里不管，让他们自个儿留在这里……

我丈夫在炉灶后面用砖架了两格板子，成了暖墙根儿的一个隔板架。于是，那两只小公猫都各自有个暖和的地方。这些猫仔从不打架，艾当选了第一块板子，接着就是查西尤斯，

剩下最后一块是玛尼奇卡的。它的性格像卓别林，它不仅让它的两个小兄弟开心，也让我、有时甚至让它自己开心，就像卓别林在电影里那样，个儿那么小，那么动人。小猫们清洗身子也是这个次序，先是自己洗自己，然后互相洗，用舌头，舔得很认真，还眯缝着眼睛。这种互相用舌舔洗真是猫儿们的一种美妙仪式。我可以瞧上一个钟头，看小猫们怎样地彼此爱护着，那小舌头是怎样地在它们的脖子下面舔洗着。……我丈夫从酒馆回来时，差不多总是跟弗朗茨先生一道，他们骑着自行车大喊大叫的，老远就听得出来，他们究竟是从哈英卡这家森林饭店回来呢，还是从小镇酒家或者从赛米克酒家回来。先得站在大门口冲着这雨水和潮湿喊上一通，为林阴道上有多少棵树而争论不休，就像酒鬼那样争吵着……我丈夫走进来时，小猫们有时便在外面等候他。我跟在利本尼一样，睡觉不锁门。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什么人来偷或抢……我的丈夫走进来，踉踉跄跄东倒西歪："小姑娘，你在睡觉吗？弗朗茨要我代他向你问好，酒店老板要我代他向你问好，还有弗朗达·沃列尔让我代他向你问好，还有哈马切克先生让我代他向你问好……"等他躺下来，先是艾当小心蹿到他身边，随后那两只小猫也蹭过来。到半夜的时候，不管哪只猫想出去，我丈夫都会爬起来，跌跌撞撞地为它开门，将猫放出去或者放进来，从来不发一句怨言，不骂一句粗话，因为，正像他常说的，"这是我们的孩子们，既然小嘛，受照顾该是天经地义的，尽管它们分文不值。"我的丈夫、国家功勋称号获得者如是说。

我丈夫又被叫到利本尼人民委员会去了，仍旧是那个老

爱问我丈夫新公民证上该填什么职业的年轻的粗鲁家伙叫去的。我丈夫想仍旧去当废纸打包工，因为被清除的作家这算不得一门职业，就像人民委员会那个年轻家伙所断言的。我丈夫从那里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家有人来访。我丈夫看见外面有一辆带帆布罩的军用车，立刻穿起一件罩衣，又加上一件罩衣，我忍不住对他嚷起来："哟，本事真大，你这头笨牛，你这个国家奖获得者！他们只要一把你关起来，就会把你所有的衣服都脱掉，穿上他们给你的囚衣！"他想跳窗逃跑，可是汽车已经停在门前。我丈夫于是往下穿过地窖往林子里跑，翻过篱笆朝小溪那边跑去，藏在浓密的柳树枝中……我后来只好走到溪边去喊我这位国家奖获得者，告诉他说，是他在奥斯特洛瓦的朋友看他来了。不是别人，而是《红花》的编辑，他到布拉格去，找到了一份开吊车的工作，他来只是想告诉我丈夫，虽然他确被捆绑起来装在一个麻袋里，把他运到一个什么地方，可是三天之后又放了他，说最惨的是呆在那麻袋里，说那辆军车停在一家饭铺门前，他们在那里吃喝了五个小时，而他，这位名叫古比切克的编辑，却被五花大绑地捆着装在那只黑洞洞的口袋里。不过他现在还活着，他边说边笑着，而我丈夫的脸色却越来越发青，他的两只眼睛从窗口盯着那辆军车。古比切克看出他的心思，不禁笑了，并说："不是他们用军车把我送来的。这是我自己的车，已经买了五年啦，是辆旧车，一小时走五十公里，可我们全家都坐着它出去过周末。那好，我走了。我到你这儿来，博胡米尔，只是想让你放心，我还活在世上，只是，博胡米尔，当时呆在那口袋里不怎么好受。我很高兴来这里一趟，好告诉你……让你也为我难受一下，我不像你那么勇敢，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法改变我的性格。”他伸出他的大手，真是男子汉的手，他还有一撮俊美的胡子，一种非常甜美的微笑，即使已经走远了，这微笑也仍然伴随着他。他有点庄稼汉的风范，走路有点摇摇摆摆的，然后发动汽车，一转弯就不见了。我丈夫仍在担惊受怕，不知是不是有人见到这辆车来过我们家，他说：“他本可以从林阴道开车来嘛，免得在公路上被人看见。谁知道呀，这里经常有警察开车在这儿转悠哩！”我对我的国家奖得主说：“傻哥儿，但愿你别吓出尿来！”

我打个电话到利本尼民族委员会，那个折磨我丈夫的年轻办事员不在，休假去了，我谢了一声。第二天我就打发我丈夫到利本尼去，要他带上两本书，因为在那里值班的是个女的。……于是我的宝儿爷下午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的时候便摇晃着公民证，高兴得直笑，就像平常那样一乐就流清鼻涕，即使在那些女办事员面前也用手背去擦鼻涕，还爱说上一句：“我们有的是手绢！”我的脸都羞红了，连忙替我丈夫表示歉意，说那乡下的环境使他成了这德行。可那位波仁卡，那次她一直跟我争论，外国军队开来是好还是坏，波仁卡嚷嚷说这是好事；我却说这不是好事，波仁卡便冲我嚷嚷说：“那你就领着你的博士到德国去吧！”……如今这波仁卡这么说：“甭说了，我了解博士，他在这里，从来没带过手帕，总是用袖子擦鼻涕！”我丈夫连忙上了车说：“是这么回事儿！”按照俄国习惯向大家鞠个躬，腰弯得很低。……这一下他真好像不是一个被清洗的作家，突然，至少在这一片刻，他重又是顶尖人物、世界冠军……他说：“我去到那里，那个女办事员问我有什么事，我说

这里有我的公民证，我的名字叫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什么？’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赫拉巴尔，能看见您，我真高兴！’然后转过身去，找出我的材料，将我的身份证抽出来问道：‘这里面还缺什么？’我说：‘还缺一小项：职业。’这位女办事员坐下来写字，并说：‘可我的上帝！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体面人都知道……您是作家呀！多么好的作家！我读过您所有的书，可我最喜欢的是《私产风波》。’说着便把公民证给了我。”

第一只没有回来的猫是艾当。它长得像我们从前在利本尼喂的那只棒极了的公猫。在克斯科的时候，它被我丈夫为获得哥特瓦尔德国家奖举办的庆祝活动而吓得跑了出去，到第二天早上也没回来，从此再也没回来。……查西尤斯和玛尼奇卡夜里跑出去，喵呜叫着到处寻找它、倾听，寻遍板棚、森林，但它们这位领头再也没有回来，小猫们很悲伤。后来，查西尤斯没有回家，直到三天之后我丈夫才发现它被夹死在邻居装柴火的小板棚里，平常它总是穿过板条钻到里面去的，可是它没注意到，邻居在那里又加了一道板条栏杆，结果便夹在板条间憋死了。我丈夫给它挖了个坑儿，在一棵松树底下，还将仙客来花撒在它的坟上，在坟上放了一大块木头。

春天，穿着战地制服的警察常在克斯科地区转来转去，扭动扭动门把手和木板套窗。每年都如此，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外人进去在里面过夜。我丈夫坐在家里，当这三个穿野外执勤制服的警察出现时，他正透过树枝杈子看着林阴道。还没等他们走到门口，我丈夫已经吓得要死了。他以为，这些警察是来抓

他的，会像对待古比切克编辑一样把他捆起来放进大麻袋里，会像运猪仔一样地把他运到别处去，过几天才会释放他。……可是他们来了之后，只问我们是不是有人来偷或抢。我丈夫一听不是来抓他的，高兴得一个劲儿地招待他们，请他们喝葡萄酒、伏特加，请他们喝咖啡。警察们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丈夫给他们大谈特谈写作中最重要的是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要是不写那些无聊的事，也就不会有这座带工作室的小木舍，更不会有汽车了；然后又给这些穿着野外执勤服的小人物们倒酒煮咖啡。警察们突然看一下手表，吓了一跳说耽搁太久了，他们又问邻近休闲小屋的情况怎么样，我丈夫连忙告诉他们说，自从他同他妻子住在这儿的整个冬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因为小道和各家的篱笆门将各座休假小木舍连在一起，因此我丈夫总是走这些将六块空地连在一起的小道，周末来这儿休假的人也走这些小道，免得去走那些汽车越来越多的公路……大概他不该把这些情况说出来，因为这伙警察的头头立即掏出地图来，说是得把这条小道画上去，说这条小道的出现没有向上报告，说有些破坏分子有可能从这条小道逃跑掉，说他要去巡视一下这条小道，说他要把这条小道画到他的克斯科林区地图上去。要是出点事，要是囚犯跑掉了，士兵逃跑了，让警察们也好知道在这些林间空地之间还有一条隐蔽的小道，它可能会减少跟踪、追捕、捉拿罪犯的可能性……他们告别之后便去察看连接各座小屋的这条小路，后来在小路末端突然传来一声枪响。等到警察们回来时，队长在后门口回过头来说："平安无事，我在那儿只击中了一只变野了的猫。"他从兜里掏出那支左轮手枪。我丈夫说，这肯定得是高手的射

击，用执行公务的短枪第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一只猫，可见指挥官是一名神枪手，射击冠军。当三个穿花斑制服的人走了，进了森林之后，我丈夫在林中小道上、在连接着各座小木舍便门的小道上找到了玛尼奇卡，下午便将它埋葬了……

按照我丈夫所承诺的，他将我带到哈马切克家去参加了一个很亲切的聚会。这是我们常去参加宰猪节的地方，而这次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去吃熏肉的……这可是乐了个够喊了个够。这是在一个星期六。哈马切克先生和我那位国家奖得主老去看那肉熏好没有。我们在聊天，哈马切克的女儿维拉每次从卧室到厨房里去，总要伸手到柜台上的碟子里取块炸猪排，津津有味地吃着，而我们则走去看看我们的丈夫们，他们也总是伸手在柜中的碟子里抓吃的……后来哈马切克先生走进来，我的宝儿爷已经吃得脸上发光、满嘴油腻了。哈马切克先生将第一大碟熏好的肉倒到面板上，还微微冒烟……哈马切克先生作为户主邀我们大家尝尝。哈马切克太太有胆囊病，她连看都不能看一眼这熏肉，用块布捂着脸，转过身去继续喝她的茶、啃她的鸡蛋饼干……面板上摆着一碟辣根菜、苹果以及一小罐芥末酱。哈马切克的外孙们和他的女婿，大家都文文雅雅地在品尝，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更多地吃着面包，惟独我那位国家奖得主又想在吃上大显身手称个冠军……他一边笑着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熏肉，不吃面包。还冲着天花板大声喊叫着："我一生没见过更好吃的东西！耶耶耶，这块肥肉镶边的前腿肉……这儿，这块熏臀尖肉，简直是上苍的馈赠！"哈马切克先生用指头指着盘中的肉问道："来一块猪脖肉怎么

样？要不，这块带眼睛的猪头肉？”

从一大清早我丈夫便开始跑厕所。只见他缩成一团，躺在地上，手按着腰部直叫疼。“你怎么啦？”我嚷嚷道。而他蜷缩着身子，像一把关闭的小折刀，哼哼唧唧说：“我们斯拉夫人爱暴饮暴食……我是个笨蛋、白痴、大傻瓜……”他试着呕吐，坐便盆，可却倒在地上，哎哟叫疼，从四点钟起便从床上爬下来躺在这里，只顾一个劲儿地骂娘，连哈马切克先生也挨他骂了，说他不该将这么多熏肉放到案板上。我则冲着我丈夫嚷嚷说他是个畜生，他不该吃那么多。直到中午我这位世界冠军还在继续躺着，请求上帝把他带走。我笑话他，骂他说这是对他贪吃馋病的惩罚……到中午他的脸色开始变黄。什多尔克副教授在克斯科有座小木房，我骑自行车到她那里。什多尔克副教授来到我家，翻起我丈夫的眼皮，然后说：“黄疸病。明天到我诊所来，今天是星期天，没法再干什么了。”

克斯科的大夫们对我丈夫的病已无能为力。整个下午他们都没法弄明白：是我丈夫的肝里有块大石头把胆汁挤压得流遍全身？还是患了传染性黄疸病？于是我丈夫在那里像哑巴一样一声不吭、惊讶不已，又像被什么卡住了喉咙。他笑了笑，可他的笑容有些勉强，慢慢地他明白过来，他之所以必须来到这诊所，都是长期以来这些宰猪节、熏肉宴、所有他喝过的那些酒引起的后果。正像我婆婆说的，他从孩提时候起便喜欢喝酒，拿到什么喝光什么，客人们喝剩下的一小口酒，没等妈妈送走客人回来，她这宝贝儿子便把酒收集到小罐子里，连

瓶子里剩下的也倒进去，然后偷偷喝掉。主要是他喜欢喝。他参加这次家宴胡吃海喝，五个小时成了这个样子，以致不得不到卡尔拉克这座诊所里来，这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按理说他的命早该报销了，早就该患肝硬化、胃溃疡、心脏病一命呜呼的……当护士给病人送来午饭时，我丈夫也得了一碟土豆泥，像一个老乡、像旧时代的一个叫花子坐在走廊上津津有味地吃着这土豆泥……他抬起那双眼睛看着我，这目光是我熟悉的、知错的、听话的目光。每当他呕吐不止而又像他所说的吐不出那鱼尾巴时，我便站在他旁边忍不住笑，一个妻子的笑，到最后不得不说："自从我们一起生活以来，我不知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再求你，对你嚷嚷、对你发脾气，'你别喝酒，你会因此生病的，别吃那么多，控制着点儿，到斯卡尔那里去看看病，我不想当寡妇！要不然，你趁早死，我好再嫁人，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干脆撑死算了！'我说过的这些话，我的嚷嚷大概都可以录上一公里长的磁带。"我几乎每天都对我丈夫嚷嚷，好说歹说，简直是对牛弹琴。比我对他在这些家宴上酗酒嚷嚷得更多，录成磁带要长十倍的是我内心的嚷嚷，在上班时的内心独白，就像我的那位国家奖得主所说的，有时我好几个钟头都在计算着废纸的公担数，可我内心却在与我丈夫、与我自己进行着长时间的对话，多少次我暗自说，我要离开这酒鬼，可我总会想起他那因为和他在一起而有着同样痛苦的妈妈，只要夜里有人在扎拉比什么地方呕吐了、喊叫了，第二天一早便总有邻居跑到我婆婆这里来告她儿子的状，甚至几年之后，当他已经离开了他昵称为时间停滞了的小镇而来到利本尼这永恒的堤坝时，人家还在抱怨。……如今他坐在椅子上，整个脸色

都是蜡黄的，坐在这里发愣，就怕自己要进传染病房，在那里与世隔绝呆上六个星期不许串门……后来，来了位年轻医生，已经是第十次吩咐我丈夫仰躺着，那位年轻医生用他所有的指头在我丈夫的肚皮上按着弹着，随后这些指头像插进面团一样按着他的肚皮……他欢叫起来："一颗大如带刺的栗子的石头，像一颗熟了的核桃！"他大声喊道。副教授和护理女医生走来。年轻医生将他一直抓着的那一块让他们摸，他们于是不停地按摸着。什多克大夫大声嚷道："嚯，了不得！这是胆结石！头一号的，大得好像我抓住了一串钥匙……"那位年轻医生继续在走廊上走着。什多克大夫却对我说："您先回家。让他在这儿住三个星期，咱们等他的颜色稍微有点儿变化再说……护士，去拿套病号服来！外衣！那四十号病床已经空出来了，原来那个病人昨天已经死了……也是肝有病。"

随后我便动身往家走。我不知该怎么办，我流泪了，不是为了我那位国家奖得主，而是为我自己。为的是我将一个人过日子，大概会这样了。"有个酒鬼丈夫总比一个人过好呀！有个孩子，哪怕他淘气，也总比没有孩子好呀！"在我穿过诊所的院子时，我曾这样暗自怜惜自己。等我走到走廊里挂着一座大钟的地方，看见那儿斜放着一辆手推车，就摆在大钟底下，车上那漆布蒙着的下面肯定躺着一具死尸，谁也不从他旁边经过。我却不知为什么偏要摸一摸。没错，这是一个冰凉的脑袋。我还像马利斯科先生讲过的那样，当他父亲躺在棺材里，马利斯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指头去敲了敲他父亲的头盖骨。如今我也鬼使神差不知为什么去敲了一下这死人的头盖

骨，盖在漆布下面的那头盖骨。这辆斜放着的手推车上方的大钟正指着四点半。从上面照射着霓虹灯……我突然想到，这里躺着的，正是曾经死在我丈夫一会儿就将躺上去的那张床上的人……

此后，我每天都要去一趟卡尔拉克，我总是穿上我丈夫喜欢的那些最漂亮的衣服，总是穿上那双红高跟鞋，总是拿一把阳伞，一天拿红的、一天拿蓝的，我还买了一把绿伞，像情人约会似的到医院里去看望我这位国家奖得主。在我第一次去探望他时便吃了一惊，只见我丈夫仰躺着，摊着两只手，皮管针头通到血管里，全天打着点滴。仿佛这是一部虹牌褪色器，它得把我丈夫从黄色变成人皮肤的正常颜色。这房间的窗子高得像伯爵家的马厩……有几棵老树一直长得跟三层楼一般高，树枝上有几个鸟窝，斑鸠坐在窝里孵小鸟。我丈夫仰面躺着打的点滴，像烧酒一样的蒸馏水……我丈夫微笑着，好像很喜欢这里。这儿，我一进来就看到一个长得像库珀的高个子奄奄一息快要死去……窗子下面的病床上坐着一个人，闻了闻那盘茨冈烤肉片，像是有点信不过，仿佛要把那份饭菜扔掉，后来还是很不情愿地把它吃了。这里还住着一个大胖子、肝病。他翻来覆去地老说，等他病好了，他就要领大家到斯米霍夫啤酒厂去，他是那里酿酒师傅的副手，说要跟朋友们去喝掉一大桶啤酒……那里还躺着一个心肌梗塞病人，一直像人们在栽培花草时找到他躺倒在地上的样子，已经躺了好几天不吃饭，因为他有些不好意思……我原以为我丈夫会发蔫呢，可他立即适应了，因为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比他情况更坏些。

……于是他在这里躺了三个星期，我每天都来探望他，每次都穿着那双红高跟鞋，坐在我丈夫床旁的椅子上，将儿童吃的鸡蛋饼干递给他，用温开水泡软缓缓吃下，吊针还一直打着，仿佛滴进他血管里的是冲淡的烈性酒。……在我走出这病房时，那些病友们多少次地对我说，等我丈夫出院时，他们会不好受的，因为谁还能给他们讲故事到晚上十点呢！我安慰他们说，他不会那么快出院的，因为在他的胆囊里有一块大如一串钥匙的石头……我丈夫于是每天往体内注射好儿瓶点滴、已喝掉好儿百公升热茶、吃掉了好几背筐水果、好几桶儿童鸡蛋饼干，可那黄颜色总也不肯褪去，连一点儿褪色的影子都看不出来……有一次我去到他那里，那位长得像库珀的也有人来探望他，我见到了他的儿子和女儿。我好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么健美的年轻人了，皮肤肌肉健壮得发亮，他们来探望父亲，还给他带来了宰猪节上的肉食，将肝香肠和猪血肠放在他床边，桌上还摆着一桶汤。……然后他们站在床头，跟他们骨瘦如柴的父亲轻声说话，给他看香肠、血肠，可他摇摇头……孩子们微笑着，他们是玩单杠的杂技演员，跟他们将要死去的父亲从前的那样……

我丈夫在这里躺了三个星期，必须在这里接受胆囊手术，因为里面有个大如核桃的石头。正当我丈夫躺在附属医院的时候，而我不得不陪着罗泰和巴维尔，两位坐轮椅的人去过星期六星期天，坐着罗泰的“奔驰”车到哈拉宾尼去。让我帮他们把这两辆轮椅搬上汽车，然后再搬出来，让我当两天他们功能

锻炼的护士。单是让他们这两位朋友坐到前座上就是一项很大的冒险。罗泰先生坐轮椅来到“奔驰”这儿，打开车门，然后用他粗壮的胳膊扶着汽车顶篷，他的轮椅紧挨着汽车座位，如今他集中全部精力，寻找适当的瞬间。时刻一到，他便抬起他壮实的下半身，像美人鱼似的往汽车里一甩，弄得满身大汗，可他还露着笑容。在汽车上已经有他准备好的提包，他掏出一根香烟，惬意地点燃它……我将他的轮椅折叠起来，我一切都得遵照罗泰的吩咐去做：先将刚不久还摆着他那不听使唤的脚的镍制踏板连同支架取出来，折好垫子，再将带耳袢的皮座垫取出来折好，轮子并在一块儿……我注意到，罗泰在挪到汽车上之前，便已将手上的支架取掉，放在身旁前门兜里。……这时巴维尔正同他母亲将所有大箱小箱礼品盒塞进后备箱。他还坐在轮椅上检查了一遍，看是不是带了工具和备用油桶……后来，他也打开汽车门，轮椅紧挨着汽车座位，在汽车里找到了一个结实的支撑物，另一只手抓住“奔驰”的车顶，憋足了劲，将自己不听使唤的腿和盆骨甩进到汽车的座位上。我又将他的轻便轮椅折叠好，将两部小车都塞到了“奔驰”车里靠后的地方，可是安置得不尽人意，不得不让他们出主意。罗泰转过身来帮我一下，然后播放了由囚犯乐团演奏的《纳布科》歌剧中的一段音乐。巴维尔与他母亲告别之后，“奔驰”车便静悄悄地开动了。我简直像在梦里一样观察着：所有用脚操纵的一切动作，他全都用手代替。巴维尔容光焕发地开着车，罗泰在吸烟，两个爷们儿都面带笑容，两人都穿着上面印有“宏大”标记的颜色欢快的针织衫，巴维尔还戴着顶比赛场上运动员的帽子，前面有个大帽檐。他一路上开着玩笑，在罗泰

不留神的时候用手指按到他脸上，指尖还转动一下，罗泰低下头来，笑得直不起腰来，连声对巴维尔嚷道："别闹了！"

罗泰换了盘磁带，是伊希·马拉赛克忧伤的钢琴曲，几个指头只是在键盘上无精打采地挪动着……《哈乐根的数百万》……唉，我的宝儿爷上星期在医院里曾经对我讲过，那个曾经许诺说等他病好之后要带大家去喝啤酒的酿酒师病情恶化，结果挨了一针。快到半夜的时候，这间 204 号病房的门突然开了，他从床上爬下来揉揉眼睛，站在那里望着敞开的门嚷道："这么说你已经来抓我啦！"他抓起两只玻璃野鸡，磕磕碰碰的，实际上是抓着破碎了的野鸡脖子，慢慢地朝门口移动，手臂摊开喊道："来呀！来抓我呀！我不会向你屈服的！"我丈夫和其他人都从床上坐起来，望着那位酿酒师，在门口，我丈夫已经看到了那死神……可是酿酒师还在喊："尽管来抓我呀！咱来比个高低！来呀，你害怕了？"后来，酿酒师在门口转过身对所有吓坏了的病友说："他走了。"将手里的玻璃野鸡碎片一扔，得意扬扬地笑着……然后倒了下去……等大夫一来到，发现酿酒师已经死了。"这是个很风趣的人。"我丈夫说。伊希·马拉赛克用钢琴演奏的《哈乐根的数百万》在继续播送着……

我们驶过了哈拉德茨，然后又翻山越岭，接着朝山下开。巴维尔老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笑着闹着，还低声讨论着明年该去哪儿休假。我一边听一边想着我的丈夫，他正呆在卡尔拉克的医院里观察他的肝……巴维尔突然笑着回忆说："我参加比

赛时，刚开始心情平和，对人很和气，甚至比好人还要好人，可是一拿到号码，那就没有好气了。一有了号码，本来跟我不错的人便都成了我的死敌，他们也跟我敌对起来。我们互相喊叫，骂娘，谁要是驶到我前面，那就成了我的头号敌手。因为我只要一有了号码，便翻脸不认人，便认定自己是世界冠军……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参加马克达奖杯竞赛，他驶到了我的前头，我追上他，于是我们并排行驶，两人都佩戴着比赛号码，谁也不肯让对方驶到自己前面去，就这样脚蹬挨着脚蹬，就像我们塞在车后面的轻便轮椅一样地紧挨着，突然啪地一声，我朋友的车翻了，人摔得老远，翻滚了几下，扬起一片尘土……我继续往前开，他仰天躺在那儿，摩托车躺在一个灌木丛里。我暗自说，等到下一圈他大概该坐起来了，可是下一圈他仍旧躺在那里；再一圈他还躺在那里……小旗舞动着宣布比赛结束，我得了第二名。我本该为得到第二名而兴高采烈的，可是我的眼里却只浮现着我朋友躺在那里的情景。我几乎是把他从我身边踢开的。他翻车了，因为他也踢过我，想让我翻车……我骑着摩托车去到他那里。我扶着车把，推着车子一直走到我朋友跟前。我摇晃他，冲着他的耳朵大声喊他，我为他而感到非常不幸。可我那位朋友睁开了眼睛。我说：'你这头阉牛，原来你没死啊？'他坐起来，我又问：'你没摔断哪儿？你这鬼东西！'我说，'我骑着跑这几圈时，老在担心你晕过去哩！'他却笑了笑说：'你知道，你这笨牛，摩托车毁了，每昏迷一分钟——就是一百块[①] 呀！'"巴维尔高兴地边讲述边驾驶着"奔驰"车，

① 指保险金。

“奔驰”车则在倾听着他的叙述。巴维尔一直没刹车，一路顺风地在公路上行驶着，跟拉小提琴一样地开向他要去的地方。

巴维尔高兴得容光焕发，因为他在驾驶“奔驰”车，而这“奔驰”正如他所说的，又让他忘记被捆绑着关在笼子里的十八年……可是，我的宝儿爷如今却躺在卡尔拉克医院里，很快要动手术，然后回家。……他还会是原来的老样子。可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可能正在那里写遗书，每天一修改。有关没有了他这世界将会怎么样的想像折磨着他，使他渐渐死去。

巴维尔微笑着说：“我们曾开着摩托到斯莱比去庆祝我们的胜利。等我们开进 130 公路拐弯处时，我立即意识到，我的车子开过了劲儿，它翻倒了。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应该把它抛得远远的，这一点最重要。可你在路上行驶，朋友，你和摩托的速度都像在飞，它跑到我前面，然后停下来像在等着我，然后在我身后咔嚓一声撞到我腰上……然后我便进医院，然后就只有听主任医师摆布了。我父亲弯下身来对我说：‘你还能走的，你还能走的。’可我却躺下了。朋友们带着鲜花来看我，说：‘一年之内你便能走了。’后来主任医师又来安慰我说，我将来能走路的，但我先得到卡拉德鲁皮[1] 去……”

我的宝儿爷常常对我说：“要是我能挨家挨户地去泡小酒馆该有多好啊！……唉！我的忧伤、我的痛苦、我的不愿再活下去的念头……可当我一想起巴维尔和罗泰，也就知足

① 卡拉德鲁皮，在捷克西部地区，那里有著名的功能恢复研究所。

了……这些关在笼子里的小伙子，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并不是说他们曾经愁眉苦脸的，只是我没见到过罢了，我是说他们早已克服了使其感到痛苦的一切……仅仅是为生活的艺术而耕耘……必须善于乐意活下去……而我，我却懦弱胆小，唉，而且胆小得厉害……”

巴维尔给一辆卡车让了道，等他有了空间、开车顺当的时候，又用手指头在忙着换音乐磁带的罗泰脸上转动一下。“巴维尔！”罗泰发火了，“别这样！我怕痒！”巴维尔微笑着继续往下讲：“在卡拉德鲁皮，我环视一下我的病房，便看出我的情况不妙，床上躺着的全是些残疾病号，跟我一样……护士让我在她朝我弯腰时搂住她的脖子，随即把我抱到轮椅上，说她将教我学会坐轮椅，那会儿我问：‘什么时候教我走路？’她垂下目光对我说：‘我们先教您坐轮椅吧。’我说：‘主任医师对我说过，你们在这里将教我走路！’护士说：‘这段期间您的腹部肌肉衰弱了……以后看吧。明天我们将教您游泳。您会看到游泳对每个病人都是很好的。’于是我学着坐轮椅，为了我不摔下来，护士给我在靠背、扶手上拴根带子，然后让我用手使劲推压轮子，让轮子慢慢转动……你别听得那么紧张，罗泰！于是我第一次地自己坐轮椅走了。我还会让它往回走，甚至还能让它翘起来。我喜欢坐着它走，我用手掌往轮胎上使劲一拍，感到弹簧反弹我的手指，我又往回坐，教我坐轮椅的护士在门口等着我。我开动着轮椅，当我想在她面前刹车时，轮椅因重心太靠前，把我摇晃得够呛。护士忙把我抓住，于是我和她摔成一团了……艾丽什卡太太，曾经是多么美好啊！我连做梦都

是用脚行走，即使现在，我已经断了脊椎骨十五年，可我在梦里见到的自己总是用脚走路，从来没有梦见过自己作为一个伤残人坐着轮椅。……可是在我垮下来之前，我还游了泳……护士把我从轮椅上抱下来，弯下身，将我放到游泳池里。这可真美！我喜欢游泳，您知道，我是在水边长大的。从小时起我就爱游泳，现在我也爱游泳。可是那一次，当护士将我放到水里，我第一次地感到，我大概完蛋了。我身后伸直着两条腿，还有我的骨盆，我直到在水里才感觉到，我从乳头往下便是个残疾人。我游着，两眼望着上面，水蒸气一滴滴往我身上掉，从游泳池顶棚往下掉，我的眼泪也掉下来，因为我后面拖着的躯体是完全麻木的……”

我的宝儿爷正走过卡尔拉克医院的走廊，到了外科，准备给他动手术。先是体检，他什么痛苦也没有，还可以看电视。可是他已惊恐万状，我的这位国家奖得主已经被恐惧压瘫了。……他大概已经忘了，每当最困难的时候，他只要一想起罗泰和巴维尔怎样被捆绑着关在笼子里那么多年却毫无怨言时就能镇定一些，可我丈夫在卡尔拉克医院可能已经把他们忘掉了，忘掉了……

“可是，巴维尔，”罗泰喊道，“我们还是在卡拉德鲁皮才第一次见面哩！那儿还有一个叫秘比的，我因脊椎骨断了躺在那里，秘比是因为交通事故而撞坏了脊椎骨的，所以也躺在那里，于是我们便坐轮椅，还游泳，我们还坐着轮椅去下面的小酒馆，我们一直等待着康复，因为谁也没有对我们说过我们的

情况如何，我们一直抱着希望……这时有位从布拉格来的女士常来教我们大家用钩针编织……后来，有一天，让巴维尔学习用编织机来干活。这么一架放在膝上的小手风琴一样的东西，上面有些彩色线，就在这时主任医师走进来，问我们这新的工作干得怎么样，喜不喜欢。巴维尔说：‘我们什么时候能走路呀？’主任医师说，‘这里已有从美国和俄罗斯来的信息，说是已经能够将断了的神经接起来。’巴维尔把编织机一扔，大声嚷道：‘对我采取点什么措施吧！难道我将一辈子织地毯？’后来主任医师将我们请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都很恼怒，互相叽里咕噜说着话，我们以为他一定会对我们说，何时开始连接神经。小伙子们都夸巴维尔的问题提得好，如今他们会直接对我们说……随后，门开了，主任医师走进来，仿佛他通宵没睡、无精打采的，眼睛望着地板，然后低声说：‘朋友们，我只能告诉你们……你们都很健康，只是永远也不能走路了……’”

接着，我们驶过奥巴瓦河附近，“奔驰”车后来便转到了县公路，不久我们便停在一座现代小城镇哈拉宾尼的一个庭院里。……我们先把轮椅重新装好摆好。巴维尔和罗泰突然被好几十个坐轮椅的人围住。所有他们的朋友都前来欢迎他们，大家肯定也都盼望着巴维尔和罗泰来到这里的这一时刻。

我像做梦一样在这所小镇上活动着。随便我朝哪个方向看，到处见到的是脊椎残疾人坐在轮椅上来来往往。在体育馆里，我惊奇地看到一个脊椎残疾人，从前的健美运动员，就像巴维尔所说的那样，那人曾为最美的体形去领过奖杯。出车祸后，他的脊椎骨便彻底毁坏了，可他在这个研究所里，跟什么

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在练习举重。他仰躺着，他们给他往杠子上放轮圈以增添重量。他举起了一百五十公斤，正准备参加世界冠军赛，他一心只想着获胜。巴维尔说，他每天从一大清早便坐着轮椅到处转，吃饭、喝酒，以便有个好竞技状况。体育馆里有位篮球教练、年轻的脊椎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跟杂技团演员一样灵巧地活动，他们还能在快速行驶中突然刹住车。他们有时让轮椅朝前往上仰着投篮；他们有时相撞，从轮椅上摔出来，但在摔跌时还在投篮。护士们将他们抱回到轮椅上，他们热情不减地继续玩球……

巴维尔得到了参加功能测试比赛的号码。他参加了六十米轮椅行驶比赛。我看到，他一拿到参赛号码，整个人变了个样，枪声一响，巴维尔便使尽全力，他的轮椅几乎在跳跃前进，其他参赛者也用手掌狠狠地推压轮子驱赶着，朝着目的地前进。我看到一位年轻的脊椎残疾人超过了巴维尔，巴维尔的脸部表情立即变得凶狠，他是第二个到达终点的。可是他身后有两张轮椅的轮子绊住了，有一辆轮椅的一个轮子飞了出去，轮椅倒了……

被朋友围着的罗泰立即同他们一起坐着轮椅去了酒吧。我想帮助他，可他自己从轮椅上移到酒吧凳子上，喝开了啤酒。朋友们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话，因为他原本来自西德，在那里已经住了十年，去那里找他那移迁了的妈妈。这位因为成了脊椎残疾人而被妻子抛弃的罗泰，后来想到他虽然有着捷克斯洛伐克国籍，但他是德意志民族，正因为他是德意志民族，

他也可以搬到巴伐利亚、搬到马克泰登费尔德去住。他做对了，如今他有了“奔驰”车，给他在哈拉宾尼的每一个朋友都带来一件小礼物，每一年还给这里的脊椎残疾人送来一张轮椅……实际上我再没见过比这两位更快活更勇敢的人了。他们请我陪他们来，本该由我丈夫陪他们。只是他又该一路上净给他们讲他碰到些什么不幸的事了。最大的不幸是，说他下个星期要去做胆囊手术……

接着举行了六十米决赛，参赛号码将参赛者激励得愈发厉害。巴维尔又得了个第二名。护士们随后颁发月桂花环。颁奖时，那位冠军得了一瓶阿尔卑斯山酒，我看见巴维尔祝贺他时的笑容不自然得像一匹要咬人的马。……这时外面在进行掷铁饼和推铅球比赛，还有在研究所和小镇的碎石路上的长途行驶比赛。每位参赛者胸前都佩戴着号码。惟独罗泰同他的朋友们坐在酒吧，既不跟人争论问题，也不回答谁的问题，只是在独白，没完没了地讲述他所想要讲的一切：关于超级市场，关于他的小屋，关于他在莫尔纳小住的情况，他每半年要去那里的医院检查一次身体。只有罗泰和他朋友们不佩戴任何数字号码，他们互相听着、笑着，而所有其他人都佩戴着号码，继续固执地争辩着，尽管比赛早已结束……

在饭店里，罗泰继续他那滔滔不绝的独白，大家都听着他讲，然后他将带来的新的艺术挂历分送给大家。我也得到这样一本挂历。罗泰请我不必多管他，说他在这里跟朋友们在一起，吃晚饭几乎没多少胃口，因为有喝的，就不必要多吃饭

了。……我一页页翻阅挂历，每月有一幅彩色画，都是脊椎残疾的艺术家们画的。他们不仅脊椎坏了，有的甚至没有了手，从挂历画旁的作者照片便可看出。而这些画幅简直是美丽风光与静物的一次展示。哪儿也没有丝毫悲伤的痕迹，到处都是来自所见到的田野、鲜花、水果、山坡小城镇和海洋、牧放着羊群的牧人、捕鱼归来的渔夫等等的欢乐情景。而这些画幅是由脊椎残疾人也许是用嘴咬住画笔，或者用脚趾夹着画笔画出来的。脊椎残疾人热情洋溢，因为他们能绘画，能通过自己的颜色与造型说出些什么。……

我环顾了一下这小酒吧，罗泰的朋友们都在听他讲述，大家强装着微笑，因为他们必须这样……此时此刻，我的丈夫正在卡尔拉克医院的走廊上走动着，晚上跟他的读者们、为那些在医院里情况比他更坏些的病友们举行讲座。讲他如何了不起，是世界一流人物……可是我的宝儿爷之所以整个晚上讲个没完，只是为了别去想他在手术过程中可能死去，或手术之后跟他死于癌症的父亲及波普舅舅一样受罪……而我如今坐在哈拉宾尼的一家小酒吧里，我四下里张望一下，发现好些桌旁坐着一些穿着讲究的女士，她们都打扮得像上剧院、像过生日、像庆祝一个什么节日似的。可是裤子下面却是两条萎缩的腿，像美人鱼的鳍一样耷拉在椅子上。我想去一趟厕所，可我担心从这些姑娘和女士身边走过，无意中会因为她们被束缚在轮椅上不能用脚走路而伤害她们。她们都画了眼影，有的还粘了假睫毛，眼睛睁大得仿佛嗑着两颗黑咖啡豆……她们一个劲儿地抽烟，坐在桌旁呷着咖啡和维尔木特酒，轮椅的镍制

部件在香烟的蓝雾和影子中闪烁着光亮，因为太阳已经是从林子后面投来的光。所有这些年轻女人都有着一双柔软而瘫痪的脚，坐在那里像一条条美人鱼。就在我用眼角瞟了她们一眼这刹那间，只见她们中的一位在烟灰缸里掐灭烟蒂；另一位拿着打火机点燃香烟；第三位在寻找烟盒里软一些的一支烟；第四位狠狠地吸了一大口，吸得烟头的火光一亮；第五位姑娘吞下了烟雾，还用一只手画了个高音符号……她们都有一对张得不自然的眼睛，边抽烟边望着远处什么地方……

巴维尔邀请我说，既然我已到了这里，让我们一道到一座预制板盖的楼房去看望他的一位朋友……于是我们到了一个能开进去汽车，又有电梯的地下室。我们进了电梯，来到八层楼上，我帮着巴维尔出了电梯……我说："你知道，希夏尔[①] 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过什么？他第一次带着他妈妈从乡下霍莫吉茨到布拉格来。他们在维斯特罗姆特赫的楼房也有电梯，等他们到了最后一层楼时，他妈妈希夏尔太太说：'贝比切克，为什么我们在进到住房之前先要到这间小不点空房里来呆一下？'""有意思！"巴维尔说。于是我们便到了走廊上。所有房间的门都敞开着，床铺得整整齐齐，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许大家都去参加脊椎残疾人运动会去了，或者出去买东西，或者呆在哪个公共场所吧……在有间敞着门的房间里，我看到一个年轻男子坐在沙发上，他旁边摆着一张空轮椅，这个年轻

① 希夏尔（捷克诗人）的全名为约瑟夫·希夏尔，贝比切克为约瑟夫变来的昵称。

男子有一双疲倦的发烧病人的眼睛。“你好!”巴维尔跟他打招呼。那个年轻人嘴巴没怎么动,只喃喃一句什么。巴维尔继续沿着走廊走,从不知什么地方来了几位坐轮椅的残疾人,镍扶手和轮椅喇叭闪闪发光,走到阳光底下就更加闪亮了……巴维尔悄声对我说:“最难熬的是第一年,也就是在他们平静下来,认识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他的命运之前……我是在两年之后才平静下来的。跟每个这种人一样,我也曾经想过不如死了更好……可是如今我突然想到,我的那位朋友大概在饭店里,他特别喜欢喝啤酒,等他六杯下肚,便会忘记一切,便觉得自己是世界冠军,就像您丈夫常说的,是运动场上的第一名了……您不是也看到了吗?为了能自个儿上厕所,我们先得熬过什么样的训练和多么艰难的处境啊!对了,您用不着为我们小便的事儿操心,您知道,我们有这么个器皿让我们方便,可以通过一根皮管子尿到一个固定在卧式盆上的塑料袋里,盆上有个开关,即使要六个小时之后才打开开关放一次尿……这也没什么。就像我已说过的,头两年我们学坐轮椅,在我们学会之前,唉,摔过多少跤啊!……轮椅总在行驶着,自动行驶着。即使脊椎残疾人停下来不操作了,轮椅照样行驶。您甚至觉得,您一停下来,轮椅就像在责备您似的走到前面……而在饭店里,您注意看一下,便会觉得,您是在一个很普通城市里的什么地方……可是只要脊椎残疾人想上厕所,您会立即看到轮椅,还有轮椅上坐着的那幸福的人,他们只是脊椎坏了;然后您还会看见不太幸福的人,他还断了一条腿;没有指头,只有一个手掌板;更有的除了脊椎坏了之外还缺两条腿,甚至没有手。而且有的人颈脊椎就坏了,不得不像电影

《大幻觉》中的施特罗海姆① 一样戴着个颈圈……”巴维尔突然笑开了，轮椅停在电梯门前。我按一下按钮，弯身扶着他的轮椅。在电梯开到之前、进了电梯之后，巴维尔还对我说：“去年我在罗泰那儿，我们也到韦特海姆② 去探望过一位朋友，他也跟我们一样是个残疾人……可是他因风衣不慎卷到美国的坦克下，不仅脊椎被毁，所有神经都受到伤害，惟一留下的是，他的妻子没有抛弃他。他用他的下巴驾驶他的电动轮椅，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全靠下巴操纵。当我们和罗泰一起回家时，我们齐声喊道：‘我们是国王！了不起的国王啊！’”

我丈夫躺在卡尔拉克医院里。他若愿意，可到走廊上走走；他若愿意，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抽烟；他若愿意，可以慢慢往下走到耶登诺达那家小铺去。那个地方原来是精神病研究所……他若愿意，可以看电视，可以到院子里去，一直到一堵墙那儿，过了墙便是一座修道院的花园和一座特别漂亮的巴罗克式教堂……过街便是艾玛乌西修道院。他若愿意，可以走到那边去上厕所……可是我丈夫却瘫倒在卡尔拉克，害怕自己患的是癌症，就像他爷爷和叔叔死去的那种病。胆怯得只好给他把心理医生叫来安慰他，给我这位如此乐意给比他在这方面状况差的人出主意的丈夫以信心。……

巴维尔说：“艾丽什卡太太，请您给我把门打开，我们装做

---

① 施特罗海姆(Stroheim Erich，1885—1957 年)，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兼演员。

② 原西德一城市。

去采购。”早已过了六点，自动商店里挤满了镍制轮椅。这座城市的设计就是让轮椅能各处畅通无阻。在这里，也跟在布拉格一样，收款处前面排着轮椅队。在这里我可真是大开眼界！当我看到这情景时，巴维尔直对我微笑、点头。脊椎残疾人在这里很高兴自己能这样买东西。我看到他们慢慢地挑选，寻找他们想要的牌子，甚至这个问那一个是不是买得合适，该不该向他们的朋友们推荐。我看到这种采购简直就像我们孩提时期玩“买东西”那样。实际上他们通过这种采购在愉快地消磨时间。我在这里开始明白，时间在这里完全是一种不同于我的、不同于我丈夫的另一概念的时间。因为在这里，大家都失去了能够徒步行走、能够想去哪儿去哪儿的普通人所拥有的幸福，所以他们才这样慢慢地、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地买着东西，因为这么一来他们便忘记了自己不能走路，即使走和跑，也只是像巴维尔那样，在梦里才有的事。巴维尔用下巴向我示意两次，我于是注意到一位年轻女子。她先是买了面包，然后，等她付了钱，便又排进轮椅队里，耐心地等着，轮到她时，便又买了火柴，然后提着装火柴的铁丝筐去付了钱，将火柴放到自己的篮子里，接着又去排队了……“您懂吗？”巴维尔问我。我懂了，然而我怎么也不善于和不能进一步设想：如果我也只能坐着轮椅行动，我大概会怎么样？……

巴维尔大概因为知道我丈夫在卡尔拉克医院不得不找心理医生，他只能躺着，大概跟那些脊椎残疾人在头几个星期那样，而且将永远这样。我认为仅仅因为这个，他才将我带到这个康复中心的劳动车间来……那位练健美运动的男子从森林

中快速行驶到这个车间的大门前，他曾经开着车去领取健美奖，结果出了车祸，落得如今要坐轮椅的下场。这位健美运动员从山坡上的小道坐着轮椅飞速行驶而来，轮胎下沙子飞溅，他用力推压着他的轮子，一直奔到我们跟前，熟练地刹住车，抬起车轮，后仰着，他汗流满面，是位美男子。我问这位美男子说："您过得怎么样？"他对我说："很一般。"还补上一句，"年轻的太太！"他重新抬起轮子，像杂技演员似的一转身，雷鸣似的喊道："这辆小车，已经是件与我毫不相干的东西了……未来属于我！如今我在进行第二轮训练……我要打破举重的世界纪录！"他向巴维尔伸出手来，也只是这么拍一下手掌罢了……然后将轮椅向后一转，又使劲推压着轮子回到山坡上。此时，夕阳已落到树干后面。他推压轮子前进的样子，活像正在游着蝶泳。

实际上直到来到这里，来到残疾人劳动车间前我才感到，我推着的巴维尔仿佛坐的是一辆儿童车，仿佛我是推着一个孩子到外面来散步。……说着，我们进了办公室。巴维尔向我介绍这里的一位领导，也是坐轮椅的。他跟我握手时，我只得伸给他左手，他的右手不灵了。然后我们走到一条长廊上，挨墙摆着好几个用漆布蒙着的长沙发。走廊末端是一面玻璃墙。轮椅上坐着几位腰板挺直的姑娘，外面还有阳光，姑娘们的身影显现在对面的玻璃镜里。这些少女久久地贪婪地抽着烟，烟雾在光亮的玻璃墙里徐徐上升，一直飘到一棵弯曲的大无花果树的枝叶下。……通向车间的门敞开着，我推着巴维尔坐的轮椅，车间主任也坐着轮椅默默地走在我们后面，他轻声说：

"他们干的是百分之二百的活儿。"我在每个大车间里参观一阵，只见在机器旁边干活的都是坐在轮椅上的妇女，她们神情专注地劳动着。可当我们看着她们时，她们便停下来。她们头上戴着充气的轻便盔形白帽，就像摩托车手必须戴的那种轻便安全帽。她们看我们一眼，以示致意，在敞着大门的几个车间里，都是这么一幅景象：这些戴着安全帽的头微微低着，聚精会神地干着活，用指头拧紧螺丝钉，仿佛是从后面拧紧收音机那块板子……车间领导对我说："这些安全帽是用亚根地纱[①] 做的，因为连一根头发丝也不许掉进里面去。"夕阳已经落在走廊尽头，阴影也更暗了。当我们掉过头推着轮椅往回走时，车间天花板顶上的霓虹灯光芒射到走廊上，将走廊上的影子拉得更长。如今一位戴着安全帽的女工，坐着轮椅来到长沙发跟前，将轮椅熟练地转到一个合适的方位，轻而易举地便将身子移到沙发上。她仰天躺着、摊开双手休息起来。现在主任打开另一扇门，里面传来轻微的马达声……我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那里工作的有两个年轻人，但不是坐在轮椅上，像我刚才所见到的……而是躺在一张装有四个小轮子的长长的病床上，躺着这两人的两张床就像插进救护车一样插到一座构架里，这两个工人完全被塞进汽车的底座下，在修理汽车的闸。这两个男人躺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工作，在他们头顶上方的板子上拧紧螺丝，他们的指头刚刚够得着那板子……"这两位干着百分之三百的活儿，这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救。"主任低声说。我推着巴维尔坐着的轮椅……然后我们开始告

① 亚根地纱，一种类似夏布的织物。

别，主任只得用那只健康的左手和我握手道别。我推着巴维尔往前走……自取商店、饭店、餐厅和酒吧、预制板楼房、灯光、彩色广告和标语都在闪烁着光芒。我们刚从里面走出来的这车间的灯光、这霓虹灯的世界、这沿着撒满沙子路上的灯……所有这一切都仁慈地给人一个瞬间的印象：这个城市跟其他城市完全相似。巴维尔转过身来悄声对我说："这位主任患的是经脉血行扩散，一只手已经萎缩掉，如今他担心着，不知什么时候这只健康的手也会被病魔侵袭。"我突然希望我的那位躺在卡尔拉克被普通的胆结石吓得要死的丈夫也能看到我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

这一晚，我在一对脊椎残疾夫妇家里过夜，我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有一个孩子，他已经睡了。房间里散发出茴芹香味。这对年轻夫妇在忙着明天的事。他们说，不得不请我原谅，他们正在为明天的郊游做准备。女主人正在喝普罗斯捷约夫酒，给我也斟了一小杯……我去洗手间时，所有其中的用品、所有毛巾，总而言之所有一切都放在他们用手够得着的地方。我抬眼看到天花板上安了个小滑轮，一根尼龙绳绕过这滑轮，可以上下升降，下面拴着一个儿童用的小浴盆，就像剧院里那样，可以拽上拽下……我慢慢地洗了手和脸，太太坐着轮椅在门边，对我说："您想喝杯咖啡？还是茶？"

我在想，我的丈夫曾经多么乐意去探望那些病得要死的人，去给他们准备后事……如今，他在卡尔拉克的第一个星期就被他的肝脏吓垮了，以致不得不请心理医生来做他的工作。

这位心理医生则坐在他床边，像对一匹病马那样冲我丈夫大声喊着："您知道您将会怎么样吗？等您动过手术之后从医院出去，您早晨又能好好地起床、刷牙、刮胡子，在您的太太去上班之前你们可以好好聊聊天……您给准备早餐，带柠檬的茶，抹了黄油的辫子形面包……然后您太太去上班。您爱看书，那您就看书；要是天气好，您打开窗户，然后您溜溜达达去买日报，没有比能读读自己可以慢慢走去买来的报纸更惬意的啰。"我丈夫对我说，听了他那番话，吓得更厉害了……

我一走进厨房，女主人便从柜子里拿出一把糖块儿夹子放到桌上，然后将轮椅转到另一张桌子旁边准备小碟和迈森[1]杯子……接着抽她的烟、微笑着。我一口口地呷着茶。她问我，布拉格的剧院里正在上演什么节目，出版些什么书……我不得不对她说我不知道。然后这位年轻妇女热情地向我叙说她曾经是一名运动员，到海德尔堡[2]去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说他们脊椎残疾人也有自己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她曾获得第二名，她用下巴指给我看墙上，那里挂着她的奖状。她还对我说，全世界的脊椎残疾人还有自己的杂志，她是几位秘书中的一个，她说她正在准备参加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枪项目。……她的丈夫这时正往箱子里装运动服和准备睡袋。他微笑着坐着轮椅从厨房驶到房间，又从房间驶到走廊上，经过那张小床时，看了看他们的孩子……我看了一眼敞着门的

---

① 德国城市，盛产瓷器。

② 德国城市。

洗澡间，就在那里用尼龙绳吊着小孩的小浴盆……在安放便池的地方，墙上安了一个镍扶手，我想像着他们得费多大工夫才能坐到这便盆上去……

我又不得不想起我的丈夫，他如何瘫倒在卡尔拉克，年轻的心理医生不得不来对他说些劝慰的话："您在病后恢复期里，中午可自己到病号食堂去吃饭，自己点菜，看什么菜适合患胆病的人吃……然后把肚子填饱，慢慢地您就能吃饭了……然后呢……您就能回家了……布拉格有许多公园，公园里有长凳子，您舒舒服服地坐上去，浏览一下四周围……然后慢慢走回家，好好地躺着，因为恢复您的肝需要您仰面躺着……然后呢，您有收音机，可听听音乐……和新闻……等着您妻子下班回来。她将给您讲述她上班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在那里聊了些什么，跟她在一块儿干活的人都说了些什么……然后你们将一道准备病号晚餐……然后再去躺着，您可以看电视……可是注意！千万别看紧张的情节，在恢复期间，对于您的肝，看别的都可以，可就是不能看枪杀……犯罪的镜头，否则就跟您吃了一条猪腿一样……等您动完手术回到家里之后，在您面前将会有着许多美好的日子。"……在我丈夫将这些话转述给我听时，我看到我丈夫是多么地坚信自己已经不可救药了。

当我准备睡觉时，走廊上响起了音乐和一阵欢声笑语……然后是敲门声，女主人打开门，罗泰和巴维尔坐着轮椅进到屋里，音乐声是他们带来的。他们一直在笑，这次罗泰反

过来将手指头按在巴维尔脸上转了一下。巴维尔嚷起来："别这样！你知道，我怕痒！"他们是来向我道晚安的，然后又坐着轮椅出去了。关上门之后，只听得走廊上哐当一声巨响……女主人打开门出去，马上就回来对我说："没事儿，罗泰搁在膝盖上的电视遥控器掉到地上了。"后来他们便静悄悄地推着轮椅走了。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外面闪烁着灯光，不时传来低沉的歌声和音乐、听不清楚的谈话声。我没睡着，我因在这一天所感受到的一切而不能入睡……不过到后来，我还是因疲倦而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身帮这年轻夫妇的忙。他们高兴我帮他们将一切装上汽车，包括儿童摇篮，直至将两支标枪也放到车上……就像来的时候我帮助罗泰和巴维尔那样，如今帮助这夫妇俩装好车，花了几乎半个钟头才让这两位朋友甩到汽车座位上。我给他们将轮椅折叠好放进车箱里……他们便同我告别了。我将我的东西放进自己包里……年轻的脊椎残疾夫妇到亲戚家旅游去了……随后我便去敲我那两位朋友的门。他们已经起床，在放音乐。罗泰已经喷过香水。我的两位朋友已睡足了，所以精神焕发、满面笑容、正在喝茶……后来我们便坐电梯下来，然后出了门。当我们把一切都装上车，当我们的两位朋友将自己甩进"奔驰"车后，我便将两张轮椅折叠好放到后座上。仍由巴维尔开车。那边公共屋的脊椎残疾人在向我们招手，巴维尔鸣了几下喇叭致意后便慢慢地行驶起来，罗泰挨个儿碰了碰脊椎残疾朋友们的手掌，他为朋友们专程来等在这里与他告别、一直把他当做哥们儿而感动。他即

使住在德国，也一直属于这里，因为他生在这里，曾在这里上学，在这里结婚，可他也是在这里变成的残疾，在这里离婚，就在那切文尼·哈拉德克的无法行走的残疾人部门里结束了他作为健康正常人的生涯。在那里，他惟一的朋友是一位年老的德国人、掘墓者，他经常带罗泰到太平间去，那里总有一两具尸体，可是罗泰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在这里愉快地聊天、喝罗姆酒……我们早已驶上了国道。罗泰喊道："巴维尔，开快点儿，让我们早点儿到家！"接着他谈到自己的命运，如何在布拉格服兵役，如何成了一名出色的举重运动员，他还曾经靠在弗莱克酒家将醉汉扔出门外来挣钱。我听见他的声音，可渐渐睡着了。罗泰讲述这些事情只是为了忘却他所讲述的。"喂，我将为这辆'奔驰'车而感谢谁呢？兹登涅克，我一个同学的丈夫，他在哈拉德克那儿见到了我，便对我同学说：'老婆，我们不能不管他。既然他老婆抛弃了他，我们就把他接回家来吧！呆在这里他会死去的！'兹登涅克是他们楼里的房客委员会主席……于是他救了我，我在他那里头脑逐渐清醒过来，想起我的妈妈和姐姐在马克特登费尔特[1]，我虽然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填表时在'民族'一栏总是填写德意志……我这么写了，于是半年之后我便到了我的妈妈和姐姐那里，今天才有这辆'奔驰'……你知道，我们在一起过得很愉快。巴维尔，你说点儿关于你那位老父亲的令人高兴一点儿的事吧！我爱听。你知道，我老爹的下场很惨，他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呆了两年，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战争结束，他贫病交加，回到家里时，

① 德国城市。

又赶上人们把我们的母牛牵走……第二天，又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我们和我的老爹，把我们厨房里的东西甚至鞋子统统抄走了，只给我们每人留下一个小缸子，还把我老爹迁走了，他死在德国……荒诞作品！不是吗？巴维尔，我说，你讲一讲你爹和他的哥们儿半夜在日什科夫雄鹰体协的体育馆里出的洋相吧！讲讲他们在屠夫化装晚会上如何吊着转圈儿，在半圆形屋顶下的一张桌子上方飘荡的吧！……巴维尔，你说说，他们如何因为吊着转圈儿飘荡时，如果脚碰不到那根圆圈线就得吹一声小号吧……那天是七月六号，在斯特拉霍夫宫堡里。跳舞的人抬头看着他们在上方飘来荡去，喏，巴维尔，你想不起来了？你瞧，我还记得清楚哩！那第二名吹哨子的叫什毕尔克，我服兵役的时候就是到什毕尔克那里去上的军训。真是笑死人，他们的脚若碰不到圆圈线，就得吹一声小号。我全看见了，他们脚一弹回来，又得接着飘荡……妙极了！巴维尔，后来怎么啦？你啥也记不得了？他们要是没飘荡好，又要吹哨，又要数数儿，而且还数不对，结果小号撞小号……什毕尔克碰掉你老爹两颗牙，你老爹只碰掉什毕尔克一颗牙……这可真是热闹极了！巴维尔，可惜，我不在场……”巴维尔开着车让出一个空间，用指头在罗泰脸上转了一下……罗泰笑着，大声嚷嚷：“巴维尔，别这样！你这头阉牛，我可非常怕痒啊！”我微笑着靠在折叠起来的轮椅轮子上渐渐睡去，压根儿就听不见他俩人在讲些什么了……

星期一下午，我正准备去探望我丈夫时，电话铃响了，我丈夫在电话里沙哑着嗓子对我说，他已经动完手术，说他已经自己

下楼来打电话了，他告诉我说，手术很成功。可是情况有点儿不一样：他们把他的胆囊摘除了。我去他那里时，正赶上他身上装着一根导管，随身还挂着一个塑料袋，管子通到塑料袋里，每天往这塑料袋里流一公斤胆汁。他还躺在那里，继续打着点滴。病房里有六个病人，有的已经做过手术，可是他们都是取出了小石子，第二天便能吃土豆泥了，还吃了煮水果。而我丈夫还不让吃东西，三天没让吃东西，只喝点儿茶和吃点儿给儿童吃的蛋黄饼干。这个塑料袋，对我丈夫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对他来说还是一种可怕的重负，就这么躺在那里。赫尔金纳工程师已经在窗口坐着了。医院除掉他的胆结石，因为它已危及他的脾，加重了他的糖尿病。这位工程师把我丈夫吓唬得够呛：当我丈夫动完手术后第一次照镜子，看到自己这张黄脸时，被这副模样吓坏了。他连忙环顾一下四周，看是否有人看见他照镜子时那副狼狈可怜相……赫尔金纳工程师看见了，是从他床边那窗玻璃上看到的，他说："太可怕了！是不是？"我丈夫久已盼望着他尿的颜色能褪掉一点儿，而且每次都抱着它定会变浅一些的希望，可它却一如既往总是深得像黑啤酒一样。当我丈夫逆着光凝视着椎形玻璃量具时，第一个看到他这种目光的，又是赫尔金纳工程师。他带着浓厚的兴趣指出说："惨透了！"当护士们推着餐车送来午饭，或者晚饭，当每个人都能得到一碟土豆泥，而我丈夫连一口食物都得不到时，赫尔金纳工程师又忍不住要说上一句："这样心情没法好，是不？"

给我丈夫打击最大的是什托克副教授。我丈夫曾在他那个内科部门呆过三个星期。手术后第三天，这位什托克副教授

来到我丈夫躺着的那间外科病房，高兴地对我丈夫描述说，做手术时他在现场，说他像观看所有手术一样亲自看着这个手术，是巴拉日教授执刀的。说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像我丈夫这样漂亮的红肝已经好久没见过了。只是他并不了解我丈夫，还以为他在安慰我丈夫哩。说我丈夫的肝功能在渐渐减弱，所以也不给他吃东西。我丈夫立即爬下床来，下地走动，像带着公文包一样带着那塑料袋，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办后事。连巴拉日教授也来了，这位长得像哈罗德·劳埃德的美男子将眼镜推到额头上，他连一条皱纹也没有，长得教人没法相信他的年纪。他弯下身来，直视着我丈夫的眼睛对他说："你自以为有的病根本就不存在，明白吗？"

第四天，当我来探望我丈夫时，他在发高烧，已经听不到我说话了。他过了一个很可怕的上午。因为刚刚结束培训的护士们已经做了结业考试，已经换上了新衣裳、戴上了小白帽，本该得到那红十字徽号了，但是她们还必须在我丈夫躺着的那个部门做一个结业测验。护士长让她们搬来桌子椅子，让她们挨个病床地走着，以展示她们直接与病人接触方面的知识。后来护士长又从理论上考问她们。那些坐在长凳上的护士搬来一块折叠屏风，将护士长的桌子与被考的护士隔离开来……于是，当所有护士都经过考试，当她们已经得到护士长给她们的结业证书时，顺便把那屏风围在我丈夫那张床边。总而言之就这么顺手一挪，摆放在那里……等我丈夫一睁开眼睛，看见他床边围着一道屏风，像内科病房那些快要咽气的病人床周围的屏风，就像姆尔什吉克小说，一开头就是"请挡上

屏风！”……我丈夫整整一个小时被挡在这屏风后面。等到一小时之后，护士们搬走它时，谁也没来打消他这一念头：以为这是围在快要死去的人周围的屏风。

接着便是星期天。海德里希先生前来看望我丈夫。他看见我丈夫这么一副可怜相躺在床上，身上还插着根胆管和带着个塑料袋，忍不住流露出由衷的高兴。海德里希有点儿眼红我丈夫，他总认为自己是位胜过我丈夫的作家。这位海德里希先生常来我家串门，跟我丈夫没完没了地讨论文学艺术。他曾经同我丈夫走上好几百公里穿过齐米茨基小树林和魔鬼峡谷。这位海德里希先生总是在谈自己，他只承认自己而不承认别的作家，他极其惊奇地发现自己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这位海德里希先生简直让人想不到地说，他如今看到作家中的头号人物便是他，说他是捷克散文作家的顶峰，是中欧的大师，是从我丈夫这里接过权杖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因为我丈夫已经是被注销的人了……海德里希先生又说又笑的，跷着二郎腿，笑得那么心花怒放，为他的未来而由衷地喜悦。我丈夫被彻底摧垮了。海德里希先生走了之后，我丈夫发起高烧来，到晚上不得不给他输氧气，由于他已超过 39℃。所有能来的医生都赶来了，因为这意外出现的高烧把他们吓了一跳。

这天晚上教授先生来到我家，对我丈夫说他必须去照 X 光，然后看情况再说，他说星期六半夜再来看看……我丈夫去透视了肝。他一直盯着天花板，大概是在等待教授先生到来。也许他盯着天花板，是为了只看到天花板上有的东西：干净的

天花板上爆裂着灰泥块儿，像油酥面团和油酥卷儿。他的熟人星期六来看望他，同他聊天，给他送来水果、啤酒，可是我丈夫从进医院以来，只吃分发给他的那一份。如今他在外科病房只吃点儿童蛋黄饼干、喝点茶。别的不关心，只想着窗旁那张床上赫尔金纳工程师讲的话……尿仍旧颜色很深，镜子里看到的模样仍旧很可怕，我丈夫刮脸时常常因为体虚，电动刮脸刀从他手里掉出来，赫尔金纳工程师总是说："虚弱来自怯懦的灵魂！"

星期六夜里，我丈夫已经不相信教授还会来时，他却来了。他走进病房，手里拿着X光片。把眼镜推到额头上，问我丈夫说："您想一直挂着那个塑料袋吗？"他笑了笑。我丈夫忙说："不，绝不！"教授说："胆总管还是灵的！"他举起X光片说："导管已是多余的了，肝也起作用了。"他按一下电铃，递器械的护士推来一辆小车，递给他器械，教授弯着腰，缝好插导管的口子，跟我丈夫握手说："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顺利，相当好。"也让我丈夫吃土豆泥了。他吃土豆泥时，就因为能得到土豆泥而幸福得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我丈夫开始下楼，去食堂，去商店。于是他一瘸一拐走到那里，给护士们买了最大的一份盒装糖，以感谢她们的服务，说他如今已不需要便盆，已能自己去上厕所……可是这盒糖足足有三公斤半重，我丈夫将它提到二楼，当他正往楼梯上爬时，不慎摔了下来，糖盒子掉到地上，纸包糖块撒得到处都是。我丈夫仰天躺着，就这么躺了一会儿……后来将锡纸包

的糖块捡起来，请一位护士替他将这盒糖拿到楼上去送给了护士们……

我来接我丈夫出院的日子到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我丈夫送到楼下汽车旁。我丈夫拄着拐杖，俨然像位老者，上车时几乎像巴维尔那样费劲。他疲惫不堪地坐在我旁边，微笑着。我将他带到克斯科。当我的车子开进我们那片林间空地时，我丈夫想要下车，于是我又得将他拽出来。……他站在车旁的那副样子，瘦得真像那里只是挂着他的衣服。我还去帮他把自行车扛来，他一心想要自行车，等我为他取来自行车，他一踩车蹬，便离我而去，骑着自行车跑掉了。我将他的东西送回家，铺好床。我丈夫回来了，骑着自行车绕汽车一圈，又骑走了，又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骑车逃离开我，逃离开他自己，逃离开他那肝，逃离开他的癌症，因为他的肝一直在疼，胆囊已不对它喷射胆汁，胆管只一滴滴地滴着胆汁……后来我又将他沿着楼梯扶到房间里，接着又沿着梯子上到他的顶棚间、他的小阁楼里，他便瘫在他床上了，仿佛爬过高山峻岭远足归来那么累……他笑着对我讲述着："他们放我出来的时候，什托克副教授对我说：'您已经好了！'我说：'大夫，我可以喝酒吗？'他对我说：'您要是有胃口，请！这里有杯白兰地！'我说：'能喝咖啡吗？''护士！'他连忙喊道，'给我们泡杯咖啡！'我说：'皮尔森啤酒能喝吗？'什托克医师说：'现在，您一出医院门，就可以上齐舍克酒店或者去黑啤酒厂……您病好了，不过，吃饭的时候您得注意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您一喝茶、柠檬和吃面条，您的胆囊就会疼，可您一往面包上

抹些猪油，再来点儿肥肉，那您会吃得很舒服。'"我丈夫忙问我："有一小块抹了猪油的面包吗？"可是等他吃完这块抹了猪油的面包，便坐下来细听这块面包在他内脏里有什么动静。有个农妇从塞米基骑着自行车来串门，她许多年前就已经动了胆囊手术，她是来给我丈夫传经的，告诉他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她为自己的不幸而哭开了，说她的手术已经动过好几年了，是艾麦里赫·波拉克亲自给她动的。说从这时候起除了茶和儿童蛋黄饼干，别的什么也不能吃，说她又在写遗嘱。她哭得很伤心，因为她可怜她的孩子和孙子，主要是可怜她自己……这个本来是来安慰我丈夫的农妇说着说着还为我丈夫的命运哭起来。我丈夫脸色变得苍白，他跌跌撞撞走进厕所，跪在那里将抹猪油的面包全吐出来……等他从厕所里出来，满身大汗淋漓，额头上又是泪水又是汗水的，还不停地打嗝儿，他又一次往厕所跑，只听得他在便池前呕吐哀号的声音……等他从厕所回来时，那农妇猜测说："您准是吃了荤油抹的面包。"我丈夫点了点头。农妇哈哈大笑，将手伸给我丈夫，笑着祝贺他说："如今这里有我们两个被判死刑的人了！不是马上，而是慢慢地、像我妈妈一样慢慢地饿死……您家里有死于癌症的？"她抬起眼睛问道，我丈夫承认说："我爷爷托马什死于癌症，我叔叔波普也死于癌症。"那农妇欢呼起来："完了！这是遗传的！我将常来看望您，您也可来我们家，我们将一块儿聊聊我们的癌症，我们的痛苦。有两个人，做伴死起来也许轻松一点儿……最主要的是，有我们这种病的人，得到的回报是都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您的眼睛可真漂亮！"

成天谈论着自己的病，意味着沿着这张唠叨的嘴重新陷落到病里。如今，自他从医院回来之后，他最喜欢谈他的病了，他结识在塞米采酒店、小镇酒家和布拉格所有肝坏了的人、动过手术的人，津津有味地听人家讲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忌什么口；还爱听那些娘儿们给他讲她们如何如何为自己而痛哭，因为她们总认为很快就会因这肝病而死去。他整天琢磨着他那肝，自己怜惜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得回到卡尔拉克医院去。他还爱听跟他一样做过胆囊手术的人倾诉，如何如何在四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会难受，如何在吃了抹荤油的面包、一小块肥肉之后，马上就得躺下考虑死后事宜；他还爱听结了业的护士们讲她们亲临目睹的故事；他还爱听年轻的医生们不仅给他讲，而且给他画出来，我丈夫没病时他的胆囊如何将胆汁喷到肝的展开的那一面，说这样的肝实际上像一床折叠起来的大毯子、床单，在它们上面粘着嚼碎了的食物，而如今，因为已经没有胆了，也就停止喷射胆汁，如今这胆汁只是通过胆道一滴滴流出来。

这期间他老是读《世界文学》里的类似内容：他心爱的库珀如何因身患癌症而体重变轻，他又疲惫不堪地与赫伯恩[1] 拍了最后一部电影《午后的情爱》。我这位夫君简直完全融进了布兰德利先生这个角色。他和库珀在库珀死前三个月访问过欧洲，

① 赫伯恩(Hepburn Katarine，1909—)，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接着又同他在维爱[1]、威尼托[2] 照相，拜见教皇，求他为其祈神赐福。库珀后来体重越来越轻，乃至到最后三天一躺不起，带着一幅银制的耶稣受难像独自一人躺着，于是我丈夫也跟着他咽了三天气，以便到最后真的死去，正像海明威过早地用猎枪射击了自己的脑袋那样，这位作家，本可以好几次中弹身亡的，既然谁也没有射中，他便用心爱的猎枪将自己射中。

……我丈夫有一天起床后，好像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已不再去量体重，也不再登记自己的体重又减了多少。当我给他送来掺柠檬的茶时，他连角形面包一并拒绝了。让我给他拿来新鲜的大面包和一罐带油渣的荤油。他自己抹面包，还挑了些油渣放到上面。又有人开着车来串门了，是从便门进来的。我丈夫坐在桌子旁吃着夹了荤油和油渣的面包，当客人胆怯地走进来时，我丈夫便请他吃他自己正在享用的东西。可是客人感到有些失望，他本想来谈谈胆囊手术、胆管怎么滴流胆汁的。我坐在桌旁开始绣下一张图画，我在挑选绣图用的彩线，不知不觉第一次地平静下来。因为我丈夫在请求客人去给他买肉排来，说他们要一起去普舍罗夫的屠夫那儿买烤猪肉，因为肝病人最好是吃烤猪肉。……于是他们买来了烤猪肉，当天晚上我还做了炸猪排。我丈夫烤了猪肉，让它冷却下来。当时他所有那些曾经多少次那么乐于谈论我丈夫的病的朋友们都愣住了。只见他拿来冷却的猪肉给大家吃，他自己还喝了啤酒。他

---

① 维爱(Veii)，古伊特拉斯坎一市镇，位于罗马西北约 10 公里处。

② 威尼托(Veneto)，意大利北部和东北部大区，一称威尼斯—欧加内亚，下设威尼斯等七省。

向大家道声抱歉之后便一瘸一拐地走出去，找到我们小木舍墙边的自行车，一踏脚蹬，便骑着它沿着林间小道扬长而去，一直骑上了县公路。因为骑自行车使他呼吸舒畅，这种有节奏的呼吸，主要是能让他独自一人逃离一切，使他感到舒畅自在，让他觉得已不再需要称体重，不再需要抬着手腕细听脉搏跳动的次数。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周身散发着一股茴香味儿，他在某个小饭馆喝了好几瓶普罗斯杰约夫生啤酒，这个晚上他睡得很香……

在这段身体恢复时期，不管我丈夫骑着自行车从天南海北哪个方向回来，每次进到这座克斯科林中小屋的时候都是兴高采烈的。我也因而感到高兴，心想：准是因为住在这林子里、这草地上，走着这林间和田野小路的缘故。可是一个星期之后我才发现，我丈夫身上散发出来的是茴香酒的气味。后来我还发现，他身上横七竖八总揣着几瓶普罗斯杰约夫的生啤酒，不管他去哪儿，从林子里回来时总是像游方醉仙般快活无边。有点像哈夫朗涅克科学院士的生活方式，说纯烧酒对动过胆囊手术的人是最好不过的偏方良药。我丈夫便遵循此道了。……甚至有位老中校来找我丈夫，告诉他说已经动过手术一年了，说他如今身体很好，但是以前不好，非常不好，特别是当他忌口的时候，直到有一天他去找他的朋友们，他坐在那里只喝矿泉水，而他的战友们都喝伏特加。他暗自说，我那么苍白，要是来点伏特加会怎么样呢……夜里他仔细听着他的肝有没有问题，可是只听得他的肝呼呼响着，甚至咿咿呀呀的，这中校的肝竟然希望再来一点儿，再来一点儿……到了下

午，当他又开始烦躁、心神不定的时候，便求他老婆说："孩子他妈，你去给我弄一小瓶伏特加来吧！"他然后慢慢喝掉它。在东方战线习惯于这样。在这以前他哪个晚上都睡不好觉，而这一晚终于睡着了，而且感到他的内脏轻松了许多，他的肝又开始正常运转了。于是像在前方战场上那样，他每天喝一小瓶伏特加，吃饭的胃口也好了，而且最合他胃口的是抹荤油加油渣的面包。

……我丈夫就这样骑着自行车在外面逛。他有一瓶酒藏在弗奥布罗夫采、普舍罗夫后面林子里的橡树下，另一瓶一直藏在宁布拉奇卡林中小路旁一间干草房里，还有一瓶藏在稻草垛里，再有一瓶藏在小帽林旁的水渠里。那是他常爱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沿易北河有一条美丽的小道；他甚至还藏了一瓶普罗斯杰约夫生啤酒在巴列切克、维莱恩卡后面的小山坡上，那里是门切伊特坟场，他这瓶酒就放在停棺房的窗子后面。他也喜欢骑车到这个巴列切克来，因为这里可以观看北部的美丽景色，看到赛米茨卡·胡卡，普舍罗夫的白胡卡[①]。他喜欢躺在这里欣赏美景，这里微风吹拂，我丈夫躺在这里做深呼吸、养精蓄锐，然后好到坟地上去挨个儿读一遍所有墓碑上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当他得知这里埋着这么多比他年轻的人时，便总是伸手抓起停棺房窗子后面那瓶酒，为所有这些死者的健康而干杯，然后接着往前骑，或者匆匆往回赶，以便再到克斯科林中某处去喝个够，再到一个叫鹿耳朵的地方喝掉藏在

① 胡卡、白胡卡，为当地村子名。

那个有窟窿的树里的一瓶酒，然后回家，以便及时将自己那股兴奋劲带回家来。

这时期，他还跟一位名叫库兹尼克的老先生交上朋友。这人在诺维卢基的小木舍里用水果酿果酒、李子酒，他们经常坐在小木舍门前的空坪上。这木舍像契诃夫住过的那种俄式建筑，库兹尼克先生把这小屋里面弄得乱七八糟。要是他老伴给他把屋子收拾整齐，那他恐怕啥也找不着了。他老伴要到周末才来，因为她还在上班。她给他煮上一个星期的菜，给他写上：哪个锅里的菜在星期一吃，哪个在星期二吃，哪些在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吃。可是库兹尼克先生顺手摸到放在地窖里的哪一锅就吃哪一锅。我丈夫常去他那里，因为在他后面那间小贮藏室里存有几十瓶、大约五十瓶封好的烧酒，分别为最好的头馏酒、稍差一点的二馏酒，然后有三分之一是末馏酒，从蒸馏器里滴出的烧酒……那最好的头馏酒早已被库兹尼克先生喝光，如今，在他认识我丈夫后，两人都在用二馏和末馏酒治疗他们的肝脏。库兹尼克让我丈夫闻一闻打开了瓶塞的酒瓶，以便知道哪一瓶酒还能喝得下去，剩下的仍旧将瓶塞子塞好。他们便喝那些他们觉得很靓的，两人就这样治疗着他们的肝脏，因为库兹尼克先生也跟我丈夫一样肝不好。最主要的是他们害怕，喝这么多酒眼睛会不会瞎掉。……到后来只剩了两瓶，再后来只剩下一瓶，不过连这一瓶也是好的哟，尽管我丈夫跟库兹尼克先生一模一样，已经用鼻子鉴定过这一瓶次酒，不过末了，他们把这一瓶也喝干了……

还有，我们住在克斯科时，我丈夫每天晚上都到“小树林”酒家这个小饭馆去和老乡们一块儿喝啤酒，赶上冬天，他们还让温上一瓶红葡萄酒。在这里我丈夫可就是头号种子、中欧冠军啰，这里的人都盼着他来。我丈夫不管上哪个酒馆，从来没谈过他的写作，没谈过他怎样为写作而绞尽脑汁的事儿，没谈过文学，要是有人问到这样的问题，他一声不吭，两眼望着鼻子，玩弄着啤酒杯垫板，还稍微有点儿脸红，耸耸肩膀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说所有他想要说的，在他书上都说了。可是他在饭馆里爱跟他们聊地里的活儿、聊宰猪节、聊老乡们的生活。到这个“小树林”酒馆的人来自维莱恩卡、哈拉吉什卡，有时还有从赛米采来的，都是骑自行车，还是第一共和国时期的老牌子旧自行车，轮子总也不坏，已经用了三十年四十年了，肯定还能维持好多年头。

在这“小树林”酒家常坐着一个名叫弗朗达·沃列尔的人，他要是离了这个小酒家恐怕不知道怎么活。他连中午也要来这里歇一歇，每个晚上必来，到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整个下午都在这里。弗朗达是个很自负的人，他最喜欢坐在炉子旁边安静地喝他的啤酒，还要上一杯咖啡。有时他也发发疯，要喝罗姆酒、浓度酒，无缘无故地跳起舞来，他一跃跳到灶台上，在高高的炉台面一直跳到脚板发烫为止，其实也就是几分钟，然后便在桌子上接着跳，跳得不错，就像穿着民族服装的摩拉维亚小伙子们跳的那种舞。弗朗达是老板以至老板娘的知心朋友。他还爱上了老板娘，时不时给她送点小礼物。顾客特别多时，他便帮着他们灌酒，满脸得意的笑容。他总是穿件白衬衫，微

笑着给顾客打酒，要是能让他进厨房，他便更加高兴。弗朗达简直是老板的一个好顾问，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便通宵睡在酒店里，帮他们生着炉子，敞着通向地窖的门，免得地窖里的啤酒冻起来。

这时期，赶上雪太大时，这位有个漂亮太太的诺瓦克老板就在饭馆里呆着。到了圣诞节，弗朗达便送来一棵圣诞树，只要老板或老板娘需要任何东西，弗朗达便开着自己的车去为他们办。当老板决定把挡在饭馆墙壁上的橡树去掉，弗朗达便把橡树干弄到波希昌尼锯木厂去了；当老板打定主意要去掉炉灶周围的粗瓷砖，弗朗达便立即把一切办妥。最主要的是弗朗达喜欢给人做寿，不仅给他母亲做，而且也给他的女儿们、给他自己、给老板、老板娘做。于是每个被弗朗达招待过的客人都真心实意地用弗朗达让其放到桌子上的葡萄酒和烈性酒来碰杯。他甚至还为他们准备了上面有寿星名字的蛋糕。到后来“小树林”酒馆的每位普通顾客和常客都在这里做寿，招待所有当时来到这家酒馆的客人。我每星期来这里一次，跟这些老乡们坐在一块儿很愉快。有时也有从城里来的度假小木舍的主人，他们是来看看他们的小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被盗，而平日只有当地的老乡到这里来。他们可会找乐子哩！有时他们提来两只野兔，老板给他们用传统方法烧成奶油兔肉，猎人们甚至每月送来一只鹿。冬天的时候，哈马切克先生或别的什么人每个星期总要送来一些宰猪节做的血肠和肝肠。“小树林”酒馆的顾客们、朋友们就这样坐着，等着冬天过去。我听到他们非常策略但又很有耐心地向我丈夫探听他将如何庆祝自己的生日。

这时期我仍旧在废纸回收站继续将一车车被销毁的书送进造纸厂，我总是从这些书中拿出几包来放在一边。作家们亲自来把这几十本书取走，一再地谢谢我，给我糖果，于是我便结识了又一批被清洗的作家。我丈夫在克斯科从来都呆不住，在家里过不了一天，上午就乘公共汽车上布拉格去，拜访也已停刊的杂志编辑。我总觉得奇怪的是，我丈夫还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员，但他结交的是这样一些党员，他们在大炮不仅对准作协二层楼，而且对着科学院后来甚至对着宾卡希啤酒店之后不仅被除名，而且也被解雇离开了编辑部，离开了书记的职位。所有这些共产党人、我丈夫的朋友们，如今常来我家，我看到的几乎总是一些很帅的男人，他们都有一双像我丈夫那样的眼睛，有些惊恐的样子，但却都在微笑，只不过这微笑实际上是被掩盖着的悲戚。他们来要卡雷尔·泰格的书、哲学家费舍尔和艾戈·波恩迪的书，还有维舍堡出版社出版的天主教诗人的书，他们的书也当废纸处理掉了。我丈夫将书寄给了他们。他们整天坐在宾卡希酒店，早就有座大炮瞄准着这家酒店，它主要是瞄准这帮被清洗的年轻人。就因为有他们才在那不幸的八月开来了那些军队。于是我邀请了所有这些被清洗的作家和编辑，告诉他们一个星期之后是我丈夫的生日，说将于三月二十八日在“小树林”酒家给他做寿。这天是教师节，从挂历上看这天正是考门斯基[①]的诞辰。……大家都很高兴，没

① 考门斯基(Komenský Jan Amos，1592—1670年)，捷克教育家、人文学家、哲学家。是捷克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再流泪。“真的，这可能吗？”大家都表示惊讶。他们中间的一位说，斯莫尔科夫斯基情况很糟糕，他也被撤职，坐在家里，谁也不跟他说话，大家都回避他，应该向他表示同情才对……我便说：“让他也来吧！我丈夫不是往农业报上为他写过一篇赞扬的文章吗，我丈夫准会高兴他来的。他还说过，斯莫尔科夫斯基是维莱恩卡那地方的人，在大战前，他作为一名面包师还去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哩！”

三月二十八日这天马利斯科先生来了，布热佳和弟妹也来了。晚上我们一道去到“小树林”酒家，老板穿着节日盛装，老板娘也一样，在门口给我献了一束花，弗朗达给我丈夫捧上一个大极了的蛋糕，浇在蛋糕的糖皮上用巧克力汁写了一行字：“祝著名作家”，在用软糖做的玫瑰花下面又有一行字：“生日快乐”。……从维莱恩卡、哈拉吉什特卡以及赛米采来的老顾客都得到我丈夫的邀请。整个饭馆隐没在鲜花之中，所有的灯光都亮着……然后来了两辆汽车，被清洗的作家、编辑们走进来，我丈夫请他们再往里走。画家海洛展开一块床单，上面写着“万岁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著名的拙劣笔杆儿！”哲学家科西克、前任书记科斯特罗温也来了，他们一坐下便唱起歌来。老板和老板娘斟着烧酒，就着啤酒喝，另一些人要喝葡萄酒，我的丈夫虽然微笑着，但他知道，而且相当明显地表露出来，他知道，这座两年前对准作协二楼的大炮，如今你看不见它，但它却存在着，恰恰现在就停在外面，瞄准着这个“小树林”酒家。我高兴看到我丈夫吓得六神无主的那副模样，可有什么可怕的呢？让一切跟这门大炮都见鬼去吧！他写作又犯了哪门子罪呢？我喝着啤

酒，大家都在欢快地笑着，编辑巴托舍克，这位美男子站在椅子上，大家唱着摩拉维亚歌曲，巴托舍克在指挥……当大门敞开时，前总理斯莫尔科夫斯基先生站在大家面前。……他走了进来，与我丈夫热烈握手，祝贺他生日。他穿了一套很漂亮的服装，是拄着拐杖来的。接着向其他被清洗的作家与编辑问好。老板同他握过手之后便四处分送炸猪排与土豆沙拉去了……弗朗达·沃列尔走来跟斯莫尔科夫斯基握手，哈曼切克先生也来了，他一直住在斯莫尔科夫斯基出生的小屋下方隔着好几所房子的地方……我丈夫已经不灵了，腿也不听使唤了，他喝得已经开始笑得不自然。所有被清洗的人都知道，那座看不见的大炮就在酒馆外面。他们还在唱歌，画家海洛和巴托舍克甚至举起那块用床单做的横幅，站到我丈夫身后，那条标语就在他们头顶上方："万岁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著名的拙劣笔杆儿！"台布上放着那个大极了的蛋糕，上面是"祝著名作家生日快乐！"斯莫尔科夫斯基如今和弗朗达以及哈曼切克坐在一起，询问某某某还住在维莱恩卡什么地方，还问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一切是不是顺利，老婆和孩子们是否健康……编辑和作家们站起来同我丈夫干杯，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祝贺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准得要出点儿什么事情，一定会出事，至于出什么事，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感觉到大炮在对着这家饭馆亮着的窗口，大炮就停在橡树林子某个暗黑的地方，停在壕沟的那一边……我不觉得不幸，恰恰相反，我还因为在"小树林"酒家的一切跟过去一样而感到高兴，因为如今我看到我的丈夫在撒谎，他曾经是这么吹牛的：他说他要说真话，遵循真理行事，不惜一切代价。可他对那些曾经为他们在利本尼作过报告的所有他的朋友们、那

些诗人和画家撒了谎。在想说什么就可以说的那个时候，当人们喝着一箱箱一罐罐啤酒，吃着那可怕的猪尾巴的时候，我丈夫在大谈自由，说实际上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身上没有什么可伤害的地方，作家超人之上。他跟我拒绝谈这一切。我只不过是他从《圣经》中所读到的那样：一只从它主人的桌子上捡碎渣吃的小羊羔。这对他倒正合适！可是我捡碎渣捡得很好，这我记得清清楚楚。如今当我丈夫面对他想像中的大炮和专门冲他而来的军队吓得瘫成这个样子！ 如今我看到了，我在一九四五年虽然失去一切，被关了半年，在砖厂卖苦力，不是我的错呀，因为我当时才十六岁，可是我从来没崩溃过，我从来不害怕什么，因为我有那惟一的防护："别跟我捣乱！""别对我胡扯淡！"我失去了别墅、乡间度假小木舍，失去了工厂和我的爸爸，他就是因为这一切而死去的……如今我坐在"小树林"酒家喝着酒，望着所有这些被清洗的，他们感觉无罪可又带着些恐惧，所以才这样笑，所以才这样吃、喝，所以才使劲地唱歌，而我却是平静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平静过。我把他们邀请来，但他们彼此不知道，我把他们请到这林中的小酒馆里，就像克里丝蒂[①]的那些人物，后来让人一个挨一个地被谋杀掉了。……

斯莫尔科夫斯基先生环顾一下大家，但他看见了这一切，便用他那银拐杖顶着下巴站起身来，对我丈夫说，谢谢他，但他有病，该回家了。他跟乡亲们握握手，对其他后面的人做了

① 克里丝蒂(Christie Dame Agtha Mary Chrissa，1890—1976 年)，美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其作品已销售一亿部以上。

个握手的姿势，便一拐一拐朝外走，由前书记斯拉维克陪伴着他……巴托舍克和画家海洛也跟在斯莫尔科夫斯基先生后面走出去，向他挥动着杆上挂着的那块床单。我也跟了出去……可是这时已从普拉麦内林阴道上开来一辆小轿车，从公路上也开来一辆车，灯光一照，三辆伏尔加，正朝"小树林"酒家拐过来。这几辆车的车门一开，跳下来几个穿皮革外套的警察，一个萨茨卡区的警长，还有几个便衣。还有几辆顶上扣着若干个紫色圆东西的布拉格车。警察跑进"小树林"酒家，钻进厨房里……穿着皮革服装的警察们堵住了所有的门，皮衣兜里揣着半截露在外面的手枪……两名警察围在斯莫尔科夫斯基先生坐着的汽车外面……那个显然是整个这次行动的头头的大个子站在饭馆正中央说："没事，没事！只是履行公务！检查公民证！警长同志，请吧！"警长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跟前。一片静寂，笑容变僵……我觉得，我丈夫在瘫倒……身穿制服、头上抹着润发油的警长静默地检查着公民证，询问着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并往公务本上写着什么……外面的两个警察开心地将写着"万岁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著名的拙劣笔杆儿！"的床单卷起来，拿到"小树林"酒家交给警长，并说："斯莫尔科夫斯基受到带煽动性的标语牌欢迎。"警长的下巴抽动一下说："作为实物带走。"我站在外面的昏暗中，通过敞开的门看到整个这一群被清洗者。我本可以走掉的，可我丈夫坐在那里像得了梗塞病似的。我丈夫每次总是有点儿害怕，大概惟一地只有党卫军把他抓到火车头上那一次，他老爱对我讲这一段故事，说他们如何如何想枪毙他，然后将他扔到壕沟里，惟一只有那次，我丈夫怕得跟这次警察执行公务检查公民证一样

厉害。我却在公共汽车上、电车上经历过好多次这样的检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大家只不过到这里来消遣消遣而已。就像在克里丝蒂侦探小说里的情节……我觉得，惟有马利斯科爱理不理的，只有他一个人对“你叫什么名字？”回答了一声：“那上面写着呢！”警长又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马利斯科说：“您要是不识字，那就让另一位给您念一下！”警长撅了一下嘴，点点头，默默地往他的本子上记下别的人都乖乖地说出的名字。……然后警长走出酒馆，对着汽车弯下身去，斯拉维克和他太太将公民证交给了他，尽管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他们仍旧回答了警长的问话。然后那警长又问，后边座位上坐的是谁，斯拉维克说：“是斯莫尔科夫斯基，前任总理。”警长两个鞋跟咔嚓一声靠在一起，看了一下斯莫尔科夫斯基的脸说：“斯莫尔科夫斯基同志，您不需要拿公民证了，在农业部时我还曾经在您手下服过务哩！您的车子可以走了。”我又走进了“小树林”酒家，可是谁也没问我要看什么。我本来希望将公民证拿给他们看，像马利斯科那样回答他们的问题，可是谁也没对我的公民证表示过兴趣……随后警长发令，穿皮革外衣的几个人又巡视了一遍厨房，一直到走廊那边，听得见他们如何走到地窖里，然后大家都走了出去，跳上汽车，伏尔加开动了……生日盛会就此结束……

后来有一天，正赶上下大雨，卡车运来三车《花蕾》[1]，雨水打在这些《花蕾》上，我站在磅秤旁边，看到那些包裹，每个

① 《花蕾》，赫拉巴尔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包裹上面都有我丈夫的名字，我磅完秤写了三张货单，注上重量，送往何处：一辆卡车去霍列肖夫，另外两辆去什捷吉的造纸厂。雨下得很大，我打电话叫我丈夫来。他坐辆拖斗车来了。他站在大雨中，我穿着办公室的工作外套站在装车站台上。大家都看到我丈夫在雨中那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连已经走出了门的回收站主任宁可又走回来，第二辆卡车上那个职工也从《花蕾》包裹堆上下来，站在大雨中，望着我的这位国家奖得主，他已全身湿透，就像掉进河里。那职员耸耸肩膀说："我没有办法，要是行得通，我愿意把整个这一卡车《花蕾》都给您。"我连忙说："咱们给他一包吧！"

还在下午，铁路工人和铁路上的助理工们便在莱特纳的各个小饭馆里转悠，他们提着满满的一皮包从火车车厢里偷来的《花蕾》，跟饭馆里的顾客们一本换四大杯皮尔森啤酒，折合二十克朗。我丈夫在莱特纳的弗尔曼卡饭馆用四大杯啤酒换了十本《花蕾》。

月底我们还去了一趟摩拉维亚。是坐小汽车去的，快到布尔诺时遇上检查汽车。当警察将我丈夫的公民证拿到手上时，无缘无故地躬一下腰说："怎么样，赫拉巴尔先生，您是来找《花蕾》的吗？""不——！"我丈夫说，"来探望的。"可是那警察大笑着将公民证、驾驶证、技术证还给他说："得了吧！您肯定是来取《花蕾》的，我也有这本书……在霍莱肖夫他们偷走了一车厢，在布尔诺到处都是《花蕾》。"……

我的宝儿爷恳求我穿上那套最漂亮的衣服，说我会德语，要带我到松鸦饭馆去。只是求我意识到我将给我们家庭增光。……于是我换了衣服，化了点儿妆，便到松鸦饭馆去了。这里喧闹得我们彼此之间不得不大声嚷嚷。我丈夫搓搓手，让我在一张桌面上竖着"预订"牌子的桌边坐下，然后瞅了一下屋角落。那里有一位有着一头漂亮鬈发的很帅的老先生在向我们招手示意，他一人坐在镜子旁，桌上也有一张他正拿在手上玩耍的"预订"牌子。我丈夫前去向他问好，从言行举止看他俨然是一位文雅的绅士，跟我的那个荒野乡巴佬完全不一样。随即出现了桌子之间的交谈，我丈夫跟这位老先生交谈时，他扯着嗓子对着老先生的耳朵喊……等我的宝儿爷回到我这儿时，我们这里已经摆上了啤酒，是雅鲁什卡送来的，我认识她，她在这里已经当了十五年招待员……她对我丈夫笑一笑，他便微微脸红了。每当漂亮女人看他一眼，他就脸红，这是我丈夫的一大特点。"你们将吃点什么，亲爱的？"她问道。我丈夫说，等他叫她的时候，请把已经预订好了的大盘瑞典饭菜端来……然后我丈夫一边越过顾客望着存衣室的大门，一边对我说："那位很帅的先生是翻译家什杰斯特尼，他把整个的……喏，一位美国作家，他妈的，如今我又忘了他的名字，可你知道，战前来过这里的一位作家是谁来着？考德威尔①，这位作家什杰斯特尼也翻译了。"然后我丈夫又对着我的耳朵喊道，海明威在一九三八年也来过这里，在九月份的几天里。可是他只陪海明威逛了两天街，海明威

① 考德威尔(Caldwell Erskine，1903—　)，美国作家。他的小说直言不讳，描写美国南部的贫民生活。代表作有：《烟草路》、《上帝的小块土地》、《七月的风波》等。

游览了一下说，他不会在这里战斗的……于是离开这儿回去了……“你再瞧瞧他，什杰斯特尼在十七岁的时候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枪杀了总理之后逃到美国去了，后来……他们来了！”我丈夫连忙起身，朝一位面容疲倦的先生迎去。他的太太倒是步履轻盈……互相问好之后，我丈夫将我介绍给他们。他的朋友们便坐下了。原来是亨利希·伯尔和他的妻子。说是从莫斯科飞来的。伯尔在那里作为笔会主席与在莫斯科的侨民和机构讨论了财务方面的问题……雅鲁什卡端来四杯啤酒，伯尔先生忧伤地看一眼这玻璃杯，我立即从他那双美丽和深沉的眼睛看出，他太太大概是怎样为他操着心的，因为她这位夫君的肝大概也不好……我丈夫举起酒杯，喊得我们全桌都能听见，“为健康而干杯！”并补充祝贺伯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喝着啤酒，我丈夫已经是第二杯了，伯尔先生只呷了一点点，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好的白纸包，将它打开，一抬头，将白色药粉撒到嘴里，随即拍去掉在大衣上的一点点药粉，然后说：“亲爱的，我在这里只有半小时的时间，然后还要跟其他作家会面。好啦！亲爱的博胡米尔，您写作顺利吗？有写作空间吗？您没有什么要抱怨的？我在这里是出差，以笔会主席的身份。”我丈夫对着伯尔的耳朵喊道：“我可以抱怨，可是我不抱怨，因为这是白费劲儿，我如今属于被清洗的作家之列……我还是在写作。我想要什么？我的奢望是有话能直说，不转弯抹角的……您听得清吗？”伯尔嚷道：“我听得清。尽管这里很嘈杂。您不想抱怨，可是别的人呢？好几百作家不能写作，他们不抗议？”我丈夫嚷嚷道：“我现在自己抗议自己，至今还没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再又，普罗米修斯必须去盗火，这是谁也不会给我的。”伯尔还是

坚持他原来开始了的话题："可是这里不出文学杂志，连科学杂志、评论杂志也不出，你们，出吗？""不出。"我丈夫大声喊着，在松鸦饭馆都是这么喊着对话的。"不出版。我如今的奢望是继续写了放进抽屉里。"他从雅鲁什卡端来的大盘子里夹着菜到伯尔和他夫人的碟子里……伯尔夫人吃得很合胃口，我也一样，只是伯尔仅仅尝了两小口熏肉，啜了几乎让人感觉不出来的一小口啤酒。伯尔太太喝够了之后接着跟我聊家常："您知道，亲爱的太太，我丈夫已经不允许喝酒，因为他已经喝了成十贮水箱的威士忌了，他的肝在硬变，他要是离开药恐怕都活不到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的那一天。"而伯尔在接着讲他的："那么说您的确没什么要诉说的？"我已经忍不住了。便说："伯尔先生，不是那么回事儿！把他的两本书当做废纸处理了，不出版他的作品。他生日那天，警察包围了林子里的一个饭馆！怎么说没事呢？"我丈夫笑笑，塞满一嘴的熏肉，总想搪塞了事。"是有事，不过在这里，在这国土上，对我来说等于做了广告……我一直很红，您自己也知道，连西方也在写我……是吧？《林中的惊喜》，我生日那天，还从法国寄来了剪报……喏，我将在这里尝遍各种滋味，我已经比较皮实了。……再说，有句俗话叫'家里煮熟什么，就在家里吃掉什么'。您自己也知道。再就是：'罗马帝国已被征服，只得将艺术带到乡下。'① 谁想抗议，就让他抗议去吧，可我，不能抱怨什么……即使要这样做，也只能在洗手间的第五个水龙头那里。"我丈夫求我把最后一句翻译出来……可是伯尔先生看一下表，惊慌地说："我们得走啦！"他说，"有人在

① 摘自罗马诗人贺拉蒂乌斯语。

阿尔克龙等我。”我丈夫问他：“这啤酒您不再喝了？”他指了指那杯几乎还是满杯的啤酒。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伯尔只啜了一点点。他说：“不喝了。”重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白纸包，打开之后将药粉倒进嘴里，然后用两只手拍掉身上的粉末，非常可亲地望了我丈夫一眼。这时我为我丈夫这馋劲儿感到不好意思，搂着他的肩膀亲了他一口。“我亲爱的博胡米尔，您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我丈夫激动得端起伯尔的啤酒，一饮而尽。告别的时候，伯尔太太将手伸给我丈夫，他握着她的手，用他那啤酒浸得湿乎乎的嘴巴亲了她一下。我丈夫然后将客人们送到饭馆门前。回来的时候得意地告诉我说：“现在我想起来了，什杰斯特尼把他全部作品翻译过来的美国作家叫什么名字：杰克·伦敦！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至少有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这种感觉真好！”我丈夫的喊声盖过这饭馆里所有的声音。我也吼了一句：“酒烧的！”只是这一片刻大家都鸦雀无声，我的声音像一面大旗把烟雾和谈话劈成两半，大家都朝我们这张桌子转过身来，望着我们。我的宝儿爷又成了冒尖人物、世界独一无二……他左手端起一杯啤酒，急匆匆地喝掉这第五大杯，好像刚在喝第一杯，同时伸着右手以保持身体平衡。

我像得到救生圈一样地得了建房所的通知，说在索科尔尼基的新住宅已快有了，说我们很快就能得到钥匙以及将房子转到我们名下。我已预付了好几年款的那套房子是在一座高楼里面，它一年前还只存在于工程师网里。这一天我们同其他套房的主人们等在这十三层楼前，轮到我们时，办事员们同我们来到第六层楼上，打开了 37 号房门，祝我们在套房里有

个美满的未来，便又带着其他房主到其他的房间去了。……我们有了新住宅！我们慢慢走进去，阳光充足，这时我丈夫穿过厨房到了卧室，在露天凉台上可以俯瞰布拉格景色。我简直对洗澡间的美看个没够，在利本尼时我只能在盆里或在洗衣房里洗澡，如今我真是惊喜不已，甚至在便池上坐了一会儿，厕所里很暖和、不进风，更没有过堂风，这是在高楼住宅里最棒的一点。等洗澡间和厕所，我都足足等了十五年啊！……我一扭水龙头，热水！再一扭，冷水！我将澡盆灌满水，专心听着往澡盆里放水的声音，我低头去感受那从水面冒出来的空气。过了这么多年如今我是多么地幸福啊！因为我一直梦想在住宅里有我自己的厕所和洗澡间……然后我们计划着、画着，往哪儿摆什么家具。厨房有十六平米，卧室共有两间，一间为十一平米，另一间只有八平米……然后我们下楼去到利本尼。我丈夫曾在这里说过、嚷过说永远永远不搬家。要是他没动手术，也可能就留在这里，留在这永恒的堤坝巷的住宅里了。可我丈夫因动手术而变得虚弱了，最主要的是因喝酒、因和库兹尼克先生一块儿喝酒而变得体弱了，乃至居然同意说，住到索科尔尼基对他来说会不错的。

于是我们把钥匙交给房东。我们最后一次地站在院子里，含着眼泪环顾了一下，在这半小时内，我们在这永恒的堤坝巷的全部生活都掠过我的脑海：所有那些家庭聚会、所有那些痛饮、所有常来我家的人统统浮现在我眼前。我还看到了自己：下雪天，穿着白睡衣走过院子去上厕所；我看到了我丈夫，如何在屋顶上写作，如何用指头在打字机上敲打键盘；我看到，

我丈夫喝醉酒起不来都在什么地方躺过；我打开洗衣房的门，仍旧是那台瑞典洗衣机，我曾经一次在这里洗了我所有的床上用品；我看到，我和丈夫为了追逐阳光如何在这院子里来回挪动地方，当太阳已经跨过这院子，连我也爬到屋顶上，在倾斜的柏油屋檐上晒太阳；我看到这过道仍旧满是快要剥落的潮湿灰泥块，我丈夫每次从酒馆回来，总是跌跌撞撞两只袖子都在这过道上蹭得很脏……我还看到我们家的那只猫艾当如何在等着我们，如何蹿过那有栅栏的小窗子跳向我们，它又是如何地爱着我们，就像我们也爱着它那伟大的猫的灵性一样；我看见了那株爬山虎，它仍旧像我丈夫将它固定在墙上的那样延伸着；我还看到博乌德尼克给我丈夫做的那个面具仍然挂在爬山虎那儿……我站在那里，这些我曾以为已经隐没，既然已成过去，自然已经消失的一幅幅画面使我着迷。我如今站在院子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便能讲述出我的那段生活：从我第一次进来，晚上透过窗口看见一个正在刷洗地板的人，他后来成了我丈夫。我看到自己、一个本来想要自杀的人，自从有了我这位丈夫，让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因为这些年来让我忙得顾不上生他的气、发他的火，都忘了要生个什么孩子，因为我的丈夫，他不只是算一个孩子，而是让我忙得如同侍候好几个从智残学校出来的精神错乱的孩子……我耸耸肩膀，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含着眼泪走下楼梯，还最后一次被过道墙壁上快要剥落的灰泥块儿蹭脏了我的袖子……

1985 年 10 月，11 月，12 月。

译 后 记

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又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意思是说，能活到七十岁的人已不多见，到了这把年纪，该活得自如随意些，即所谓颐养天年了。而赫拉巴尔这位捷克当代文学的旷世奇才，虽然书已出了不少，改编成电影、戏剧的也有多部，回忆录已写过三本[①]，且接连获得国内外多次各类文学艺术奖项和荣誉称号，但他在古稀之年不服老地说："我还要写一本一方面让自己开心，一方面使读者生一点点气的书。"于是除了完成其他写作及参加社会活动之外，他写出了读者诸君现在手上的这套洋洋数十万字的传记体三部曲：《婚宴》(1984年2月完稿)、《新生活》(写于1984年11月至1985年2月)和《林中小屋》(写于1985年10月至12月)。

虽然在"赫拉巴尔精品集"的总序即"赫拉巴尔和他的作品"一文中，已有不少篇幅谈到他写这套传记体三部曲的最初缘由，别出心裁地要用他妻子即书中的碧朴莎(本名为艾丽什

① 指赫拉巴尔回忆录三部曲：《一缕秀发》、《忧郁美》和《哈乐根的数百万》。

卡）的眼睛来看他、用他妻子的嘴巴来讲他，并联系他的朋友和生活来抖搂他从思想灵魂至生活细节中的各种毛病、癖好、恶习甚至丑事。可我们在译完他这套三部曲之后来写这篇译后记时，还是忍不住要重复提到以上这一点，因为这实在是件太不平常、太不容易的事情，就像他所说的“写一本诋毁自己的书”，“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有张厚脸皮”。可赫拉巴尔恰恰是个生性腼腆、胆怯、动不动就害羞脸红的人啊！他何必在七十高龄还要让自己遭这份罪呢？诚然，这是一位真诚的、无所畏惧的勇士的本性表现，也是他对自古以来名人自传回忆录那种多为扬美不扬丑的写法的一种逆反举动。到目前为止，像他这样的“自传”恐怕绝无仅有。

《婚宴》是传记体三部曲的第一部，描写赫拉巴尔与艾丽什卡从偶然相遇、恋爱到举办婚宴（1956 年）这段时期的故事。这个时期，纳粹德国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被沦为“保护国”的捷克、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获得解放，以前划给德国的苏台德地区归还捷克，住在该地区的德籍居民被遣返德国，他们的不动产被没收，捷、德之间新的民族矛盾抬头，战争带来的伤残尚未抚平，国有化又带来一些新问题，旧规矩遭破坏，新秩序还相当混乱。当时的赫拉巴尔虽已拥有博士学衔，但他自愿舍弃小康之家的大少爷生活到大城市谋生，干的是重体力活，住的是贫民大杂院，工钱菲薄勉强糊口。虽然工作脏苦劳累，但图个自食其力、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艾丽什卡则是苏台德地区的名门闺秀，被只身留在捷克，大小姐罹难兼受骗，轻生未成，寄宿在负心的未婚夫的母亲那里，报不上布拉格户口，领不到就业证，在大饭店里打黑工当厨房的出纳，

饱受油烟熏熬之苦，下工回去还得听大妈唠叨数落，是一个漂泊倒霉，而又倔强漂亮的“灰姑娘”。

两人邂逅相遇之后，在约会接触中，他带她去游泳、郊游、拜访……帮助她在大自然的怀抱和人群欣羡的目光中，走出个人不幸生活的阴影，找回自我，恢复生活的信念。为此，她千言万语汇成了“谢谢你呀！”无限感慨的四个字。而最为打动艾丽什卡心的是赫拉巴尔惊人的坦荡真诚，连她自己也说，他对她从不掩饰，甚至尽量让她看到他不好的一面。连赫拉巴尔的母亲也对这位未来的儿媳妇一个劲儿地数落儿子小时候的种种怪癖及缺点，还再三提醒她说：“姑娘，跟我这宝贝儿子在一起可没有你的轻松日子过啊！”赫拉巴尔和他家人的真诚朴实，无形中与她从前的负心郎伊尔卡那个家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整部《婚宴》突出了一个“真”字。赫拉巴尔从小热爱水、火、太阳、星星、花草树木、小猫小狗，是个大自然之子，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真实纯朴。他们恋爱的基础也是个“真”字，不掩饰、不讨好、不做戏、真情实意、合情合理、心心相印、自然结合。

赫拉巴尔说：“这是部写给姑娘们看的情感小说。”是有这么一点儿味道。与第二部、第三部比，这第一部的风格也较为抒情、雅气、粗话不多，正在恋爱中的碧朴莎也还没到毫不留情揭老底的那份儿上，但也不同于一般的言情小说那么卿卿我我绵绵缠缠。通篇不乏“巴比代尔”式的滑稽可笑的场面，连他们的婚礼也不例外，像是一场闹剧，然而却又是一部笑里含泪、真切感人的严肃剧。

三部曲的第二部《新生活》，描写婚后到赫拉巴尔的处女作《底层的珍珠》(1963年)问世之前的那段生活。

在译完这部写作风格特殊、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天书”之后，我们觉得《新生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自传，而是一部多声部的传记体复调小说。首先，赫拉巴尔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婚后生活。他和艾丽什卡前后虽然都遭受过无理辞退等生活折磨，但“透过钻石孔眼”来看他们婚后的生活还是美的、幸福的。

除此之外，他还描绘了形形色色数十位底层人物的辛酸经历：穷得住在地下室的画家沃拉吉米尔和依尔卡；贫病交加的歌唱家——米拉达的哥哥以及他们那一伙食不果腹的巡回剧团演员；痨病缠身累得婚后半年就一命归天的墓碑石匠；靠打短工蹭点吃喝、死后无人知晓的贝比切克；人还没死就已将自己卖给了医学院等着人家来解剖他心脏的砌炉工；靠捡避孕套洗净再卖以挣钱餬口的老妇……都是一些“被抛弃在垃圾堆上的”、“第四等级的人”。看到这么多生动人物跃然纸上，我们不禁要说，仿佛读到了《底层的珍珠》的一本续集。在所有这些人物当中，赫拉巴尔对沃拉吉米尔写得最多，用的篇幅最长。他们曾一起在钢铁厂干活，一起住在堤坝巷24号半年，一起下小酒馆，一起谈各自当“世界冠军”的宏愿；后来不住一起时，沃拉吉米尔经常来找他，两人见面少不了有些耍嘴皮子的摩擦，赫拉巴尔经常用话刺激他，劝他不要酗酒、不要盲目自满。有一次他们与艾丽什卡一起郊游时，沃拉吉米尔逞能表现自己，当他把两位已不在人世的艺术家当做活人来问候遥祝他们健康时，赫拉巴尔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无知，并趁机用一

句“我们也要为自己过早死去而负责”来教训他，要他抓紧有生之年创作出他心目中的好作品来，表达了赫拉巴尔对他那现代行动美术的理解、期待和催生的迫切心情，确实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情绪。

无独有偶，诗人科拉什之于赫拉巴尔，可谓伯乐对于骏马。科拉什赏识他的才华，长时期地关照他，给他创造了摆脱繁重体力劳动，半天工作、半天写作的条件，小心翼翼地启发他快出作品，而又劝人不要去逼他。但赫拉巴尔却还在游离于小饭店小酒馆之间，把上酒馆比做如同上教堂；又似乎沉迷于在剧院拉幕布、扮演配角与小丑，四十多岁了还没出过一本书。科拉什着急地说，有的人到这个年龄不仅出了书，而且成名甚至死去了①，对他真有点恨铁不成钢无可奈何的情绪。其实，赫拉巴尔不是不想写，正如他所说的，一跟剧团去外地演出，打字机不在身边时，便偏偏特别想要写作。然而，孰不知他另有苦衷：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写，按出版社编辑的要求写出的东西又不中出版社头头之意被其打入冷宫并撤销出书合同，还因写作而被废纸回收站的官僚找茬儿丢了饭碗，才到剧院来当了布景工。面对热心支持他写作的科拉什和表示只要他写作，可不必去上班由她来养活的妻子，他是何等地有苦难言啊！

在三部曲里，后来进一步完善，发展成为《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主人公、废纸回收站最底层地下室的打包工汉嘉露过三次面，每次都发表一通“巴比代尔”式的宏论，把借古喻今、

① 卡夫卡和哈谢克都是四十二岁便去世了。

布拉格式的嘲讽、反话、潜台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那些关于查理四世的业绩，瓦茨拉夫四世的挥霍无度，以及法国路易十六皇帝全家及皇亲国戚们的灭顶之灾等貌似疯癫的奇谈怪论，使人不得不久久回味、掩卷深思，乃至拍案叫绝。

在这部《新生活》里，除众多人物外，赫拉巴尔还描绘了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场景、画面，例如孩子们在公园里逼真地玩着彼此射击和集中营的游戏；儿童的双轮滑板车赛和老年人的滑雪比赛；克尔诺什山区的变迁；捣毁犹太教堂与坟墓的景象……这些从表面上看只是随便遇到、信手写来的故事，却引出了作者一连串的深切思虑、愤懑、感叹和悲泣。从孩子们的游戏中他看到希特勒的暴行与战争残杀场景在无辜的孩子们身上的重演，而大人们却熟视无睹；从儿童及老人们的比赛中，他看到健身强国的体育运动一旦与名利争夺挂上钩，奥林匹克的精神便会黯然失色；从克尔诺什山区的变迁，他看到了原本存在于这里的德意志民族优美的民风民俗丧失殆尽，从而引发了他“以一口牙还一颗牙”的大段感慨。他先谈到纳粹德国法西斯使欧洲两千多万人在战争中丧命、六百万人被集中营毒死，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本血泪史，对艾丽什卡这位苏台德区的德族女子无形中是一场极具说服力的教育；紧接着又谈到在当地有两名德军俘虏被捷克人逼迫他们互相交替砍杀断肢致死。艾丽什卡听得头晕恶心起来。赫拉巴尔从骨子里不仅痛恨法西斯的残暴，也明显地反对“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报复，他的忧心显而易见，如果两个民族这样无休止地报复仇杀下去，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了结之日。

关于捣毁犹太教堂、铲除犹太墓群的描述，语气平和却让

人震惊。在希特勒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无比凶残的迫害，要杀其族、灭其种之后，人们理应对受害最深的犹太民族给予深深的同情与慰抚。可是竟然有人指使对犹太教堂蛮横捣毁，对犹太墓群铲除填平！赫拉巴尔将这种摧毁其文化、消灭其痕迹的劣行披露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可看成《过于喧嚣的孤独》的姊妹篇。赫拉巴尔对于自己奉命亲自参与捣毁教堂和袖手旁观填平墓群的浩大工程的负罪心情，与《孤独》中的汉嘉由于无力挽救人类文化被摧残，伸出合并的双手请求警察给自己戴上手铐的无限自责，如此相通。

在这部《新生活》里，赫拉巴尔在见证许多次大小事件之后，曾一再感叹"要过一种新生活也真不容易啊！"我们无疑会去想，为什么作者将这本书取名《新生活》，并在开篇时讲了那段"导言"。赫拉巴尔也多次点题，想必读者朋友从字里行间已有所意会。就让我们将它留做继续揣摩交流的一个话题吧。

第三部《林中小屋》，写的是从他的第一本书问世到他的《花蕾》遭禁销毁，他们搬出堤坝巷24号这段时期。实际上是赫拉巴尔文学生涯中两个截然相反的时期：一是他能够大量出书、得奖、大红大紫最为风光的时期；一是他被禁出书、受迫害、最倒霉、移居林中小屋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他可谓时来运转、大器晚成，能出书了，且受到广大读者如此强烈的反响，他当然高兴，但他丝毫没有一点儿功成名就可以躺下睡大觉的感觉，他感到惶恐不安，不知是否做了现实所希望和需要的，不知是否触犯普通人的胃口和公众舆论。他以老子的"和其光，同其尘"的思想为准绳保持谦虚的品德；他"甘当微不足道者，甘当孺子"、"不断去追求下

一个新的认识”、“总要超越自己，冒犯那些常规俗套，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去盗火”。在生活上，他没有因为有大把稿费而变得挥霍起来，仍然过着提水洗澡、过院子上厕所的大杂院的平民生活，以自己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而在第二个时期，“福兮祸所伏”，祸从天降，苏联军队飞机坦克入侵占领，倒霉事接踵而来，先是内务部特务找上门来，继而被召去秘密审讯他与所谓“叛国分子”谈过话的关系，使他整天在惊恐中度日，担心会有人来把他带走、审判、坐大牢，加上亲人相继去世，作家协会解散，他被清洗，作为一位国家奖得主落到个连领取身份证都遭到百般刁难，过一次生日聚会竟遭到警察如临大敌般地盘问、驱散的地步。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赫拉巴尔没有倒下、没有消沉，他以前所未有的坚韧精神、激情与高速度，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具生命力的顶峰杰作，不愧为二十世纪划时代的捷克文坛奇才，成为继《好兵帅克》作者哈谢克之后，最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与爱戴的、被压迫与被凌辱的底层草民的贴心人和代言人。他是捷克人民的骄傲，是一位让我们为之肃然起敬的大写的“人”。

译　者

于 2003 年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传记体三部曲　第三部　林中小屋
作者＝（捷）博·赫拉巴尔著　星灿　劳白译
页数＝１８０
ＳＳ号＝１１３８３１１７
ＤＸ号＝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５月第１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
书名
正文